新建設

第四卷 第六期

怎樣學習黨史　李達
『實踐論』與關於哲學史的研究　艾思奇
墨家節葬不非殉　郭沫若
周代殉葬問題　榮孟源
加强人民司法工作者的思想建設　陶偉　王式九
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諸問題　沈志遠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下）　潘光旦　全慰天
論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　趙宋光
現實主義的美學基礎　鄭爲
形式邏輯的對象和辯證法　蘇·П·C·波波夫著　張秋華譯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産黨的理論武器　楊興順著　李何譯
評翦編『義和團』　丁名楠

新建設雜誌社出版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新字第一二九號
北京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九號
本刊預定處：各地新華書店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四千元

專著

怎樣學習黨史……李 達（二）

『實踐論』與關於哲學史的研究……艾思奇（六）

墨家節葬不非殉……郭沫若（一六）

周代殉葬問題……榮孟源（一九）

加强人民司法工作者的思想建設……陶 偉・王式九（二三）

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諸問題……沈志遠（二六）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下）……潘光旦・全慰天（三二）

論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趙宋光（三九）

現實主義的美學基礎……鄭 爲（四三）

學術討論

關於認識的發展過程……楊贊時・沈志遠（四五）

關於黨性與階級性……李澤厚（四六）

再談哲學中的黨性……莊本先（四六）

關於『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第二編……兪元桂（四七）

簡單的意見……李何林（四八）

譯文

形式邏輯的對象和辯證法……蘇・П・C・波波夫著 張 秋 華譯（四九）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下）……楊興順著 李 何譯（五四）

學術問答

普遍眞理、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之間有些什麼關係？有人說，馬列主義是普遍眞理也就是絕對眞理，對不對？（馬 特答）……（六〇）

怎樣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歷史上的人物？歷史和現實的關係是怎樣的？（王 南答）……（六一）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有什麼不同？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能實行全國性的經濟計劃？（孫曉邨答）……（六二）

書評

評翦編『義和團』……丁名楠（六三）

——附金家瑞、林樹惠答復

學術文摘

加强思想工作，展開思想鬥爭……鄧 拓（六八）

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阿・列昂節夫（六九）

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周 揚（七〇）

『新建設』第四卷分類總目錄……（七二）

學術簡訊

怎樣學習黨史？

李達

一　學習黨史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領導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歷史，是馬列主義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歷史，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指導革命百戰百勝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現在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來，黨自始就領導着中國人民，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着堅強的鬥爭。黨的歷史說明：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複雜的，有其特自的發展規律。黨在三十年的鬥爭過程中，通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的鬥爭，通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各項工作，前仆後繼，百折不回，終於戰勝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解放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眞是中國人民史無前例的第一件大事。中國人民革命這樣偉大的勝利，完全是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英勇奮鬥與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已成爲全國人民一致的定評了。

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着高度馬列主義修養，有着豐富鬥爭經驗，有着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偉大的政黨，它的的確確是『一支生氣勃勃、智勇兼備、百戰百勝』的政黨。對這樣一個偉大政黨的歷史，全中國人民都應該認眞地來學習。祇有通過這樣的學習，才可以體會到黨的光榮、正確而偉大；祇有通過這樣的學習，才眞正能認識到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同時，祇有通過這樣的學習，才眞能學習到毛主席如何應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眞理決定中國革命的總路線？如何分析各階段的革命形勢，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指示鬥爭的策略，使革命事業能够順利發展？如何在複雜的形勢中，展開兩條戰線的鬥爭，克服『左』右傾機會主義、敎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偏向，保持黨的正確領導？因而能使我們提高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在政治上和工作上不致冒犯錯誤，能够担負起新國家的革命與建設的任務。

對一些較老的黨員同志說來，學習黨史，是極有意義的，藉此回憶過去鬥爭的歷史，以今天提高了的思想水平，檢查當年的思想和行動。正確的，合乎革命規律的，把它很好地鞏固起來；不正確的，錯誤的，深刻地給予分析批判，這樣自能把自己思想再度提高，把自己工作能力和領導能力再度加强。這樣自會敎育自己增强革命信心和不再重覆歷史的錯誤，這對於革命，對於黨，對於人民，都是有好處的。

對於一些新的黨員同志說來，學習黨史，更是極有意義的。因爲這些同志畢竟缺乏早一期革命實踐的經驗；或者在入黨之後，即長期投入緊張戰爭環境或白色恐怖的地下環境中工作，很少有系統地對黨史進行學習，以致對黨的認識不够充實，做起工作來，有時則難以達到應有的幹練的地步。如今學習黨史，在豐富的黨史敎材中，在偉大的革命史事的感召下，使自己認識到黨是經過無數的曲折、複雜、艱苦鬥爭，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勝利，從而提高階級覺悟，培養革命鬥志，增强勝利的信心，所以，認眞學習黨史，是極其必要的。

對一些非黨員而願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乃至全中國人民說來，學習黨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歷史，不僅顯示着中國革命的道路，而且也顯示着中國人民的偉大智慧、高貴品質和勤苦樸實勇敢善戰的精神。從這裏不僅可以學習到中國革命的理論、毛澤東思想，而且也可以學習到無數的英模事蹟，鼓勵着革命的信心和勇氣。我們知道：中國人民都慶賀今天這樣的勝利，都熱愛自己的祖國，都熱愛自己的人民，但追憶人民這種勝利是不易得來的。學習黨史，即可幫助我們了解祖國人民眞正偉大的所在，即可幫助我們了解祖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三十年來，有無數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因而使我們更堅定地意識到：中國人民爲要獲得徹底解放，爲

要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勝利更走向勝利，就必須『永遠跟着毛主席走』，『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總之，在今天勝利的中國，大家學習黨史，都是很必要的。尤其在當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進行各種建設的偉大任務之下，中國人民的革命工作，並不是比取得勝利以前減少了，單純了，而且更加繁重與複雜了。工作任務之多有如海浪，前浪未落，後浪又起；工作進程之速有如賽跑，跌了下來，趕不上去；工作任務和時間都不允許我們再像過去一樣對每件工作摸索前進，反覆實驗，不允許我們跌了交子再站起來了。這樣，學習黨史，深切地吸收過去的經驗，學習毛主席當年在每一歷史階段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從而培育自己對新鮮事物的高度敏感，有預見性，這對於革命事業，是極其有益的。

二　學習黨史必讀的幾篇重要著作

學習黨史，首先要解決的是讀物的問題。今年『七一』前後，毛主席和黨的許多領袖們，發表了好幾篇重要著作，其中胡喬木同志所作『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和陳伯達同志所作『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應該是學習黨史的基本讀物。我們應當先學習這兩篇基本的讀物，把它們當成學習時自始至終的一個基本的提綱，隨時結合各個歷史階段中毛主席當年的著作，再配合其他領袖們在『七一』所發表的有關論文而進行有計劃的學習。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按照年代的順序，說明黨的成立、發展及其領導中國革命鬥爭的過程；說明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領導全黨、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向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走狗英勇奮鬥，通過許多艱難曲折，克服自己隊伍中各種機會主義傾向和各種錯誤缺點，終於戰勝敵人而取得勝利』的過程。喬木同志把黨的三十年，劃分爲四個時期，對於每一個時期，都有扼要清晰的敘述與說明，最後還有一個總結性的分析。學習了這一著作，當可深刻地理解到黨的歷史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

其次，陳伯達同志的著作，是論證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半殖民地中國革命中的應用與擴張，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這一著作綜合毛澤東同志的一切著作和他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與策略，系統地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表明了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在反對黨外的反動思想與黨內的各種偏向的鬥爭中鍛鍊出來、成長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每一個組成部份，如關於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其他革命階級的學說，關於從農村革命根據地到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學說，關於團結資產階級而又聯合又鬥爭的學說，關於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轉變的學說，關於黨的建設的學說，——這一切都是列寧斯大林關於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指導理論的發展，並且還作了光輝的獨立的補充。學習了陳伯達同志的這一著作，當然可以深切地領會到三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廣大的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道路；更可以體會出黨史就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百戰百勝的歷史。

進行了以上兩篇基本讀物的閱讀與鑽研，最要緊的是進一步結合毛主席在每一時期的著作進行學習。毛主席自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五年的著作，最近在報上發表出來的已有七篇。這七篇著作，都是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經典著作，都是中國革命史中的輝煌文獻，每一篇都刻劃着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標誌着當時革命的方向。

一九二六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一九二七年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思想的最初的表現。前一著作，對於中國社會各階級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奠定了中國革命的最根本的路線，即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後一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農民革命問題，指出農民階級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廣大的同盟軍，建立了工農聯盟的理論基礎，對於後來的土地革命政策、武裝鬥爭和農村政權根據地的政策，已經指出了一個輪廓，這兩篇著作，同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

一九二八年所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爲甚麼能够存在？』和一九三〇年所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兩篇著作，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學說。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與優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說明了半殖民地中國人民的革命，祇有進行武裝鬥爭，才能爭取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祇有先在農村建立紅軍與紅色政權根據地，由農村包圍城市進而奪取反革命所佔據的城市，才能取得勝利。這完全是具體地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從矛盾中，從發展中，綜合全面所得到的科學結論。三十年來黨的革命史，證明它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二九年所寫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關

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這兩篇著作，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建黨理論，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指針，這爲後來一系列地整風建黨打下了極良好的基礎。

一九三五年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一著作，是在『九一八』以後指出當時政治形勢的特點，指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通過這基本策略的決定與實行，促成了中國人民堅持了八年抗戰，終於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毛主席的這篇著作，更是富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文獻。

總上七篇著作所說明的主要內容，是統一戰線、武裝鬥爭與黨的建設，這三件是黨的主要的法寶，同時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的組成部分。當我們學習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的黨史時，必須結合學習毛主席的前六篇著作；學習抗日時期的黨史時，則又必須結合學習第七篇著作，必要時也要參讀『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至於學習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黨史時，參讀毛主席『論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也是有必要的。

此外，『七一』前後黨的一些領袖們所發表的論文，也是值得參考的。譬如學習到中國革命在世界上所發生的影響時，就要學習陸定一同志所作的『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學習到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的成就時，就要學習陳雲同志所作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學習到解放軍建軍的歷史及黨的武裝鬥爭的歷史時，就要學習朱德同志的『中國人民怎樣擊敗了美帝國主義武裝的蔣介石反動派』、陳毅同志的『學習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作風』和聶榮臻同志的『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三 學習黨史的方式與方法

學習黨史的方式與方法，是進行學習時的一個具體的問題。因爲不論在黨員與非黨員之間，或在任何機關，部門，工廠，學校內，學習的人員或同學，文化程度與政治水平各不相同，學習的方式與方法，就必須根據不同的情況出發。

具有高級文化理論水平的黨員幹部的學習，應當劃爲一組。學習過程中以自學爲主，討論爲輔。在自學中應該根據集體擬定的學習提綱，深入鑽研。閱讀的文件也無妨多一些。學習的重點，應當是根據黨的三十年來具體的、豐富的、生動的奮鬥史實來學習中國革命的基本原理和革命鬥爭規律，學習每一個時期黨的策略路線問題。在這裏反對脫離黨的鬥爭史來空洞地推論政治原理，同時也反對單純地追述事實而不加分析。『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實踐論）。我們學習黨史，當然祇有應用辯證唯物論的立場、觀點與方法，才能學習好；同時，也就是祇有應用毛主席給我們的思想武器——『實踐論』，才能學習好，這是在學習過程中要時時刻刻掌握住的。還有，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鬥爭的歷史，從城市打入農村，從農村又包圍城市，走進城市；經過了文化戰線、經濟戰線、政治軍事戰線多方面的鬥爭，終於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期間歷盡艱難曲折，其鬥爭知識與經驗是豐富無比的。在這一點上，黨史可以說是蘊儲了中國人民智慧的總匯，可以說是鬥爭知識的錦囊。可是，對這樣一個偉大的史實，因爲過去我們忙於戰鬥，沒有時機把它編纂出來，今天僅僅是注意的開端，學習的開始。因此，一般具有高級文化理論水平而又有着一些鬥爭經驗的黨員幹部，在學習黨史的過程中，無形中就担負着搜集資料提供資料的義務。因此，學習時，要作筆記，要寫心得，而且要認眞負責，聯系思想實際，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保證寫得好，這樣對於自己思想理論水平的提高，是極有幫助的，而對於革命事業，更是有益的。

具有普通文化理論水平的黨員幹部的學習，也應當劃爲一組，學習的過程中同樣以自學爲主，討論爲輔，不過仍得要聽報告，討論的次數也可能增多。在自學中應該照學委會規定的學習提綱，閱讀文件。學習的重點，應該側重從黨史的豐富史實中，徹底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及其寶貴的經驗教訓，從而能夠抓着中國革命的規律，學會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黨史對這些同志說來，是極好的馬列主義教材，黨史才是活生生的馬列主義，行動中的馬列主義。我們從黨史所載毛主席歷年的著作當中，每一處都可以學習到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其他一切革命知識；學習到與實踐密切相連、切實解決問題的活生生的馬列主義，行動中的馬列主義。

文化理論水平較低的黨員與工作幹部的學習，也應該劃爲一組。學習的過程中，上課或聽取報告是主要的方式，但亦必須結合自修與適當的集體討論，因爲單祇上課聽報告，不經過自己深思鑽研，還是不够的。學習的重點應該是結合黨史的一般知識，側重在徹底認識黨的性質和黨的基本策略與任務，從而提高階級覺悟，加强對黨的認識與信仰。我們知道：一直到現在，有許多工農

幹部，雖然爲革命做了些事情，但對黨的認識還是缺乏的。有的農民幹部，因爲長久居於農村，單純地僅僅看到了農民參加黨爲革命工作的一面，就誤認爲『共產黨是農民的黨』；另有工人幹部，因爲在反動統治時代，常看見學生遊行示威，就誤認爲『共產黨也是學生的黨』。所有這些認識模糊的現象，都需要通過學習黨史把它糾正過來。要求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要求認識黨是在甚麼情況下產生的，它在三十年來怎樣代表着工人階級，領導着廣大中國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向反動派作鬥爭；並且更要求認識黨將怎樣領導着中國人民走向未來遠大的勝利，從這些學習重點中，以培育和鞏固他們對黨的革命事業堅定的信仰，和對新民主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信心。

最後非黨員幹部的學習，在現在一般地還未展開，但也是很需要的。這種理由，前面已經說過。展開這種學習時，主要地在方式上也要照顧到文化水平。文化水平較高的，一般均具有自行閱讀的能力，這當然就減少了輔導的功夫；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幹部，自行閱讀的能力很差，這便需要加強輔導的工作。但一般地說來，非黨員幹部的政治水平，却是比較低的，這樣在學習過程中，就必須多聽報告，加強領導。我們知道：黨史不是普通歷史，它不是單純的書本子知識，它是行動中的馬列主義。假如一個沒有相當的政治水平而單祇具有文化水平的人自修黨史，或自名『研究黨史』，那是一定要發生偏差的。所以，在全國黨員普遍開展學習黨史的熱潮中，幫助非黨員幹部用端正的態度學習黨史，乃是首要的工作。

四　學習黨史的目的與要求

學習黨史，必須明確學習的目的，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必須根據不同的文化理論水平，掌握住不同的要求。但一般地說來，在今天初步開展學習黨史的時候，不論是黨員與非黨員，不論文化理論水平的高低，總的目的與要求，應該是這樣的：着重在徹底認識黨的性質；學習黨在領導中國人民艱苦鬥爭中的寶貴經驗，學習毛澤東同志在每個時期爲中國革命所規劃的策略與路線，從而領會革命的艱苦過程，認識黨對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堅定對黨對毛主席的更深的信仰，堅定對中國革命與建設事業更大的信心。圍繞着這樣的目的與要求，在學習的過程中，至少應該掌握着下列兩點：

第一、學習黨史，不是單純地向後看，正是向前看，正是爲着將來。工作要有計劃，領導要有預見，這是誰都知道的。斯大林說過：『領導的藝術是一件嚴重的事情。不可落在運動後面，因爲落在後面，就是脫離羣衆。可是，也不可跑得太前，因爲跑得太前，就是喪失自己與羣衆的聯系。誰願意領導運動，同時又願意保持自己與千百萬羣衆的聯系，那他就應該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反對落在後面的份子，又反對跑得太前的份子。』（勝利衝昏頭腦）。在我們的黨史中，三十年來，毛主席的領導永遠是具有科學的預見性的，他一面是根據時間地點與條件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並且不斷地與革命陣營內『落在後面的份子』和『跑得太前的份子』作鬥爭。我們學習黨史，就是要學習這些，就是要從這些寶貴教訓中，培養我們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培養我們工作的計劃性和領導的預見性，並且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黨鬥爭了三十年，取得了今天這樣偉大的勝利，但這『祇不過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餘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現在正在進行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三大政治運動，今後要大力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逐漸地向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途邁進。像這樣偉大的歷史任務，對於一個黨員的工作要求更爲重大而迫切，對全中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很大的。所以，現在我們學習黨史，是黨對我們的啓發，絕不應當是引起安樂與麻痺，相反地，是加倍努力。尤其是新中國的一切，都在飛躍式的前進，倘如自己不能站在羣衆的前面，便必然爲羣衆所遺棄，這是在學習黨史當中，要時時刻刻加深體會與警惕努力的。

第二、在學習黨史當中，爲了要確實地做到使自己思想提高，就是要聯系實際，聯系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去學習。反對不開動腦筋，而空談理論地去學習。黨史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着中國人民鬥爭的歷史，是革命實踐的歷史。在這裏邊，不僅完全包括了在各個階段對反動派鬥爭的策略與路線，同時亦完全包括了各個時期對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鬥爭的事實。斯大林特別指出過：『黨是靠清除自身中間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劉少奇副主席更這樣具體地指出過：『不管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就是老黨員以及由無產階級出身的黨員，鍛鍊與修養都很重要。因爲我們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中國社會中產生的』。『一個比較幼稚的革命者，由於他：(一)是從舊社會中生長教養出來的，他總帶有社會中各種思想意識及成見習慣的傳統之殘餘；(二)他還幼稚，沒有經過長期的革命的實踐，因此，他還不能眞正深刻的認識敵人，認識自己，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的規律性。要改變這種情形，他除開學習歷史上革命的經驗(前人的實踐)而外，他必須親自參

加到當時的革命的實踐中去，即是在和反革命的各種成份的鬥爭中，發揚他主觀的能動性，加緊學習和修養，然後他才能够逐漸深刻地體驗和認識社會發展與革命的規律性，認識敵人和自己，並發現他自己原來的思想習慣成見之不正確而加以改正，提高自己覺悟的程度、革命的品質並改善革命的方法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以，毛主席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經常洗臉，要照鏡子。甚麼是最好的鏡子呢？這無疑地就是黨史。黨史中有多少鮮明的實例，正可照出自己思想上的汚點，幫助解除包袱而再度提高。譬如有的人在抗美援朝的問題上，一直到現在對自己的力量還認識不够，那就請看黨史罷，請好好讀讀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罷！從黨的幼小一直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勝利史實中，針對自己思想上的模糊觀點，好好想一想，必能幫助自己提高的。再如有的人，動不動就顯出『功臣思想』，總覺得自己今天似乎應該享受些，那也請看黨史罷！黨史會告訴我們，今天的勝利是怎樣換來的；同時也請好好讀讀毛主席的著作罷！毛主席的著作所告訴我們的，今天的勝利才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這樣，對每一個自己思想上或行動上存在的問題，都能好好地聯系實際，仔細檢查一番，我想也一定可以幫助自己提高的。

總之，正如前面已經指出過的，黨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眞理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密切結合的歷史，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指導革命百戰百勝的歷史。我們對於這一個偉大的革命知識的百科全書的學習，的確是祇有通過明確學習的目的與要求，以極端正的學習態度，掌握好學習的方法，才能做到幫助自己思想提高的地步。明確了這些，就讓我們進一步熱列地加強對黨史的學習吧！

『實踐論』與關於哲學史的研究

艾思奇

在今年一月裏，中國新哲學會曾就『實踐論』開了兩次座談會，對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歷史上的某些認識論學說作了一些批判的研究，並由北大哲學系和清華哲學系分別寫了兩篇文章（清華由馮友蘭先生執筆），登載在『新建設』三卷六期和四卷一期。這兩篇文章，檢討了認識論上的兩個主要問題：一，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與行的關係的問題，也就是認識與實踐的問題；二，西方近代哲學史上的經驗論與唯理論的問題，也就是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關係的問題。這兩篇文章是吸收了座談會上的一部分意見修改後發表的，其中分析了過去各派哲學對於以上認識論基本問題的解決的片面性，也檢討了過去學校裏哲學教學的某些缺點。這裏面有許多很好的意見，是值得我們用來作爲學習實踐論的參考的，但也有某些論點，還值得從新考慮。哲學史的問題非常複雜，要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對它所包含的一切豐富內容作出正確的結論，是不可能的，這需要從事哲學研究的人以及從事其他方面科學理論研究的人共同作一個長期的努力，才能完全達到目的。我現在也只能就這兩篇文章所接觸到的一部分問題，提出一些個人學習中所想到的意見，作爲大家進一步研究討論的資料。

『實踐論』解決了什麼問題？

首先值得提出來談一談的問題是：『實踐論』，作爲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作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它是解決了什麼問題呢？爲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中外哲學史上所不曾解決或不能完全解決而在『實踐論』裏充分解決了的問題是什麼呢？這次座談會中接觸到了這個問題，北大哲學系的文章第二節也提到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方法論與世界本身的發展是一致的，是客觀世界的眞實的反映，所以一定能够解決問題。而一切舊哲學由於它是唯心論或形而上學，所以一定解決不了問題』。但是，究竟辯證法唯物論和『實踐論』所能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在北大哲學系的文章裏却還沒有明確的說明。所以在這裏就需要說明一下。我想，『實踐論』所充分解決了的，就是如何在我們的變革實踐的行動中來克服主觀盲目性的問題，如果引用『實踐論』上的話，那就是從思想方法上來解決今天無產階級歷史地所担當的『正確地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任務』的問題。指明這一點，我以爲是很必要的。這對於

我們學習『實踐論』以及在實際工作中和研究工作中來應用『實踐論』，都有很大好處。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的寫作，是爲着從思想方法的基礎上來反對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而不論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它們共同的危害性都是在於使革命運動的指導者對於周圍事變的客觀規律喪失了正確的認識能力，因而就把實際鬥爭引向盲目亂撞的絕境，使革命和人民遭受很大損失以至於遭受失敗。革命歷史上的許多錯誤，右傾機會主義與『左』的冒險主義，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都是認識的盲目性的不同的表現。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鬥爭歷史中，不斷的和各種錯誤思想鬥爭，也就是不斷的和各種認識上的盲目傾向鬥爭。在這些鬥爭中，毛澤東同志應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正確地揭發了中國革命運動的各方面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等等——具體規律，使中國革命獲得了自覺的、清醒的指導，終於走向勝利。因此，『實踐論』，作爲科學的思想方法的系統、整的理論，一般地說，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眞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之結合的認識論的總結，特殊地說，就是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克服各種盲目傾向的鬥爭經驗的哲學總結。這個總結全面地揭示了人類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發展的普遍的規律：人類通過自己的變革實踐，如何由不認識到認識？如何由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認識進到全面的、本質的認識？如何克服錯誤而達到正確的認識？『實踐論』就是由於揭示了這些規律而在理論上澈底解決了如何克服實踐行動中的盲目性的問題，並因此爲各方面的革命工作者提供了一個端正思想方法和提高工作的銳利武器，如果我們通曉了這些規律，掌握了這個武器，就可以應用它來正確解決我們的各種工作中的實際問題，使之能够獲得自覺的、清醒的指導，而收到最大的成效。這正是一切工作崗位上的人們必須從『實踐論』學習的中心課題。目前我們的各種革命工作中有沒有盲目性存在呢？應該肯定地說是有的。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我們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及各個時期各個工作部門的重要政策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但由於具體工作的內容是十分複雜，新的事物是層出不窮，因此，在各個崗位上工作的人，由於不能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而在認識上行動上陷於盲目，這又是常常可以看見的事實。工廠管理中不注意經濟核算，基本建設事業中的盲目施工，對工人農民宣傳教育中脫離政治的庸俗的資產階級傾向，思想改造工作中敵友不分的『左』的傾向以及另一方面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的右的錯誤態度，等等。這些就是我們在眼前可以看到的各種工作中的盲目性的一部分例子。學習『實踐論』，必須把它應用於當前的實際，來克服各種工作中的這種盲目狀態。我們從報上讀到一些同志的文章，他們應用『實踐論』的理論來檢討了自己的工作部門的問題，這些部門涉及到農業、工業、醫學、工程建設，政法、經濟、歷史、文藝、以及其他理論的和實際的方面，這些文章雖然還只是表示一種初步的努力，但在企圖應用『實踐論』的理論來克服研究工作和實際工作中的盲目性這一點上，方向都是正確的，並且是有收穫的，是值得進一步加以發展的。就哲學研究工作來說，即使是作歷史的檢討，也應該使我們的研究服從於一般學習『實踐論』的這一個中心課題，即是一方面要借『實踐論』的學習來克服我們哲學研究工作本身由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所造成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又要使我們的研究有助於各部門的革命工作者來掌握這克服盲目性的科學武器，我想這應該是哲學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針。

對於過去哲學學說如何估計？

對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各種哲學學說，我們應該怎樣來加以估計呢？馬克思說：『哲學家們曾經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但是現在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既然過去的哲學學說僅只是說明世界，那就可以了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問題，如何克服人類的變革實踐行動中的盲目性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史上都沒有得到解決，甚至於沒有把它當做問題提起來。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一切哲學學說都僅僅是錯誤，而對於人類正確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努力，都是沒有意義的呢？我想是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的，對於歷史上的唯物論哲學，尤其不能採取這樣的看法。說過去的哲學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並不等於說過去哲學在歷史的發展上沒有向着這個問題的解決接近。馬克思主義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學說，同時又是人類思想發展史的最高的成果；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出現，並不是和過去哲學的發展沒有歷史聯系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毛澤東：『論新階段』)我們要强調馬克思主義與一切過去哲學的根本區別，我們强調唯有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才能成爲科學的思想方法，但決不能因此就對於過去哲學採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就這一點來說，北大哲學系的文章裏有些論點的提法，是還值得商榷的。例如在這篇文章裏，有這樣的一些話：『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認識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錯誤的認識論』；『在舊哲學史

中的一切改變，也只是換湯不換藥式的』。在這些話裏面所包含的問題是，第一：沒有注意到過去哲學歷史上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原則的不同，而把『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籠統看作同一個東西；第二：沒有注意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許多哲學學說裏，特別是唯物論哲學裏的某些合理的因素，而把一切過去哲學的認識論看做僅僅是不同程度的錯誤學說，這樣單純消極的提法，無疑是片面的，是違背歷史觀點的。

爲着說明這個問題，我想順便把人類歷史的特點作一些簡單的回顧。

人類脫離動物狀態，是開始於以自己的勞動進行生產的時候。人類的生產勞動與動物的求生存的活動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中間，就包含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特點。恩格斯說：『動物僅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完全以自己本身的現狀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以自己之改變自然界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來統治自然界。這便是人和其他動物的最後的主要區別，而引起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這裏說的『以自己之改變自然界來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來統治自然界』，就有着『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意義，這個特點，是從人類最初學會製造工具從事生產的時候就開始具有了的。製造工具這件事情，就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行動，那怕是最粗糙最簡單的一把石刀，要能夠製造出來，就必須對於外界事物（石頭）的性質有若干的正確認識。動物不能製造工具，就是證明動物還不會具有人類的這種認識世界的能力，就是證明動物的求生存活動是完全處於自發的盲目狀態。這樣，就認識方面來說，人類是由於與動物的盲目性鬥爭獲得一定勝利才開始了自己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可以說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歷史，人類改造世界的最基本的行動是生產，在生產行動的基礎上，人類一方面不斷地改造着自然界，另一方面也不斷地改造着自己周圍的社會關係，在階級社會裏，是通過階級鬥爭來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社會。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即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中，人類同時又不斷地改造着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實踐論』）。這就是說，提高自己對周圍世界的認識能力，使自己愈更全面愈更深刻地認識自然界和社會的各種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因此在實踐行動中就愈更減少其盲目性，愈更能夠準確地『改造自然界來服從自己的目的，來統治自然界』（對於社會的事物也是如此）。

這樣，人類的歷史，單就認識世界的一方面來說，也就是爲克服盲目性而鬥爭的歷史。這個鬥爭是經過長久的年月才對於自然界方面而逐步獲得較大的勝利，而對於社會方面的認識的盲目性的克服，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恩格斯說：『如果我們需要幾千年的勞動才學會我們的生產行動底較遠的自然的結果，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的較遠的社會的結果就更要困難得多了。』（同前）所以，直到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對於競爭、經濟危機、戰爭等等社會現象，還是處在盲目的動物狀態。對於社會的認識爲什麼『更要困難得多』呢？這從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裏就可以得到明白的解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類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

哲學，即關於宇宙觀及認識法則的學問，是在什麼情形之下出現的呢？哲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毛澤東：『整頓黨風學風文風』）。人類最初對於宇宙全體和自己的精神、認識能力的了解，是帶着宗教迷信的形式的。當人類的生產發展已達到了相當的規模，特別是手工業和農業已經有了相當廣泛的分工的時候，當人類的生產力已發展到能夠提供相當的剩餘生活資料，足以使一部分有人可能脫離勞動的負担而從事比較有系統的研究活動的時候，也就是在階級社會發生之後，人類的進步的階級就能夠獲得較爲完整的許多關於自然規律的正確認識，以及若干社會歷史的知識，而使人類自己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鬥爭中進入一個較高的階段。在這樣的基礎上，人類就有可能對於已獲得的這些知識加以概括和總結，而達到關於世界的全體以及人類認識本身的較爲合理的理解，這就是爲什麼古代唯物論的世界觀會衝破原始的宗教迷信而崛立起來的道理。

所以，唯物論的世界觀、以及實質上具有唯物論性質的證辯法的世界觀）的產生，是人類爲着認識世界而和自己的盲目無知進行鬥爭的勝利成果。什麼是唯物論？恩格斯說得好：『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而並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份。』唯物論的發展，表示着人類愈更全面和愈更深入地認識了世界的本來面目。自然科學的每一種新的偉大發見，都使唯物論獲得新的面貌，社會革命的一定的前進階段，也會把唯物論推進一步。

從哲學發展的歷史上可以看到，唯物論並不是一開始出現就能夠獲得完全勝利的。由於過去長時期間人類生產活動的規模始終是很有限的，從而對於自然的科學認識的範圍也是很有限的(對於社會更是如此)，又由於過去長時期裏主要的掌握科學和哲學知識的人始終是屬於剝削階級的範圍，因此，過去的唯物

論，不論古代的唯物論以及近代資產階級的唯物論，都有着片面性的缺點，因而它就沒有能力澈底摧毀宗教迷信的世界觀，以及在實質上與宗教迷信相通，而只是在精巧的合理的外裝之下表現出來的唯心論的世界觀。我們從哲學史上看見過去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唯心論，這些唯心論代表着各種各樣的剝削階級的立場，代表着人類中的反動腐朽的成份以及對反動腐朽勢力妥協投降成份，代表着這些人們的崇拜盲目性、擁護宗教迷信或在盲目性前面表示低頭屈服而沒有勇氣對它進行鬥爭的傾向（例如不可知論）。這些唯心論在哲學史上與唯物論一直進行着激烈的鬥爭，而由於過去的唯物論本身的弱點以及剝削階級始終居於統治地位的客觀條件，使得唯心論有時還戰敗了唯物論。

這樣，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哲學的歷史，就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黨派鬥爭的歷史。這個鬥爭，集中地表現了人類對於周圍世界的愈益前進的科學認識和愚昧無知的鬥爭，表現了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行動中愈益提高的自覺性與盲目性的鬥爭。而最後由於大工業的無產階級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的出現，人類才掌握到了足以澈底克服主觀盲目性的最完善的科學武器，使唯心論世界觀不能不遭到完全的破產和最後的失敗。目前人類的思想發展，就是到達了辯證法唯物論的世界觀澈底戰勝唯心論世界觀的階段，正如目前人類的歷史發展，是到達了無產階級推翻一切剝削制度或『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面』（『實踐論』）的階段一樣。

還在六十年前，恩格斯就說：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正確理解自然規律，並認識我們的干涉在自然行程中的較近或較遠的效果。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發展以來，我們就愈益能夠預見至少是我們最普遍生產行爲底較遠的自然效果，因而也學會來統治它們。但是這種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就愈會不僅感覺到而且還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從希臘古典時代崩潰以後，在歐洲所發生並在基督教中最高度形成的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辯證法』）

這自然並不是說，唯心論的思想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經完全消滅，而沒有任何影響了，恰恰相反，世界上還有反動勢力存在，因此他們就要繼續用各種方式來堅持唯心論和迷信愚昧的說教，美國實用主義者（主觀唯心論的一種）杜威等人所吹噓的什麼『世界主義』，就是近年來代表帝國主義反動方向的唯心論思想的一個具體表現。同時，人民中間還包含着非工人階級，因此在實踐中還要不斷地產生各種自發的盲目傾向，這樣就仍然要有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在中國，隨着人民的勝利和蔣介石的反動王朝的被打倒，辯證法唯物論已成了國家的領導思想，而以歌頌愚昧盲從作爲唯一內容的極端唯心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法西斯『哲學』，就沒有合法存在的餘地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神秘思想和唯心論哲學，片面性和盲目性，還在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工作中起着不小的危害作用，用辯證法唯物論的世界觀——用『實踐論』的科學武器來批判這些唯心論和盲目傾向，也是今後長時期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任務。我們可以相信，這些鬥爭是一定能夠得到完全勝利的。

由此可知，在估計過去哲學歷史的時候，如果不把唯物論和唯心論加以區別，而簡單地一律稱之爲錯誤的哲學思想，是不符合歷史的實際的。如果再加上這樣的前提，說：『錯誤的認識論終歸要引起錯誤的實踐』（北大哲學系文），那麼，過去的唯物論哲學以及實質上有唯物論性質的辯證法思想在歷史上所曾經起過的進步作用，都將無法說明了。誠然，過去的唯物論都有它的缺點和錯誤的方面，但這些缺點和錯誤的存在，並不是由於唯物論的基本原理有任何不對的地方，而是由於唯物論的原理得不到全面的貫澈，——例如古代自然發生的辯證唯物論，由於科學研究還很幼稚，僅僅能對自然界的總的輪廓作一個唯物論的概觀，而不能對自然界的各個部分貫澈唯物論的認識；近代資產階級的形而上學唯物論，僅僅對自然現象能夠給以唯物論的理解（這種理解也是機械的），而不能把唯物論擴張到社會現象的認識上。——至於就唯物論原理本身來說，那麼，它的發展的每一步，都表示着人類認識世界前進了一步和對於盲目無知的鬥爭得到了一個新的勝利。過去的唯物論，誠然都沒有在認識論上解決了如何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問題，但唯物論的發展，是一步步向着這個問題的解決接近，這卻又是不能忽視的。

北大哲學系的文章是從自我批評的態度出發，說：『我們舊大學中一向主要講授着錯誤的認識論思想』，這樣的態度，無疑問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能夠指出：這裏所說的錯誤的認識論思想，主要的是一些唯心論、不可知論的或神秘主義的認識論思想，那麼，這個自我批評就會令人覺得很圓滿了。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與舊唯物論的認識論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的缺點，除了沒有把它的根本原理澈底貫澈到人

類世界認識的各方面之外，還由於它在認識論方面是片面的。這個片面性的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關係。』

如果把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拿來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認識論作一比較，就更容易明白後者的內容是多麼片面的了。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最全面、最澈底地概括了人類認識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如在『實踐論』裏可以看到的，它應該是包含着以下的幾個主要特點：(一) 承認認識的客觀物質性：主觀的認識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客觀物質首先通過感覺為人所認識，正確的認識必須是有『客觀眞理性』，必須是『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而並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份；』(二)，承認認識的社會實踐性，認識依賴於實踐，『實踐高於 (理論的) 認識』，『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眞理性的標準；』(三) 承認認識的主觀能動性，『認識開始於在實踐中獲得感性的認識，但感性認識只是認識的低級階段，人的認識還要由低級階段的感性認識能動地飛躍到高級階段的理性認識，又由理性認識能動地飛躍到革命的實踐；(四) 承認認識在實踐中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

由這些特點來看，我們就可以知道，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是如何豐富地全面地概括了人類認識的內容。這樣豐富的全面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任何一種哲學認識論——各種唯物論的認識論在內，所遠遠趕不上的。如果研究一下哲學史，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種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都是僅只能够抓着辯證法唯物論所概括了的那些人類認識特點的一部份或一方面，也就是說，這些哲學學說，都只能片面地了解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而從來沒有對它獲得全面的了解。至於唯心論哲學的認識論，則主要地是把認識的能動性這方面孤立地過分誇張起來，由此來抹煞、歪曲或顚倒了其他的特點——特別是抹煞了認識的客觀物質性這個特點；而一切唯心論認識論的共同本質，就在於否認了認識的客觀物質性。

如何區別唯物論的認識論和唯心論的認識論？這是在檢討一切舊哲學的時候必須首先正確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認識論，雖然和唯心論的認識論同樣有其片面性，但兩者在人類認識史和哲學發展史上是居於互相對敵的地位，而有着根本不同的意義。這在本文的前節裏我們已經講過了。辯證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最根本的標準是什麼呢？我以為，不論就哲學一般來說，或單就認識論來說，這個根本的標準，就是恩格斯早已指出過的：如何看待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或思惟與存在的關係的問題。承認客觀、物質、存在是第一性的東西，而主觀、精神、思惟是第二性的東西，這就是唯物論哲學，相反地，把主觀、精神、思惟放在第一位，而把客觀、物質、存在放在第二位，這就是顚倒了事物關係的唯心論哲學。同樣，就認識論來說，承認客觀、物質、存在是認識的基礎，而主觀、精神、思惟是前者的反映，並且相信人的認識主觀有正確反映客觀物質發展規律的可能性——凡是這樣來解決問題的，就是唯物論的認識論。相反地，如果不能這樣來解決問題，而認為認識不必以客觀、物質存在為基礎，知識是由人的主觀、精神、思惟的本性裏直接產生出來的東西，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前者的反映，這些就是唯心論的特徵，我以為，要區別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認識論，首先必須依據這一個標準，而不是首先依據其他的標準。所以，承認認識的客觀物質性，是辯證法唯物論認識論的第一個特點。也是一切唯物論的認識論所必須具有的共同的根本特點。哲學的認識論如果缺少了這個特點，就缺少了唯物論認識論的最基本的性質，那不管它在於其他方面的見解如何，它就不能成為唯物論的認識論，而只是——至少在實質上是——唯心論的認識論。反之，承認了認識的客觀物質性，那麼，在其他的各點上雖然不符合於以上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標準，仍然可以說在基本上是屬於唯物論範疇的認識論。

就這一點來說，我認為，清華馮友蘭先生的了解是不明確的。他把區別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標準弄混淆了。他沒有提到是否承認認識的客觀物質性這個區別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根本標準，而把是否承認認識的實踐性認作第一個標準了。在他的文章裏，他寫道：

『在認識論這一方面，肯定認識為第一性的是唯心論，肯定實踐為第一性的是唯物論。前者是統治階級底哲學底認識論，後者是被統治階級底哲學底認識論』。

這段話的問題在那裏呢？問題在於，就整個哲學史來看，唯物論的認識論，並不都是肯定實踐為第一性的。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的錯誤，就指出了這一點。反過來說，肯定實踐或『行』為第一性的，雖然可以屬於唯物論的認識論，卻不一定都是唯物論的認識論，而有的也可以仍然是唯心論的認識論。大部

分的唯心論哲學，在認識論上固然是否定實踐爲第一性的。但有些唯心論哲學，例如西洋哲學史上的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哲學，中國過去的某些宗教哲學，是曾經把實踐、『行』的意義放在較高的地位上來看待的。近代法西斯哲學也是標榜『行』的哲學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哲學史上一切重視實踐或『行』的學說一律都歸入認識論的唯物論黨派之內，那一定會發生錯誤，一定會難免把一些唯心論的認識論誤認爲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而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唯物論者不了解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係，因此又會把一些唯物論的認識論誤認爲唯心論的認識論。

當然，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實踐論』）。不承認認識的社會實踐性或實踐高於認識的原則，就不能成爲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但很顯然，這只是就辯證法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的區別而言，而不是就一般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區別而言。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認識論有許多不同的主要點，如承認認識的主觀能動性和認識客觀眞理的無限發展可能性。而把實踐的觀點作爲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也是不同的主要點之一。至於一般的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認識論的不同，則主要的是在於把客觀物質性的觀點作爲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以上兩種區別標準是不應該加以混淆的。

因此，馮先生對於認識論方面的辯證法唯物論和機械唯物論所作的這樣的區別，我以爲是值得考慮的：『以爲實踐既然是第一性的，認識既然是依賴於實踐的，因此認識就只是實踐的工具，不能反過來影響實踐，這就是機械唯物論，以爲實踐雖是第一性的，認識雖然依賴於實踐，但是認識也反過來影響實踐，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在這裏，馮先生以爲機械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同樣地承認認識依賴於實踐，這是不符合於哲學歷史的實際情形的，也是不符合於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開頭一段的內容的。機械唯物論之爲機械唯物論——或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正是由於『它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之意義』（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機械唯物論的認識論的缺點，並不在於它不承認認識能反過來影響實踐，而是在於因爲它不了解認識依賴於實踐，不了解客觀物質之反映於人的主觀、精神是要通過『變革的實踐』這個媒介或環節，因此它就只能抽象地、直觀地來了解主觀反映客觀、精神反映物質的唯物論基本原則，而在說明認識如何獲得，以及認識如何能反過來影響實踐的時候，就不能貫徹唯物論的科學原理，反而給唯心論留下了空隙。這就是說，他們把合理的、正確的認識看做是要由特殊的天才或偶然地掌握了正確思想方法的個人來完成的，而不是從人民的生產實踐和階級鬥爭實踐的歷史過程中總結出來的。這樣在說明認識如何發生和如何影響實踐的時候，就不免要產生『意見支配世界』以及只有偶然掌握了合理思想的英雄偉人才能創造新世界的唯心論結論。十八世紀法國的資產階級唯物論哲學中就有這種缺點。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具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唯物論的認識論因素，他承認『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但由於他也不了解認識通過變革的實踐而發生與發展的道理，因此終歸陷入了唯心論的圈子，以爲正確的知識只有少數『先知先覺』的人物能夠獲得，而廣大人民則永遠是不知不覺的『阿斗』，甚至於有『心爲萬事之源』這樣十足唯心論的說敎。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所以，我們雖不能否認，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認識論，由於不了解認識依據實踐的原理，就不能貫徹唯物論，並在某一方面陷入唯心論。但不能單獨把認識依據實踐的原理作爲標準，來判決這些認識論整個來說就是唯心論的。因爲這個判決所應依據的第一個標準，是關於認識的客觀物質性問題。也許因爲馮先生的文章是專討論『知』和『行』的問題，就沒有注意到這第一個標準。但即使僅僅是沒有注意到，也是錯誤的。因爲這是不應該不注意到的。

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某些哲學的認識論中，能夠看到實踐對於認識的重要作用的，就可以說在這一點上具有了接近辯證法唯物論認識論的因素。所以，哲學史上即使是屬於唯心論的派別，但在認識論上有着重視實踐的思想的某些學說，有時就値得我們給與較高的估價。例如列寧對於黑格爾哲學中的這類思想，就是給與了相當高的評價的。在他的『黑格爾「邏輯學」摘要』裏，他寫道：『實踐在黑格爾那裏，是作爲分析認識過程中的環節，並且正是作爲到客觀的（絕對的——按黑格爾哲學的說法）眞理的推移』。列寧指出黑格爾的這些思想，是『接近了人以自己的實踐來證明自己的觀念、知識、科學的客觀正確性這一點了』。並且還說：『馬克思是直接鄰接着黑格爾，將實踐這標準放在認識論中』。列寧的看法，無疑是對的。黑格爾的哲學中重視實踐的思想，是接近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但列寧之所以對，就在於他是有分寸地恰當指出黑格爾的思想對於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只是『接近』了，而沒有把黑格爾關於實踐的思想直接看做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思想。他說馬克思在這一點上『鄰接着黑格爾』，却沒有說馬克思在這一點上就等於黑格爾。在這裏，列

寧對於唯心論者黑格爾和唯物論者馬克思中間的原則區別，是一點也不含糊的。我們研究哲學史上的問題，應該向列寧學習。例如對於中國哲學史上許多重視實踐的認識論學說，我們必須對於它的歷史價值、對於它的接近辯證唯物論的意義作足够的估計。但如果那是唯心論學說，那就一點也不能忘記它和唯物論中間的嚴格界線。所以，當我們從事這種研究的時候，就必須首先注意：第一、這種哲學思想是否承認認識的客觀物質性？如若它不承認正確認識的來源是客觀物質發展規律的反映，而以爲這來源是某種精神的本性，例如或者是來源於主觀的『良知』，或者是來源於客觀的、超物質的形而上學的『天理』，（『天理』的了解有時也可以有唯物論的性質，如果它是指自然界的規律的話）。那麼，即使它在知行問題上認爲行先於知或行重於知，它仍然是唯心論的認識論；第二，必須注意一切舊哲學對實踐的了解，與辯證法唯物論都有所不同。馬克思曾說過，唯心論者所了解的實踐，是抽象的、是失去了現實的感性血肉的概念，是爲着實現某種思想、理想或『理念』的（資產階級的）人的行動。唯心論者決不會從生產活動、階級鬥爭這樣具體的內容上來把握實踐的概念。中國舊哲學中所講的『行』，大部分是以封建統治階級的某一部分人的理想作爲它的內容的，在形式上它是表示爲一般道德倫理的踐履行爲，而在實質上則是一種夢想在矛盾百出的封建社會中追求不矛盾的調和秩序的行爲。這種空想的性質使它能够對封建制度的某些壞現象採取修正的以至於若干批判的態度，甚至於反映出農民的某些反對封建秩序的要求，但這與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變革的實踐』的意義仍是有原則區別的。第三，我們還要注意，當我們說到唯心論哲學中重視實踐的認識論學說是接近着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時候，只能是就某些像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家來說，而不是就一切唯心論的哲學家來說。這樣的哲學家，主張必須通過實踐才可以使我們的認識獲得客觀的眞理性，雖然他們對於客觀眞理性的理解是唯心論的，但正因爲承認認識必須有客觀眞理性這一點才接近了唯物論。就中國哲學來說，我以爲也可以按照同樣的方向來加以了解。但是，並不是說一切唯心論哲學中的實踐或行的思想都有這種進步的意義。某些宗教性的、神秘主義的唯心論，妄說實踐是達到某種超越的神秘知識的手段。法西斯主義的唯心論——例如蔣介石國民黨的什麼『力行哲學』，把農民主義的盲從思想和盲目行動作爲它的說敎的中心內容，這些荒謬胡說雖然也似乎在宣揚『實踐』或『行』的重要，但和辯證唯物論的實踐論是絲毫也不相干的。

我們說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不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這是不是等於說這些唯物論的認識學說裏一點也不涉及實踐的概念呢？當然不是的，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唯物論認識學說裏也會涉及實踐的概念，特別是中國舊哲學中，由於常常把『知』和『行』的問題作爲討論的主題，因此有些屬於唯物論派別的哲學者，也就不能不在自己的認識學說裏接觸這個主題，並且作出某些向辯證唯物論接近的貢獻。問題是在於，雖然這些唯物論接觸了認識與實踐的問題，並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也作出一些貢獻，而在這個問題上主張行先於和行重於知的，就成爲認識論上的唯物論派別的一個標幟。然而我們仍然應該說，這些哲學的認識論之所以是唯物論的，首先一個標幟還是在於它承認了認識的客觀物質性，其次，我們還要注意：這些哲學對於知和行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因此它們即使有所貢獻也是極片面的，歸根結底，它們就不能眞正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例如對於『行』的了解，費爾巴哈的看法是庸俗的，他『把實踐只在它的汚穢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上加以理解和確定』（馬克思），他自稱『實踐的觀點——飲食的觀點』。中國舊哲學的唯物論思想的『行』的概念，實質上也不能超出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秩序的範圍，僅到了譚嗣同、孫中山的時候才新添了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內容。一切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都看不見實踐的概念包含着生產和階級鬥爭這樣豐富的內容，這就使得它們不可能正確理解『人的社會性』，『人的歷史發展』，因此它們也就不能不『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而只依據人的某些自然性質（即不是依據人的本質，而只是依據某些動物的本質）來觀察認識問題。中國哲學中『性善』『性惡』的爭論，以及『天理』『人慾』的爭論，都是屬於這個範疇內的。這樣，由於它們對於人的實踐、對於行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對於人的認識、對於知的了解也不能不是片面的。首先，它們不能够正確了解到人的認識的主觀能動性，即不能正確了解在實踐發展過程中人的認識由感性的知到理性的知的飛躍，以及由理性的知再回到實踐的飛躍，它們或者是簡直就不知道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區分，只籠統地概稱爲『知』（如中國舊哲學中、特別是宋明以後的哲學中所常見的情形），或者只看見感性的知（如西洋哲學史上經驗論的情形），或者只看見理性的知（如西洋哲學史上唯理論的情形）。或者雖然也看見了感性的知和理性的知的區別，但卻不能理解由前者向後者的飛躍的規律，而只看作是互相區別的兩種認識能力（在中國舊哲學中以及西洋哲學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就理性認識回到實踐的飛躍這一方面的

能動性來說，由於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都不能够理解到認識的實踐的、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把合理的認識多多少少都當做一種『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來看待，因此它們對於認識能動性的這一方面的理解就常常落入唯心論的圈子，以爲偶然出現的聰明人或所謂『先知先覺』就是決定時勢的主要力量。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由於『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也不能了解認識發展的可能性。形而上學假定世界在本質上是不會變化發展的，中國的舊哲學差不多一般地都默認有着某種不變的『天道』（實質上是一種理想化了的封建社會秩序）的存在，爲自己設立了這樣的前提的唯物論者，在認識論上自然也就要把世界的認識看做是有窮盡的，以爲只要有人一旦掌握了正確的方法，就可以把事物的一切眞理或一切『天道』的內容一次汲盡。在這一點上也就有着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的片面性。

因此，當我們估計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在認識論上有什麼貢獻的時候，對於它們和辯證法唯物論認識論之間的區別，也必須認眞地加以注意。如果對於這些貢獻不適當地加以誇大，以致使人看起來覺得似乎這已經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了，那是不免會犯錯誤的。

附帶有一個問題要簡單地提一下，在前面所引的一段馮先生的文章中，說到唯心論的認識論『是統治階級底哲學底認識論』，而唯物論的認識論『是被統治階級底哲學底認識論』，這樣的提法我以爲也值得商榷。因爲這和哲學史的實際情形是不符合的。過去歷史上的統治階級都是剝削階級，由於這些剝削階級內部的矛盾和分裂，在思想上也會發生矛盾和分裂，因此從其中產生出哲學上的和認識論上的唯物論派別，也是常有的事。而就今天來說，已有了蘇聯、中國以及許多人民民主國家，統治階級已經是勞動人民或主要是勞動人民，而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哲學和唯物論認識論，已經成了合法的統治階級的哲學和認識論，這就和馮先生所說的情形完全相反了。我以爲，比較恰當的說法應該是：唯物論哲學及其認識論，是一般地代表着進步階級的思想方面，而唯心論哲學及其認識論，則一般地代表着反動階級的思想方面。這才是符合着歷史事實的。

知行難易的問題與『實踐論』

馮先生的文章還提到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談一談。他說：『關於我們所舉的中國傳統哲學對於知行問題的各種討論中，只有知行難易的問題，在「實踐論」中找不到與它有關的討論。這是因爲難易是主觀的範疇。在道德教訓中，可以應用這種範疇。因此，在中國古代的一個道德教訓中，有「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這句話。上面已經說過，中國以前的哲學家討論知行問題，是從道德的活動出發的。因此也就接受了這句話而對它加以討論』，『可是在我們對於事物作客觀分析底時候，我們是不涉及主觀範疇的，在客觀地分析事物底時候，我們不討論這一類的問題，因爲沒有這一類的問題。』

這兩段話的意思表現得不十分明確，但大體上是說：第一，『實踐論』和中國舊哲學的一個不同之點是在於後者在自己前面提出了道德活動的任務，而前者——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却不提出這樣的任務，而僅只是要解決如何對事物作客觀分析的問題。第二，知行難易的問題只是人的主觀範疇內的問題，而不是客觀事實裏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這種主觀範疇是獨立自生的，而不是客觀事實的反映。第三，道德活動是一種主觀的活動，因此從道德活動出發的中國舊哲學就提出了知行難易的問題，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既然不提出道德活動的任務，而只是重視對事物的純客觀的研究，所以就不涉及知行難易問題。在這裏，馮先生對於道德活動顯然仍是採取了資產階級唯心論的看法，而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則又採取了客觀主義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不是不把道德活動作爲自己的出發點呢？自然，馬克思主義哲學從來也不會把中國舊哲學中所提出的那種道德活動作爲自己的出發點，因爲那種道德活動一般地都只是想就封建社會範圍內來追求一種調和穩定的秩序的活動，而馬克思主義是反對這一切保守主義的、改良主義的以至於反動的活動的。這決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沒有任何主觀的活動目標。相反地，馬克思主義哲學爲自己提起了『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任務，從馬克思起，就在這一點上把自己的哲學和從來的哲學加以區別：『哲學家們曾經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但是現在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從來任何一個哲學家，都沒有、甚至於不能夢想爲自己提起過這樣偉大的任務，如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裏所提起的：『整個兒地推翻世界與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我們能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種主觀目標就不能用道德活動這個名詞來表示嗎？應該說，完全能用這個名詞來表示，並且還應該用特別大的字體來表示，以便使人明瞭這是比過去一切哲學中所設想的更高尚到不知千萬倍的道德活動。把根本改造世界的任務作爲自己的出發點，並

且把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作爲認識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北京解放後不久，馮先生曾在進步日報上寫過一篇文章，主張哲學家的特殊任務是在於經過解釋世界來改造世界，把解釋世界當做了出發點。其實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任務是：首先在改造世界的活動中來認識世界、或解釋世界，其次才是依據正確的認識來促進改造世界任務的完成。所以馮先生那種說法也是可以再考慮的。

說『知行難易』是主觀的範疇，而只有道德活動才是能於應用這種主觀範疇的活動，這也值得考慮。不論哲學範疇或道德活動，都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因此也都是社會的客觀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所以，在哲學範疇和道德活動中存在的東西，必然也可以在社會的客觀物質條件中找到它的基礎。中國舊哲學中關於知行難易問題的思想，不外是反映着封建社會的各種物質矛盾。封建社會的一些哲學家們努力設想許多道德原則，企圖以此作爲調節統治者內部以及統治者和人民中間利害衝突的標準，並圖藉此來長久維持封建社會的穩定，他們稱之爲『天經地義』。把這些原則設想出來，他們叫做『知』，把這原則實現在社會的和個人的生活中，他們叫做『行』。但是，由於封建統治者的行爲是由他們的物質利益所決定的，封建統治者互相間與封建統治者和人民間在物質利益上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在封建社會的人和人的關係中間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雖然有許多封建社會的思想家爲着求得封建社會秩序的永久調和和穩固而設想出這樣那樣的『天經地義』或道德原則，然而當着要求把這些原則實現爲封建統治階級的行動的時候，就遲早一定要遭遇到物質利益中間所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的障礙，而使這種企圖歸於失敗。事實上例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一類的道德原則，從來就很難說是在作爲階級的封建統治者中間眞正實現過。一方面是封建統治者想使封建制度永久化、合理化的主觀企圖，另一方是封建制度本身充滿着矛盾性、變動性、不合理性的客觀事實，這兩個方面的矛盾在封建社會存在的情形下是永遠不能解決的，這個不可解決的矛盾反映在哲學者的頭腦裏，就產生了『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那樣帶悲觀性質的結論。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雖然有時也有人感覺到，就是設想合理的道德原則，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如像程伊川等人就有『匪特行難、知亦難也』的說法，但在長久的時期中，一般都認爲『知易行難』才是眞理。這種情形，一方面是前述的矛盾的反映，而另一方面也是封建統治階級要在理論上爲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抓着一個原諒和辯解的根據。這又可以看作是過去哲學家只能說明世界而不知道改造世界的一種表現。辛亥革命前後，代表資產階級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又利用了『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成語，來爲自己對反動派妥協而不能堅持革命的軟弱行爲找開脫的理由。孫中山先生不了解這個成語在這時是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軟弱性，而以爲是成語本身妨礙了革命事業，因此煞費苦心地做了一篇翻案文章，創立『知難行易學說』來和中國的舊成語對立起來。很明白，僅憑這個『知難行易學說』，是不能改變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軟弱性的，因此要依靠在資產階級中間宣傳這個『學說』來挽救失敗了的中國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後，仍然又遭受了幾次的失敗。『知難行易』的思想僅有這樣一點積極作用，即在孫中山先生本人，由於明白了知之難，明白了中國革命理論的認識之艱難，因此就能够繼續學習，研究摸索，終於找到了『以俄爲師』這一條正確的道路，這又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另一種歷史特點。

所以，知行難易的範疇，決不是主觀的範疇，而也是客觀物質存在的一種思想上的反映。這個範疇也決不是只能應用於封建時代哲學家的『道德活動』（如前所述，中國舊哲學的出發點，在實質上並不是簡單的道德活動，而是封建秩序的合理化、永久化）中，而且也曾應用於孫中山先生所從事的資產階級革命活動中。在無產階級『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鬥爭中，自然也存在着這個範疇。『實踐論』中沒有在形式上直接提出這個問題，這並不是說它在實際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如馮先生所舉的知行先後或知行輕重等問題，『實踐論』裏也並沒有在形式上直接提出來，而在實際上却已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如果不是僅僅以『實踐論』一篇文章來限制自己，而能够參考馬克思主義的以及毛澤東同志的其他理論著作，就更容易明白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是如何正確地解決了知行難易的問題。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之所以能正確地解決問題，就理論本身的原因來說，是由於對問題採取了和中國舊哲學不同的觀察方法。過去哲學者多多少少總在難和易這兩個範疇中間劃了一條形而上學的死鴻溝。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把『難』的概念看做是似乎包含着絕對不可克服的障礙的意義，而談到『易』的概念時，又似乎認爲這是和『難』的概念絕對沒有任何聯系的東西。這樣，當人們使用『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成語時，那意思就是說，由於行動中的許多困難無法克服，因此，某些人在道德問題上的言行不一致或者在革命鬥爭中對反動派採取妥協投降態度，都是無可奈何的，甚至於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面，當人們又反過來說到『知難行易』時，那意

思又是說：『認識眞理是一件絕對困難的事，所以除了世界上偶然出現的天生的聖賢才智或『先知先覺』之外，是沒有能力克服這困難的。『平庸愚劣』的一般人民羣衆，就只能永久居於不知不覺的地位，從事盲目的活動。而由於『行易』的緣故，就是盲目活動或盲從的行動也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中的消極的反動的因素，這些因素曾被以蔣介石爲首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所利用，是大家所知道的。

這樣，不論『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易』的思想，都把『難』和『易』的範疇作了形而上學的分裂，都不能正確解決知行難易的問題。這在客觀上是前後反映着封建統治階級和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歷史條件，在主觀上就表現了這些剝削階級的偏見。工人階級的哲學——辯證法唯物論，把『難』和『易』看做是能够辯證地互相轉化的範疇。『難』不是絕對的，不是與『易』完全隔絕的。任何革命事業都有困難的方面，但也一定包含着某些有利條件；因爲革命是進步事業，而中國革命又是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因此，任何困難，經過鬥爭，都有可能加以克服，在克服困難的鬥爭中發展有利的條件，這樣就可以把『難』轉化爲『易』。『易』也不是絕對的，不管担當任何容易的任務，其中都會包含若干困難條件，如果我們有了驕傲輕忽的態度，不去認眞對付，困難條件就要發展起來，就要使我們碰釘子，使我們失敗，這樣，『易』就會轉變爲『難』。所以，『知』和『行』的難易問題，在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裏也會存在，也要被提起的。因爲在客觀上，工人階級的『知』和『行』中間，也就是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鬥爭中間，都在事實上要遇到這樣的問題。但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不是要形而上學地來提這個問題，不是要問何者爲『難』、何者爲『易』，並由此來找一條避難趨易的道路。如像中國舊哲學中以及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所表現的那種情形。工人階級所要提起和解決問題是：『知』和『行』，認識和實踐，『正確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任務』中間，存在着些什麼困難，又存在着什麼有利條件？如何發展有利條件來把困難加以克服？不論對於『知』或『行』，都要採取正視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態度。而不是採取迴避困難和在困難面前低頭屈服的態度。採取如毛澤東同志說過的『知難而進』的態度，而不是舊中國剝削階級的『知難而退』的態度。『行』是困難的，只要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毛澤東同志的許多著作，就很容易看見中國革命之能得到今天的勝利，是經過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曲折和困難。因爲輕視了工人階級改造世界的偉大事業中的這各種曲折困難，有些人才會要犯『左』的冒險主義的錯誤。但『行』的困難在利用和發展有利條件來進行鬥爭的主觀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在革命的困難面前表示低頭屈服，就是使有些人犯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的一個原因。至於『知』的困難，馬克思自己就曾指出：『在科學上面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怕險阻的人，有希望攀到光輝的頂點』。如果沒有『知』的困難，那麽，爲什麽革命鬥爭過程中有些人要犯各種各樣的錯誤，而毛澤東同志自始至終要用很大的力量來和各種錯誤、各種盲目傾向進行鬥爭，就不可以理解了。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裏嘲笑了那輕視認識之難的、對科學開玩笑的『知識裏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爲「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而敎條主義者就是這樣一種對知識採取輕率態度的人。但知的困難也同樣可以克服，只要肯開動腦筋，多想、苦想，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努力學習人民羣衆的革命實踐經驗，認眞調查研究，就可以獲得提高認識的成效。經驗主義者的錯誤之一，是在於對認識的困難表示屈服，不肯用力思索，不肯『認眞讀書』。而決不是由於天生就是只能做一個『庸俗的事務主義家』。所以，不論就知或行來說，都是有困難的，而困難都是可以轉化，可以克服的。知和行是互相聯系着，知和行的困難的克服也是互相聯系着。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我們克服『行』的困難，把實踐中克服困難的感性經驗加以總結提高，使之成爲理性的認識，這樣就克服了『知』的困難。有了理性的認識，又把它應用於實踐，使行動獲得自覺性，避免盲目性，於是反過來又進一步克服『行』的困難，並經過實踐的檢驗也一步克服了『知』的困難。這樣，由『行』到『知』，又由『知』到『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不斷地發現困難，不斷地克服困難，不斷地使『難』轉化爲易，『循環往復以至於無窮，而實踐與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可以說就是辯證法唯物論的認識論——『實踐論』解決『知行難易』問題的基本形式。

毛主席『實踐論』等名著譯成緬文

毛主席的名著『實踐論』已被譯成緬甸文，在仰光緬文『飛鷹日報』發表。最近新出版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劉少奇副主席的『論黨』，以及『勝利後的第一年』和『新中國婦女』。

墨家節葬不非殉

郭沫若

一　墨子的話

『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

墨子節葬篇這幾句話，有的朋友認爲，所指的不是周代。因爲在文字上沒有時代上的限制，它沒有明說是周代，也沒有明說是當今。

是的，限制時代的字面是沒有的。但假如我們注意到那『將軍』『大夫』等的稱謂，我們便可以知道那所指的究竟是什麽時代了。『大夫』的稱謂是周代以前所沒有的，『將軍』更是春秋以後的新名詞。

墨子不是考古學家，他沒有發掘過安陽商墓。因爲時代遼隔，『文獻不足』，在我看來，他無寧是只知道周代有人殉而不必一定知道商代也有人殉的。

節葬篇下文：『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韇）三操（繰），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鑑），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這兒的殉葬品裏面，有的朋友也說，沒有包含着人。其實『女樂』所指的就是人了。『女樂』人數可以多可以少。論語微子篇『齊人歸（饋）女樂』，史記孔子世家以爲『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還有『輿馬』一項也不一定是單純的車馬。『輿』的第二義是『人有十等』中的『皂臣輿，輿臣隸』的『輿』（左傳昭公七年）。故單舉一『輿』字，實可兼含着車與車夫。

二　殉的種種

殉有種種，有志願的與非志願的、有同穴的與不同穴的。奴隸的殺殉，非志願者居多。親暱者的生殉，志願者居多。死了，可以埋在一個坑裏，但也不一定要埋在一個坑裏。假使一個大墓裏面沒有殉葬者的痕跡，我們還不好說這個大墓墓主死時沒有殉死的人或制度。

例如西漢初年，田橫被漢高祖劉邦威逼至洛陽，在洛陽附近自殺了。同行的二客，在他葬後，『穿其冢旁孔，皆自刎，下從之』。這兩位殉死者是勉强同穴的。還有在海島中的其餘五百人被騙遠來，聽說田橫死了，也同時自殺了。這一大批殉死者，便不可能與田橫同穴。(一)

又例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來，崔杼把齊莊公殺死了。齊莊公的親近者有幾個人殉死。

『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尹、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脫）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孥）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這些死者也沒有和齊莊公同葬。齊莊公的葬儀是很簡單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用了四把宮扇，沒有打蹕靜迴避），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有兩解：一解爲送葬車，一解爲殉葬車。大概是後一種吧。）(二)

在這後一個故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齊莊公死時，晏嬰的態度和他所說過的話。莊公被殺，晏子也跑到了崔家門前。晏子的隨從問他：是死嗎？他說：誰道是我一個人的首長麽，我要死？那麽逃走嗎？他說：誰道我犯了罪嗎，要逃走？不死不走，他却說出了一段劃時代的名言：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出奔）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對於殉死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但這批判的態度是不澈底的，它在基本上依然肯定了殉死的合理。只要做長上的死得正當，便應該殉死；死得不正當呢，私暱者也是應該殉死的。這還只說到志願的殉死者，非志願的殺殉究竟應不應

誼，使根本沒有說到。這就表明了晏子所處的時代環境和晏子所受的時代限制。

三　孟勝的故事

墨家，在它的隆盛時期，是有宗教性的嚴密組織。它的首領稱爲『鉅子』，或『巨子』。『鉅子』一代傳一代，有點像教皇那樣。大概是第三代教皇吧，他的名字叫孟勝。他有這樣一段故事。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于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

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

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子於世，不可。

孟勝曰：不然。吾于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于墨者矣，求賢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

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請先死以除路。

還歿頭于孟勝前，因使二人傳鉅子于田襄子。

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

二人者已致令于田襄子，欲反（返）死孟勝于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勝已傳鉅子于我矣。不聽，遂反死之』。

這段故事見呂氏春秋上德篇。從這裏面，可以看出墨家的組織是怎樣嚴密，可以看出儒墨鬥爭的政治化，也可看出墨家對于殉死的態度。

吳起本來是儒者，他是子夏和曾申的弟子。（三）他比商鞅年長，而同是在魏文侯魏武侯兩代儒家空氣最濃厚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人物。（四）吳起受讒，由魏逃楚，做到楚悼王的宰相。他把商鞅後來行之于秦的差不多同樣的一套政策，大張旗鼓地行之于楚。因而同商鞅遭了秦國公族的衆怒一樣，他也遭了楚國公族的衆怒。楚悼王一死，楚國公族便羣起而攻吳起，把吳起殺了，更把吳起的屍首車裂了。吳起的悲劇也可以說和商鞅的悲劇一模一樣。但商鞅輔秦孝公二十一年，而吳起輔楚悼王僅僅一年，這是他們兩人遭遇上的最大的不同。因而商鞅的法在秦固定了，吳起的法在楚便沒有固定。後來秦强楚弱，這兩個人的遭遇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因素。

明白了當時楚國的情勢，便可以明白在孟勝故事中所包含着的儒墨鬥爭的政治化。墨家鉅子孟勝是陽城君的老師、朋友、臣下，而陽城君是謀殺吳起的參加者，可能還是組織者。看他去楚國之前先把自己的城池委託孟勝把守而且剖璜爲符，是見他是早有決心的。孟勝所輔助的是這樣一位保守黨，而孟勝還死心踏地爲他死難，我們從這裏也儘可以看出墨家思想的本質了。

但在這個故事裏面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對于殉死的態度。墨家是贊成殉死的。徐弱的『請先死以除路』，很有意思。這可以使人聯想到，安陽的商王墓底正中處那個小坑中的殉死者，（六）那一定就是『先死以除路』的人。

孟勝的死是殉城池，殉陽城君（可能他以爲陽城君死了）。徐弱及其他八十五弟子的死是殉孟勝，殉師。特別是最後二人的死最爲突出。鉅子已經選定了，新鉅子叫他們不要死，而他們偏要回到楚國去殉舊鉅子。這可表見墨者的重視私誼比重視組織還要强。

要之，墨者是贊成殉死的，這也正是『墨者之義』。墨家尚同，尊重君權。墨子所稱譽的是『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七）這和晏子的『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是同樣的意義。晏子是墨家所最崇拜的人。『晏子春秋』一書大抵即成于墨家後學之手。了解得這一層，也就可以了解墨子節葬篇爲什麼把物殉看得比較重，而把人殉却看得比較輕。墨家是主張節用的，物殉太浪費了，故加意反對。人殉如出於自意識的道義感，在墨家看來，不僅不應該反對，倒寧是應該獎勵的。

（八月二十日）

附註：（一）故事詳見史記田儋列傳。

（二）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此只『四翣』，貶了等。又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此只『七乘』，大概也貶了等。

（三）參看拙作『青銅時代』中的『述吳起。』

（四）先秦法家導源于『子夏氏之儒』。商鞅爲李悝弟子，李悝爲子夏弟子。參看拙作『十批判書』的『前期法家的批判』。

（五）在商鞅悲劇中也有同樣的情形。商鞅爲秦惠王所殺，而秦惠王

師事墨家第五代鉅子腹䵍。故事見呂氏春秋去私篇。

（六）商王墓『於墓底開小方坑，殉人一犬一』。見『十批判書』改版書後，又見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日報學術版郭寶鈞『記殷周殉人之史實』。

（七）『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見墨子非命上篇。

（補白）（一）『關于奴隸與農奴的糾葛』（本刊上期）中所提到的約翰•莫里司，以前曾做過中學教員，現任倫敦大學的講師。他是關于英國文史方面的研究者，並非社會經濟史學家，希臘史亦非內行。他是英共黨員，但自由主義色彩相當濃厚。（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崇武來信。）

（二）『關于周代社會的商討』的訂正：

本刊四卷四期三十二頁下欄倒數第二行（註一）中『初葬』係『先葬』之誤。三十六頁下欄十、十一行『祖父』應改爲『父親』。

訂正

本刊四卷四期第二十一頁下欄第二十五行『是以認識爲基礎的』應爲『是以實踐爲基礎的』。又四卷五期第十五頁下欄第二十四行『……因爲由蘇聯發起外國的侵略似乎是給他們以威脅的。』外國的侵略五字上下應加『 』。又，第三十一行『製的顯造行謂權旅大所問政來欺騙人民』應爲『製造所謂旅大行政權的問題來欺騙人民』。又，第五十八頁『學術問答』第二題答者『梁存厚』係『梁祖厚』之誤，特此訂正。

莫斯科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與我交換重要文物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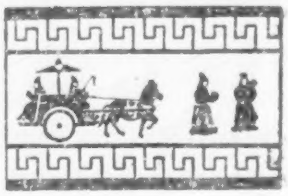
蘇聯莫斯科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爲了促進中蘇兩國學術上的交流、加強兩國科學工作的聯繫，特將該館所製的復原『北京人』男女頭像模型及人類頭骨化石模型各一件，贈給我國有關機關，要求交換『北京人』時期的石器及動物化石。該項贈品已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撥交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保存，並由該局將『北京人』時期之動物化石及石器模型等三十二件，交由我國外交部轉贈給蘇聯莫斯科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中國米丘林學會
在新鄉舉行年會

中國米丘林學會根據本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的決議，並應平原省行政當局及平原分會的邀請，決定學會的一九五一年年會在平原省新鄉市召開。會議是由八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討論並通過理事會一九五〇年的工作報告，一九五一年的工作計劃，及改選理事會。會議期間，並分別聽取各分會的工作報告，勞模報告和論文報告。

成渝鐵路沿線掘出
史前冰期龍骨化石

自成渝鐵路動工修築以來，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爲重視和保護祖國歷史關物，派遣一成渝鐵路沿線古物調査小組，注意和收集沿線因施工所掘出的古物。在八個多月中，已掘出很多學術上有價值的古物，如漢墓陶俑以及古生物化石等。其中資陽工務段在修築黃鱔溪橋基時，挖掘出五十八件史前冰期古生物爬虫化石。據古物調査小組初步鑑定：『這批龍骨化石的骨類如下：牙骨三件、脊推骨六件、肢骨二十三件、尻骨一件、膝骨一件、爪骨一件、骨片二十三件、共五十八件，雖還不能湊成一個古生物爬虫類遺骨的整體，但今有此史前化石出土的收獲，已證明史前四川盆地爲內海及冰川所經之處，對於學術上有高度的研究價值。』



周代殉葬問題

榮孟源

殷周殉葬問題，近來頗爲歷史學者所注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陽發掘的殷墓，其中有大批殉葬人，殷代有殺人殉葬制度，已被大家所公認了。周代是否還盛行着殉葬制度，大家意見尙未一致，願將自己的一點意見，向史學界的先進請教。

一　地下發掘

考古學者在今平原省濬縣、汲縣、輝縣一帶，發掘了一百五、六十座周墓，僅僅發見三座墓中共有六個殉葬人。『辛村（在濬縣）西周墓，發見御夫一人，兩手背縛，俯身，殉輿旁。又一墓殉一人，屈肢，與犬同葬，在北墓道，另一專坑，葬馬骨七十二架，車十二輛，無人。汲縣戰國墓，一墓中殉四人，分列棺之前後左右，皆保首領，殆生殉者。兩周墓葬發掘，所見只此六人，較之殷代，所差遠甚。』（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光明日報』，郭寶鈞：『記殷周殉人之史實』）

汲縣與輝縣的周墓，全屬戰國時期。濬縣辛村發掘了八十多座墓葬，其中墓二出戟十柄，銘文爲『衛』『侯』；墓五出鬲一，銘文爲『衛夫人文君』；墓六十八所出的銘文，也有『衛』字。周初『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史記』：『衛康叔世家』），這些墓葬正在淇水之濱，無疑地是衛國的墓葬。據郭寶鈞先生『濬縣辛村古殘墓之淸理』文中說，墓六十出一尊，銘文二十四字，第一句是『惟公原于宗周』，其爲西周墓葬，也無可疑。墓四十二出戈十二柄，銘文爲『晋季』，當是春秋初期衛宣公墓。這一些墓葬，排列有序，衛宣公墓之次，即衛侯朔墓；再次一大墓，當是衛文公墓；再次亦即墓葬盡頭，有一大墓，當是衛成公墓。總計西周期衛侯墓發掘了一座，侍從墓五十座以上；其餘爲春秋初期的衛侯墓與侍從墓。

辛村八十多座衛國墓葬，按形制可分爲四種。甲種墓，有墓道、羨道、墓室、棺穴各部，形制最大，共有六座。乙種墓，有墓室、棺穴、無墓道，形制亦堪與甲種比，共有四座。這兩種是公侯或夫人的墓葬，有的全長達五十六公尺，比武官村發掘的殷王墓（長約四十五公尺）還要長；有的墓穴深達十二公尺，比武官村殷王墓（深達八公尺四寸）還要深。據郭寶鈞先生推算，築造這樣的大墓，只土工一項，至少須三千工以上；築造武官村大墓，也須土工三千以上。衛侯墓規模之大，大體與殷王墓相同；所不同者，是殷王墓中有千百的殉葬人，衛侯墓中一般沒有殉葬人（只墓一與墓十七各有一殉葬人）。丙種墓，墓室、棺穴與乙種墓相同，惟形制略小。丁種墓，無墓室與棺穴之分，棺穴就是墓室。這兩種是公侯侍從的墓葬，規模和武官村發掘的殷代小奴隸主墓葬相等；但是殷墓多有一幼童殉葬，衛墓絕無用人殉葬的痕跡。殷代小奴隸主的墓葬，墓穴容積僅一二•五立方公尺，有棺無槨，隨葬物品不過銅玉陶等器數件或十數件，尙有一幼童殉葬。周代衛侯的墓葬，墓室與墓道、羨道總容積一五〇立方公尺，有棺有槨，墓室四壁滿佈明器，近墓道處還有許多車馬，可是除去一、二例外，都沒有殉葬人。周王墓葬，雖然尚未發掘，無從推斷一定沒有殉葬，也無從推斷一定有殉葬。但周初因爲防止殷之頑民叛變，才封康叔於衛，爲五侯之長，衛國的各種制度，應該可以代表周代。就衛墓發掘來說，用人殉葬的風氣，確是殷代甚盛，周代已爲殘餘，殷周兩代截然不同。

二　古籍記載

『詩經』、『左傳』、『禮記』、『戰國策』、『史記』、『墨子』以及『吳越春秋』、『西京雜記』等書中都有關於周代殉葬的記載。從這些古籍中，我們可以了解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殉葬情形。

『禮記』『檀弓』下記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即宰）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孔穎達疏，陳子車是齊國大夫，魯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一五年）曾在炊鼻地方與魯國作戰；陳子亢是子車之弟，孔子的弟子。陳子亢既然說殉葬非禮；如果這個禮不是陳子亢憑空杜撰的話，可見陳子車原籍齊國或其死地衛國

，都沒有殉葬制度。陳子車的妻和宰要殉葬，不說係根據定制，而只說是爲了有人在地下侍候死者，更可見當時齊國與衞國都沒有殉葬制度。

『左傳』宣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記載晉大夫魏顆事：

『初，魏武子（魏顆之父）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魏顆說他父親要妾殉葬是『亂命』，可見當時晉國沒有殉葬制度。

『左傳』成十年（公元前五八一年）記晉景公事：

『晉侯……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用一小臣殉葬，不似殷代那樣大規模的殺人殉葬。而且所以用這個小臣殉葬，是因爲他自言夢見了背着晉景公上天。杜預註說：『小臣以言夢自禍。』如小臣不言夢，就不一定使他殉葬。可見在晉國這一件事是特殊的，而不是經常的制度。

『西京雜記』（據『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卷六（『抱經堂叢書』本爲卷下），記漢廣川王掘墓事：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獲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

『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

……』

『西京雜記』係魏晉時人的筆記小說，所記多不足據爲信史。上引一段，第一句『廣川王去疾』就錯了。『漢書』卷五十三『廣川惠王傳』與卷十四『諸侯王表』，都作『廣川王去』，並非『廣川王去疾』。漢廣川國即今河北省冀縣、南宮、新河、棗強、武邑、衡水幾縣地方，在戰國時期屬趙國。戰國魏襄王、哀王都建都大梁（今開封）、襄王墓在汲縣，晉咸和五年（公元三三〇年）曾被發掘，哀王墓因不知地址，但其墓絕不應在趙國境內。春秋初期晉都絳（今山西省聞喜縣），晉靈公墓當在聞喜附近。所謂廣川王發掘『國內冢藏』，是發掘廣川國內，晉侯、魏王的墓葬既不在廣川國內，廣川王又不能到廣川國外去發掘，那麼『西京雜記』所載，就不是憑信了。所謂『幽王冢』，『太平御覽』（據『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卷五五六與『太平廣記』都作『幽公冢』。如是『幽王』，固然可解釋爲周幽王；不過，周幽王被犬戎殺死在驪山下，其墳墓當在長安附近，廣川王怎敢到漢皇帝所在的京畿去發掘古帝王陵墓呢？再看前一條記晉靈公，後一條記晉大夫欒書，都是晉國事，那麼這個『幽公冢』，應是晉幽公的墓葬。按前例『魏襄王』條以後，『魏哀王』條就只稱『哀王』而省略『魏』字，那麼『晉靈公』條以後，只稱『幽公』而省略『晉』字是合理的。因此，可以斷定明本或今本『西京雜記』中的『幽王冢』，是『幽公冢』之誤。由此可知，即使把『西京雜記』作爲信史，也找不出周幽王用許多人殉葬的史實來。

據『西京雜記』說，魏哀王墓有六個『武冠帶劍』的石人，又有四十個石婦人（宋刊本『太平御覽』引，無『石』字，但據所記看來：『牀左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盥捧食之形，』可知是石人無疑），沒有殉葬人；晉靈公墓有石獲、石犬與四十餘石人，沒有殉葬人；魏襄王墓、魏王子且渠墓、晉大夫欒書墓，都沒有殉葬人；惟晉幽公墓有百餘屍，似爲殉葬。但所記爲『或坐或臥亦猶（『太平御覽』無『猶』字）有立者』，實使人懷疑。第一、殺死以後殉葬，是不能使屍體直立的；生殉使屍體直立，只有活埋一法，不然也是不能直立的。第二，既言『百餘屍縱橫相枕藉』，又說『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好像秩序井然，這是自相矛盾的。按『禮國君即位而爲椑，初即位即營死事。』（『左傳』定十三年孔穎達疏）鄭莊公即位，就築造攻墓（同上）；秦始皇即位，就築造攻墓（『史記』：『秦始皇本紀』）；那麼晉幽公即位之後，自然也築造了他自己的攻墓。晉幽公是一個荒淫之徒，『史記』『晉世家』說他：『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說：『「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晉幽公既死於醋海風波，那麼幽公夫人把其丈夫平日所接近的女人，一起殺死，拋在攻墓中是可能的。因爲幽公墓早已築成，所以『甚高壯』。因爲幽公夫人在氣憤中殺人拋入墓中，所以屍體『縱橫相枕藉』。那麼即便把『西京雜記』所記的晉國和魏國墓葬當作史實，也只有一座幽公墓中有許多屍體，而且只能說明妒婦的殘忍，不能說明晉國有

殉葬制度。

『左傳』成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載：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宋是殷王子微子啓的封國，既然是文公死後『始用殉』，可知以前宋國遵周禮廢除了殉葬制度。既然『左傳』把宋國『始用殉』特別標明，可知其他國家一般都沒有殉葬制度。

『左傳』定三年（公元前五〇七年）記邾莊公死：

「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

杜預註說，邾國這一次用人殉葬，蓋是邾莊公的遺命。孔穎達疏：『邾子好潔，以人爲殉，欲備地下掃除。』那麼如果不是『邾子好潔』，就不一定『以人爲殉』。可見邾莊公墓『殉五人』，還不是當時一定的制度。

『左傳』昭十三年（公元前五二九年）記楚靈王死：

「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楚靈王是被逼自縊，申亥氏對楚靈王要盡其愚忠。根據這一條記載，尙無從確定楚國是否有殉葬制度。

『吳越春秋』（據『四部叢刊』影印明弘治刻本）卷四記吳王闔閭葬女事：

「吳王有女滕玉……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

『吳越春秋』係漢晉間稗官雜記，多所附會，不足全信。如吳有殉葬制度，闔閭女死，自可用應殉葬的人去殉葬，不必用白鶴去騙人；闔閭應把殉葬人有次序地安置在一定的位置上，不能把一些人亂埋在羨道中；國人應認爲是理所當然，絕不能非難闔閭『殺生以送死』。可見即使闔閭葬女，眞用許多人殉葬，那也是一件特殊事件，而不是當時吳國有殉葬制度。

『史記』『秦本記』記秦國殉葬事：

「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

「獻公元年，止從死。」

『戰國策』『秦策』記秦宣太后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葬秦始皇事：

「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

公元前六七八年秦武公死，『初以人從死』，是以前秦國並沒有殉葬制度。公元前六二一年秦繆公死，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秦國人賦『黃鳥』（『詩經』：『秦風』），是反對用三良殉葬；『詩經』與『左傳』都反對『以人從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也說：『繆公薨，殉，殉以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可見除去秦國，當時各國都沒有殉葬制度，秦國所以有殉葬制度，是因爲它落後，即『史記』『秦本記』所說：『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獻公元年，『止從死』，是從此以後，秦國也廢止了殉葬制度。因此，公元前二六五年，宣太后要使魏醜夫殉葬，庸芮才能反對他說：『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死，二世令許多宮人從死，又爲了避免泄露墓中機藏殺死許多工匠，只是說明二世殘暴，不是說明秦國在秦始皇以前還有殉葬制度。

『墨子』『節葬下』說：

「天子殺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

只據這一句話來說，好像春秋戰國時期，殉葬制度確實普遍地存在着。可是讀全篇文章，就不能這樣了解。墨子反覆申述反對『厚葬久喪』的理由，卻沒有提出反對殉葬。墨子指出古時越東輆沭之國，『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不是中國習俗。他更明確地叙述當時的墓葬情形：『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日必捶涂，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墨子提出『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輿馬女樂皆具……』似乎有殺女樂人殉葬的事情，但殺殉不能僅說『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而且據地下發掘和文字記載，不會見有女樂人；又與泛指殺一般人殉葬的『天子殺殉……寡者數人』係不符，可見『天子殺殉』係不是指的周代，而是指的古代，所謂『女樂』不是指的人，而是指的樂器。

『禮記』『檀弓』下還有一條：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這一條記載，沒有明白指出時間和地點，可是也說明了周代以殉葬爲非禮，即沒有殉葬制度。

根據以上各種書籍的記載，齊、晉、衛各國沒有殉葬制度。邾莊公殉五人是特殊事件。宋國殉葬是公元前五八九年才開始的。南方吳、楚有殉葬事，却沒有殉葬制度或不能確定它一定有殉葬制度。秦國有殉葬制度，可是不能以秦國二百九十五年的殉葬史，代表周代八百年的歷史；而且落後的秦國，也不能代表周代。與周朝關係最密切的衛晉齊等國既然一般都沒有殉葬制度，我們就可以說，周代與殷代不同，周沒有殉葬制度，有幾件殉葬的事，只能看作特殊的，舊日殉葬制度底殘餘。最可注意者是宋國，它是殷朝的後裔，它應當保存着殷代底殉葬制度；可是它從西周初年到公元前五八九年以前，五百餘年都沒有殉葬制度。那麼不難明白，周禮代替了殷禮，殷朝底殉葬制度被周朝取消了。

三　俑

俑是用來送死的土木偶。觀察一下俑的問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周代殉葬問題。古籍中關於俑的記載：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殆於用人乎哉』（『禮記』：『檀弓』下。據『禮記』孔穎達疏，『殆於用人乎哉』是孔子對『爲俑者不仁』的說明，孔子言語雖簡，作一句說明是可以的。孟子引仲尼的話，與『檀弓』所記同一來源，那末『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不一定不是仲尼說的了。）

『及葬言鸞車象人。』（『周禮』：『春官』『冢人』）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太平御覽』卷五五二引王肅：『喪服要記』）

俑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的。那時候，人死了，就把他生前的用具石器、陶器之類，一起埋葬；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自然誰也不侍候誰，所以沒有殉葬。後來階級出現了，奴隸主生時要剝削奴隸，死後也要奴隸來侍候，因此殉葬制度發生了，即鄭玄所說：『殺人以衛死者曰殉。』再後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隸佔有制度，勞動者由奴隸主能當做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變爲封建主只能買賣而不能屠殺的農奴；而且在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殘餘的奴隸，活着對於封建主更爲有利；因此，殉葬制度不能不基本上停止。但是封建主也是剝削階級，他死後還是要『備其器物，若似生存』（『禮記』『檀弓』下，孔穎達疏），因此有『備物而不可用』的明器出現，有代替殉葬人的芻靈，即茅草人出現。隨着生產力的進步，後來又以『刻木爲人，而目發動與生人無異』的俑（當然，俑的製造技術，也是由粗到精的）來代替芻靈。所謂『象人』、『桐人』，都是『芻靈』與『俑』之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夢見周公，專述周禮的孔子詛咒『始作俑者』，斷子絕孫，再和魯哀公葬父連桐人都不用的話（假如『喪服要記』所說是可靠的）結合起來看，可以設想周代廢除了殺殉制度。不過偶人的製造却愈來愈像生人了。

四　用人爲祭牲

殷代有殺殉制度，是爲了用這些被殺的死奴隸去侍候那些死奴隸主。以相同的意義，殷人在祭祀的時候，還要殺人爲犧牲。這在殷陵的發掘中，在甲骨文中都有確實證明。在周代因爲殺殉制度廢除了，所以用人爲祭祀的事也少見了。『左傳』中我看到了三條：

僖一九年（公元前六四一年），『宋公（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昭十年（公元前五三二年），『平子（魯國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杜註：「壹同也，同人於畜牲。」）、將誰福哉！」』

昭十一年（公元前五三一年），『楚子（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蔡國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宋襄公殺人以祭社，宋貴族司馬子魚就反對他，嚴厲地說：這樣做，將來能得好死就是徼倖。楚靈王殺人以祭岡山，楚貴族申無宇就反對他，嚴厲地說：這樣做，後日必然後悔。可知宋楚兩國都沒有用人爲祭牲的制度。魯國既是『始用人於亳社』，可知以前魯國並無用人爲祭牲的制度。臧武仲既然說，用人爲祭牲是無義，周公不饗受魯國這種祭祀，更可知魯國從來沒有用人爲祭牲的制度。宋國是殷朝後裔，都沒有殺人爲祭牲的制度；爲周朝定禮樂的周公，又反對這種制度；那麼可知周代有用人爲祭牲的特殊事例，但並沒有這種制度。

從地下發掘來說，從古籍記載來說，從俑和用人爲祭牲等事來說，周代個別殺殉的事實是有的，而殺殉制度是沒有的。殷代用許多人殉葬，周代廢除了殉葬制度。殷周兩代前後相連，而殉葬制度就有這樣大的變革，這是什麼緣故呢？是不是因爲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從而影響到上層建築也發生變化？

一九五一、八、一、於北京。

加强人民司法工作者的思想建設

陶偉　王式九

人民司法工作的基本任務——爲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維護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保衛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利益而鬥爭的任務，無疑是十分重要、異常光榮的。爲了完成這項任務，人民司法工作者首先必須具有堅定明確的革命立場，認清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階級關係、當前的政治任務和羣衆鬥爭運動，進一步還要深入領會與正確掌握根據上述立場觀點與實際情況而制定的各項基本政策的精神實質，並完整地、細緻地貫徹與運用到實際司法工作中去。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粉碎了一個建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基礎上的官僚、買辦、法西斯統治的反動政權，建立起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伴隨着這個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鞏固與發展，中國人民的經濟建設與文化生活，就獲得了有力的保障和蓬勃的發展。一切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反動殘餘勢力，則在人民民主政權的統治之下，遭到了嚴厲的鎭壓，而逐漸走向全部的肅清和澈底的死亡。在這個嚴重的過程中，人民司法工作必然地成爲一個極重要的武器。一方面是：堅決鎭壓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嚴厲懲罰一切非法的犯罪行爲，及時調整人民內部的關係，並通過這些工作，教育改造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落後思想意識，向人民進行新的法紀教育。所有這些嚴重的任務，都是與每一個人民司法工作者的經常工作密切關聯着的。另一方面：司法工作本身又是一個『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共同綱領第十七條）的過程。這樣，就歷史地規定了人民司法工作者繁重的任務。

列寧說：『新政權創造新法治及新秩序，新秩序就是革命的秩序。』革命的政權，革命的秩序和革命的法治，三者是不可分割的，要保障、鞏固革命的政權和革命的秩序，就必須創造、建立革命的法治。新中國的革命的法治，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原則通過司法工作與人民的革命鬥爭和羣衆運動相結合的；依賴着人民革命政權的强力支持，而成爲一項有力的武器；它反過來又起着保護人民和鎭壓反動以鞏固政權、安定秩序的積極作用。革命法治的形成，必須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根據我們的政策和羣衆的創造，不斷地總結工作經驗和提高工作質量；並在工作中由創造典型到發現規律，逐漸進而爲『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並貫澈到實際工作與羣衆生活當中去。

全國（除台灣外）解放以來，各地司法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之下，在各級人民司法工作人員積極努力之下，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無可否認：目前全國各地司法工作當中還存在着很多缺點。這些缺點的存在，主要由於很多司法工作人員還存在着各種不正確的立場觀點；還不能很好地體會與掌握政策；還未認清人民司法工作的革命性質。

根據目前一般反映：很多司法幹部認爲：『現在無法可司』，『沒有法律條文依據，不好辦事』。特別是過去沒有受過革命鍛鍊的新參加工作的司法幹部，雖然在學習和工作中對於肅清舊法觀點有了一定的收獲，但還在很多地方有意無意的表現出『照條文辦事』的舊觀點。由於他們習慣於過去的『摳條文』，離開法律條文就感到沒有依靠。有一些老幹部，雖然經過了比較長期的革命鍛鍊，對於新的人民司法工作也積累了一些片斷的經驗，但對人民司法工作終是比較陌生的，加以政策水平不高，對已經發展起來的繁雜了的社會生活與羣衆運動缺乏足夠的認識，在處理某些複雜的案件時，便感到經驗的不足，據他們看來，比較抽象的政策感到不易掌握，而也感到法律條文的需要。他們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這些新老幹部在處理問題時，還是從過去的舊法律觀點或片面的經驗出發，只是孤立地看到某些具體案件，而看不到這些案件對於整個社會的關係和影響；還是固定地對待某一些具體問題，而看不到新國家一切事務都在運動、變化與發展。因此，他們就不能把我們的政策與他們所碰到的具體問題密切聯系起來，加以適當的解決，而需要固定的法律條文作爲解決一切問題的現成答案，否則一遇到比較生疏或複雜的問題，便感到無所適從，這就充分說明了他們還沒有深入地體會新民主主義國家政策的精神和實質。我們決不忽視法律條文的重要性，但我們也反對把法律條文當做司法工作的唯一武器。我們在目前必須深刻體會到人民需要與可能有的法

律條文，只能是人民在多方面的不斷發展和逐漸深入與細緻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總結出來的，『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或『大體上相應於客觀過程的法則性』（實踐論）的產物。絕不能設想新中國的法律也像反動的舊六法抄襲資本主義國家法律一樣去抄襲蘇聯或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法律，很快就拿出整套的刑法和民法。因此，在目前階段的人民司法工作中，主要的還不是馬上拿出成套的，『具體的』法律條文，供給司法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去簡單的應用，而主要的是要依靠我們人民的司法工作者根據我們的既定政策，總結羣衆鬥爭經驗，在司法工作的實踐中，逐漸創造出切合實際的法律。

本年五月十一日政務院批准發佈的政治法律委員會彭眞副主任『關於政法工作的情況和目前任務』的報告中明白指出：『在立法方面，目前尚不宜於急求制定一些既不成熟又非急需的「完備」、「細密」的成套法規，以致閉門造車或束縛羣衆的手足；應當按照當前的中心任務和人民急需解決的問題，根據可能與必要，把成熟的經驗定型化，由通報典型經驗並綜合各地經驗逐漸形成制度和法律條文，逐步地由簡而繁，由通則而細則，由單行法規而形成整套的刑法、民法』。這是我們人民司法工作者在立法方面當前所能採取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也是當前我們對這一工作唯一正確的看法，因爲『我們的一切工作既不能從反動的「六法全書」之類的觀點出發，也不能教條主義地從一些抽象理論出發，必須從我們的當前實際情況出發』。

我們當前司法工作的原則是：『有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之規定；無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因爲，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是針對當前實際情況最高的指導原則，它是客觀事物正確的與集中的反映，它已經給我們在處理問題上指出了正確的方向。凡是依據新民主主義政策而能深入體會其精神和實質並正確地運用到實際工作當中去的，都能把工作做得很好；凡是不肯這樣做的，則對某些已經有了的新法律條文，也不能恰當與深入地瞭解和適用，以正確的認識與處理問題。如去年婚姻法頒佈以後，有不少幹部處理離婚案件時，會發生了不准離婚和一律判離的各走極端的偏向，甚至有的竟把婚姻法叫作『離婚法』或『婦女法』，並有個別地區爲了追求更『細密』『具體』的條文，竟訂出與『婚姻法』精神完全相反的『補充辦法』之類；今年懲治反革命條例頒佈之後，有些幹部在處理反革命案件的量刑上仍然存在着重罪輕判的偏向，還有的錯誤地把『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整個政策割裂開來，機械地認爲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三條以前是鎭壓，第十四條是寬大。這些事例，正好說明他們把法律與政策割裂開來，把法律看作是一種孤立的東西，是一種『超政治、超時間空間』的東西，看作與政策無關的東西，他們抓住了法律就死摳條文，忘掉了指導立法的基本政策精神，從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正確地適用法律，甚至完全與政策相反。這就充分證明：工作是否犯錯誤，還不完全在於法律之有無，而主要的在於自己是否已經具備了對於政策的深入與正確的瞭解，和對於豐富與繁雜的客觀情況有無足夠的認識，如果不能明白這個道理，而只是機械地搬用與依靠法律條文，依然會發生各式各樣的錯誤。

有些新幹部喜歡以新舊法作形式的對比，每當接觸到新法律時，如果新法與舊法某些部分『規定相同』時（如對蘇聯刑事訴訟程序的七個原則及自由心證等等），便感到一種會心的欣慰；如果舊的有新的沒有時（如認爲舊六法親屬編規定的東西婚姻法沒有加以規定等），便感到一種遺憾的蹩扭；如果舊的沒有而新的有時（如對婚姻法規定了繼承的問題等），就認爲這是體例不夠謹嚴。這顯然是完全不懂人民的法律是以是否符合於最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爲取捨的標準，完全不懂在人民的法律中貫串着一種完全從實際出發的澈底的革命精神，而祇是簡單地以舊法的立法技術來衡量新法的立法技術，以舊法的形式套上新法的形式。這樣，就違反了『新內容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開闢自己的道路』（列寧）的原則，而是讓舊法經過各種各樣的形式在新法中開闢它的道路，這種對待舊法的態度，不是從思想上予以斬草除根，而是在思想上還寄予無限的留戀；而對待新法的態度，不是虛心地認眞學習，而是吹毛求疵地指摘。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總以爲舊法至少某些部分還是有用的，如有的認爲新民主主義社會既然保護私有財產，則舊法中關于保護私有財產的某些部分總還是有用的。但他們沒有更進一步地認清舊法保護私有財產，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而新民主主義法律之保護私有財產，則是爲了鼓勵生產積極性以提高生產力，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以促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部勝利，從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最後消滅私有制，二者是有着根本的區別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去年十一月三日發佈的『關於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着重指出：『爲了正確的從事人民司法工作，首先必須劃清新舊法律的原則界限』，所謂劃清界限，絕不是從法律本身的形式上去劃清，而是從新舊法律的原則上亦即本質上去劃清，而且要從司法工作者的思想上去劃清，儘管新舊法律

在某些形式上有相同的或類似的規定，但由於新舊法律的階級本質不同，因而它的作用也就不同。作爲一個人民司法工作者，如果沒有劃淸這個新舊界限，就不可能具備正確的思想認識，一旦遇到具體條件，必然會陷入無立場、無原則的泥坑中，分不淸敵我。如有些司法工作人員把破壞國家經濟建設的案件看作是普通竊盜案件；甚至有的把惡霸地主勾結反動軍官聚衆搶刼也看作是普通搶刼案件，而予以輕判了事，不問其是否以反革命爲目的。所有這些教訓，我們必須淸醒的認識，深刻的警惕，一個無立場、無原則、無政策觀點的司法工作人員，對國家人民，是隨時隨地都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

另一種情形，則是機械地搬用蘇聯法律，他們教條主義地認爲新中國的法律必然以蘇聯的法律爲母法，只要是蘇聯的法律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搬過來應用，以爲非此就不能表現它的『進步』。當然，我們是要學習蘇聯先進理論與經驗的，但絕不等於就是機械地搬用蘇聯法律，我們首先是要學習蘇聯給我們介紹過來的馬列主義國家觀與法律觀的理論知識，學習馬列主義對於國家觀與法律觀的科學觀點從理論上去認識法律的階級本質；學習蘇聯司法工作中堅定的、鮮明的階級性和澈底的革命精神，學習蘇聯在司法工作中是怎麽樣把馬列主義的原理與具體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的。認淸社會主義蘇聯與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社會性質、階級關係、政權制度的區別及與此相適應的法律的特點，聯系到中國社會實際與國家政策，貫澈到我們的司法工作中去。任何生呑活剝式的機械搬用，都是脫離實際的。新民主主義的法制是以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爲基礎，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其他社會生活各方面有着不可分的密切的聯系，如果無視這種聯系而侈談蘇聯法律，『削足適履』，依然會發生各式各樣的錯誤。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還不到兩年，全國各級司法機構爲了實際需要已經相當普遍地建立起來，但由於時間的迫促，全國各級法院幹部一般感到量少質弱，遠遠落後於形勢發展的要求。這就必須大量培養新的司法幹部，迅速提高現有的司法幹部，而基本的一點是提高其政策水平，使人民司法工作者都有一把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粉碎與肅淸一切不合當前人民需要的東西，淸醒地認識人民司法工作的目前任務和發展方向，爲建設與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司法工作而奮鬥。

（上接42頁）但章炳麟說：『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韻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後來許多人都跟他說。簡單說來，前者了解爲借義，後者了解爲借音。究竟誰對呢？借義是對的。因爲：一、轉注不一定變音變讀，有者祇是偶然的，二、所謂『更制』字』的時候，把標音作用的（如果有這種作用的話）總不是轉注出去的字形，而是加上的字形。

註七：也有些形聲字，加上的『意符』並不起改變音的作用，例如『功』中的『力』，『楓』中的『木』。這樣的意符，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因爲假借字已經完全可以勝任了。即使說，有一些意義，譬如說：區別詞性和不同的含義，那末，它仍然不是字的主要部分，而是從屬部分。

註八：這在拉丁化理論裏只是附帶地、概括地講到，好像這件事極其普通平凡，其實這件事却是主要的。在『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同註二）裏寫道：『…根據文字發展的法則，無論那一國的文字，沒有不是從象形表意階段進化到拚音階段。…中國的漢字早已脫離了象形表意的階段，進到形聲和轉注（該爲假借之誤——引者）的那種表音階段了。』

註九：像在英國這樣的國家，革命並沒有引起什麽文字改革。在土耳其的文字改革是用拉丁字母代替阿剌伯字母，在朝鮮的文字改革則是用朝鮮字母的拚音式來代替非拚音制的漢字。

註十：例如『再』和『在』，在北京同音，在上海就不同音；『値』和『實』的情形又倒過來了，『力』和『立』在上海和北京都同音，但在廣州却不同音。

註十一：『中國文字拚音化與中國統一語』，應人，書同註一。

註十二：『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註十三：瞿秋白同志在『羅馬字的中國文還是肉麻字的中國文？』（書同註一）一文中寫道：『中國現代的言語還是單音節制度麽？…已經不是了！（略）這種文字（指現代漢語——引者）是在民衆言語的影響以及外國言語的影響之下，逐漸發展成功的多音節的言語。』

註十四：首先是高元提倡漢語革命，錢玄同和黎錦熙也擁護。高元說：『我是五聲絕對的廢棄論者，我主張設法把複音節字大造特造，把聲隨的韻也大增特增，使中國語變爲複音節語；那麽甚麽五聲四聲，都是老大廢物，管他做甚？』（『關於「拉丁化新文字的缺點」』，潘古干，書同註一）這種主觀唯心論的論調，現在看來是很可笑的了，但當時却算是『革命』的理論，拉丁化運動跟着他走了，一直走到絕路。

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諸問題

沈志遠

一

歷史唯物論告訴我們，人類社會必需的物質資料底生產，是全部社會生活底基礎。馬克思說：『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斯大林說：『社會存在怎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怎樣，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一七頁）

由此可知，所謂社會存在，就是指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但物質生活條件之取給於自然界現成的東西是非常少的，絕對大部分的生活資料是經過人類勞動的生產過程而獲得的。因此，作為社會存在的物質生活，主要的就是物質生活資料底生產，這是全部社會生活底基礎。物質的生產，永遠是任何人類社會生存之首要和基本的條件。

物質資料底生產過程，實際就是人類改造自然事物以滿足自己需要的勞動過程。譬如說，人們耕地、種棉、紡紗、織布、縫衣，以滿足自己穿衣禦寒的需要，這一連串改造自然事物的勞動過程，便是生產或生產過程。

這裏，我們不難明白，為着生產，必需具備三個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生產就不能成立。這三個要素就是：(一)人類有目的的活動——勞動，(二)勞動對象，(三)勞動工具。依照上述的例子，地要耕，棉要種，紗要紡……這些『耕』、『種』、『紡』等勞動作，都是人類的勞動；沒有它，根本就談不到生產。不經過人類的勞動——耕、種、紡織等，地是原始的荒地，棉根本長不出來，紡紗、織布自然更談不到了。其次是勞動對象。我們要耕種，必須有耕種底對象——土地和種子；要紡織，必須有紡織底對象——棉花和棉紗。此外，要捕魚，必須有捕魚底對象——江河湖海；要採煤，必須有採煤底對象——礦山，諸如此類等等。沒有勞動對象，勞動就會落空。勞動對象是生產過程所絕對必需的條件之一。最後，任何生產的勞動均必須藉助於工具來進行：耕種要藉助於鋤耙或拖拉機；紡織必須藉助於紡車和布機；捕魚必須用網，採煤必須用挖掘機；其他任何一種生產，都莫不需要依靠適當的勞動工具來進行的。

以下讓我們再來分別加以研討。

二

如上所述，生產底首要前提是勞動。在勞動時，人們消費着一定分量的體力和腦力（即筋肉細胞底消耗和腦細胞的消耗）或智力。這種人類從事生產勞動中所消耗的體力和智力底總和，便是人類底勞動力（РАБОЧАЯ СИЛА Labour Power）。

人類天賦體力，他的天生器官手、腳、腦等，幾千年來變動很少，但是人類從事生產的勞動力，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却已有了很大的變動。一個原始社會的野蠻人，他的天賦體力可能比現代的機器生產工人還強些，但是現代機器生產工人底勞動力，顯然要比原始野蠻人底勞動力強得多了。原始野蠻人一天拚命勞動所獵取的食物，往往不能滿足個人的一飽；現代機器製麵廠工人一天勞動底結果，却可能供數百數千人底食用而有餘。這是勞動生產率（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ОСТЬ ТРУДА Productivity of Labaur）大大提高底結果。但勞動生產率提高底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勞動力底提高或增強。勞動力不祇是單純的體力和腦力底消費，而主要的是它裏面包括着勞動者底一定的生產經驗和適當的勞動技能（或使用生產工具的本領），這種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是隨着勞動工具或生產工具（ОРУДИЯ ТРУДА ИЛИ ОРУДИЯ ПРОЧЗВОДСТВА Instruments of Labour or of Production）底進步而進步的。由於越到晚近生產工具進步得越快，勞動者底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底改變和進步也越快，因此幾十年前（甚至幾年前）生產技術條件下的勞動經驗和技能，到今天已經變成完全陳舊而不適用了。這就是說，由於生產工具日新月異的不斷改進，人類底勞動力本身也非不斷改進提高不可（而事實上也確是在不斷改進着提高着的）。假如

勞動力，勞動者底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不能適應着生產工具底改進而改進和提高，就會造成祇有新式機械設備而無使用這種新式設備的人的局面，因而生產也就遭受到阻礙而無法推進。

由此可知，不斷培養技術幹部，不斷提高工人階級底熟練程度和技術水準，對於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蘇聯所以能在極短促的歷史時期（還不是三個五年計劃底時間）內，在生產技術底裝備上，在工業發展底速度和水平上，趕上並超過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其基本原因就在蘇聯工人階級、集體農場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緊隨着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技術底加速改進而不斷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改進和豐富自己的生產經驗，也就是說，他們不斷地提高和改進自己的勞動力，風彌全國的斯泰漢諾夫運動，就是蘇聯工人階級相應提高自己勞動力的自覺運動。不僅如此，蘇聯勞動人民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技術條件不斷改進和提高的惟一偉大原動力。

由此可知，勞動力絕不只是單純的體力和腦力底支出，勞動力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理範疇，而是一個社會經濟的範疇；它不是自古以來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社會生產力（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Productive forces）不斷發展底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勞動力，也就是說，勞動者——人——本身，不但憑藉其一定的生產經驗和技能，使用着生產工具以進行物質資料底生產，而且他們還依靠自己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創造和改進着生產工具。所以勞動力，勞動者——人——本身，是社會生產力底最重要的要素。

但是人類勞動究竟不是單憑人類自己的天生器官來進行，而主要地是藉助於勞動工具或生產工具來進行的。人類創造和使用一定的生產工具，從事一定的物質資料底生產，來滿足自己一定的生活需要，這便是人類生產活動底目的性和自覺性底顯著表現。一般動物如蜘蛛、蜜蜂、燕子、螞蟻等等，也能從事表面上與人類生產勞動相似的活動（如蜘蛛結網，蜜蜂釀蜜等活動），但動物進行這種活動是本能的，單憑天生器官來進行的，而且那些活動本身祇是牠們天賦生理作用底表現而已。人類底勞動卻具有與動物底『勞動』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特質，那就是人類勞動底有目的性和自覺性，而這種有目的性和自覺性底決定的標誌，便是使用勞動工具以進行生產這一事實。

所以馬克思曾寫道：『蜘蛛進行着與織工相類似的工作，蜜蜂建築自己的蜂房可以使一些建築師慚愧。但是一個最壞的建築師自始即不同於一隻最好的蜜蜂，因爲他在用蜂蠟築成蜂房以前，已在自己的頭腦裏築成了它。在勞動過程終了時所得的結果，早在這一過程開始時即已觀念地存在於勞動者底表象中了。勞動者與蜜蜂的區別，不祇在於他改變着自然物底形式，還在於他同時在自然物中實現着自己的自覺目的……』（『資本論』第一卷，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一八五頁）

因此，人類生產勞動底特點就是它的有目的性和以創造及使用生產工具作爲它的必要條件。

眞正的生產，祇是在人類開始製造生產工具的時候才開始的。在製造生產工具——即使是最原始、最粗笨的工具如石斧或木棍——以前，類人猿尚未最後地脫離動物界而演變爲人，因而也就根本談不到生產。類人猿之脫離動物界而演變爲人，只是由於製造並使用了勞動工具才完成的。『勞動工具底創造和使用，……成爲人類勞動過程底特殊的特徵』。（同書，第一八七頁）

勞動工具或生產工具是勞動者把它置於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藉以改造勞動對象、改造自然物的東西（手段）。它是勞動者與勞動對象或自然界發生關係的聯繫物。

社會生產底發展，生產力水平底提高，首先就由於生產工具底進步。前文已經說到，勞動力——使用工具的人本身底能力，也是隨着生產工具底改進而進步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工具，因而成爲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同時也就成爲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底尺度或標誌。人類歷史幾千年來，生產工具底進步，社會生產力底發展，已經不可以道里計了。而生產工具底每一個新的進步，總很明確地標誌着社會生產力底進一步發展。下面就是斯大林描述由生產工具底進步引起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大概情況：

『由粗笨的石器過渡到弓箭，並與此相適應而由狩獵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等），並與此相適應而過渡到種植植物，過渡到農業；金屬的製造工具繼續改良，過渡到冶鐵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適應而有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脫離農業的分立，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手工業工場生產的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生產轉變爲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制，以及現代機器化工業的出現，——這就是人類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大致而遠不完備的情景』。（『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二六頁）

這樣，生產工具底進步就成爲社會生產力發展底可靠標誌，而同時也是社會生產關係改變底標誌。所以馬克思說，『勞動工具底遺骸對於已經滅絕的社

會經濟形態底研究，正與骨骼遺骸底構造對於已經絕種的動物組織底研究，有着同樣重要的價值。各個經濟時代底區別，不在於生產什麼，而在於怎樣生產，用什麼樣的勞動工具來生產。』（『資本論』俄文版，第一卷，第一八七頁）

人們藉以生產物質資料的各種生產工具，以及具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使用生產工具以進行物質資料底生產的人（勞動者），——這些要素結合起來就形成社會底生產力。簡單地說，生產力底要素就是生產工具和勞動力。

政治經濟學裏的機械論者，曾經把生產力簡化爲技術，簡化爲生產工具。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爲他們只看到生產力底一面，即生產工具（技術條件）的一面，却完全忽略了社會生產力底最基本的要素——勞動者。由於存着這種錯誤的生產力觀點，機械論者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有什麼樣的生產工具就有什麼樣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荒謬結論。一九二八——三〇年間，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匪徒曾發表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關係在中國已祇是殘餘之殘餘的反革命『理論』，他們所根據的經濟思想正是這種機械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觀。托派匪徒首先把生產力等同於生產工具，然後把『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就應該怎樣』（斯大林）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命題，歪曲成爲『有怎樣的生產工具就一定有怎樣的生產關係』的反革命夢囈。他們誇大機器、輪船（他們說這些工具是資本主義底代表?!）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於是武斷地得出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反革命結論。

生產工具在沒有加上活的人類勞動以前，究竟是一件死的東西。沒有工人去開動機器以前，機器是一動也不動，絲毫不起生產作用的。唯其如此，所以歷史博物館裏陳列着的青銅器、手磨之類，不能算是現實的生產力要素。離開了人，離開了勞動力，生產工具本身即不成其爲社會底生產力。馬克思寫道：『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的機器，是無用的。並且它還遭受到自然的物質代謝底破壞作用。鐵會生銹，木會腐爛。……活的勞動必須握住這些東西，把它們從死殭中復活過來，把它們從可能的使用價值轉變爲現實的和能動的』（『資本論』，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一卷，第一九〇頁）

生產工具是掌握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人——工農，勞動者——所製造的；人使用生產工具來生產自己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所以人——工農階級，勞動者——是生產力底最重要的要素。這是列寧和斯大林所特別強調並加以充分發揮的一個歷史唯物論底命題。在同樣的生產技術條件之下，新中國底翻身後的農民和工人，創造了比解放前大得多的生產成果。一年來各地農產底豐收，主要的不是由於氣候或其他自然條件，而是由於自覺的勞動農民發揮了高度的生產積極性。天津、上海的許多棉紡織廠，在解放初期工人每一錠子每天只能生產〇•六或〇•七磅紗，到了人民政府實行調整勞資關係，工人福利獲得初步保障後，每一錠子底每日產量就提高到了〇•九磅、一•〇磅、甚至有高到一•二磅的。由此亦足見在生產工具不變的情形下，勞動者更是生產力發展底決定要素。

向來人們把勞動對象也歸入社會生產力底範疇內去，那實在是沒有理由的。勞動對象，正如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一樣，無疑地是任何一種生產底絕對必需的條件。但是它同時又跟生產工具和勞動力不同，它不能構成生產力底要素。理由很簡單：勞動對象從它的廣泛意義和根本意義上講，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加工於其上的周圍自然界。土地、礦藏、河海、森林等等，便是最廣泛最根本的勞動對象；沒有這些根本的自然條件作爲勞動對象，生產也就無從談起。但是這些自然條件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變化得非常微小，而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却在短短的二百年（資本主義時代）中有了非常驚人的發展。一種在長時期中變化微小、變化極慢的東西，當然不能成爲短時期內有極大變化的東西（生產力）底構成因素。一九四九年社會主義蘇聯底工業生產量比一九一三年增加一六•五倍，但是作爲勞動對象的蘇聯自然條件，在這期間却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同時，生產力是表示着人們對於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事物和自然界的關係（簡言之，即表示人對自然的關係），那麼構成自然界的土地、礦藏、河海之類本身，就邏輯地不能成爲生產力底要素了。生產力永遠是社會的，自然地理環境不能歸入生產力之內。

不錯，勞動對象有很多種是加過工的東西，如各種工業原料，它們並非自然界原有的事物。鑛砂之對於冶鍊工廠，鋼鐵之對於機器製造廠，棉花之對於紡織廠等等，都是勞動對象，但都不是自然事物；可是因爲那些東西歸根結底仍離不開以礦山、土地等自然物爲勞動對象而被生產出來，勞動對象之被歸入生產力之內，仍然是站不住的。

但上述一切並不意味着勞動對象是不重要的；正相反，它們對於社會生產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它們是任何部門生產之絕對必需的物質前提，它們和生產工具在一起，形成了生產手段或生產資料（Средств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Means of Production）。

三

以上所說的，只是關於社會生產底一方面，即生產力這一方面。但是社會生產還有另一方面，即生產關係（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Productive relations）的一方面，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相互關係的一方面。在生產過程中，人們不僅與自然界發生關係，而且在人們彼此之間也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在社會發展底各個歷史階段中，人們對於自然的加工——生產，只有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底範圍內實現着的；離開了歷史上一定的生產關係，生產便成爲抽象的概念，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爲事實了。

在歷史發展底任何階段上，物質資料底生產經常是社會的生產。人總是社會的動物。他不能在社會以外，在他與別人的生產關係以外去生存。人們不能孤獨地進行生產。飄流在孤島上的魯濱遜，不過是小說家筆下的幻想而已。實際上人們永遠不是單獨地從事生產，而總是羣體地、社會地從事着生產活動的。因此人們在生產中總要投入不依賴他們意志而發生的一定的生產關係。

所以馬克思說：『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着自然界，而且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生產。爲了實現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只有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會有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存在，才會有生產。』（『馬恩全集』第五卷，轉錄『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第七二三頁）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底『序言』中，馬克思又說：『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即是在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底生產中——斯大林註）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底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同書，第七三四頁）

假使說，生產力底狀況所回答的，基本上是人們用什麼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問題，那末生產關係底狀況所回答的，則實質上是生產手段（包括一切天然的和加過工的勞動對象以及各種生產工具、交通工具和建築物等）爲誰所有、由誰支配——爲全社會所有，由全社會來支配，還是爲剝削人的個人或階級所有，並由他們來支配的問題。

依據對生產手段爲誰所有、由誰支配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可以有幾種不同類型的生產關係。假如生產手段爲全社會共同所有並由全社會共同支配，那末在這種基礎上就產生原始公社制的生產關係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是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互助合作的生產關係。假如生產手段爲少數剝削者如奴隸主、封建地主及資本家等人所有，並且由這些人所支配，那末就會產生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生產關係，如奴隸制、封建制及資本主義等社會底生產關係。但除這兩類生產關係外，還可能存在（事實上也存在着和存在過）第三類，即過渡性的生產關係，從一種生產關係轉變到另一種的過渡關係。例如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時期，在農村公社裏一面保存着公社底公共財產，同時却已發生了家庭底私有財產。所以馬克思說：農村公社『是走向第二種社會形態的過渡階段，就是說，是從建築在公共財產上的社會走向建築在私有財產上的社會的過渡。』（『馬恩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七卷第六九五頁）今天我們新中國底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也體現着過渡性的生產關係。合作社之被確定爲半社會主義的經濟，就說明它是從私有的小生產走向社會主義的集體大生產的過渡性經濟，亦即代表着過渡性的生產關係。我們的公私合營經濟，很顯然也是從資本主義逐漸走向社會主義化的過渡經濟，亦同樣代表着過渡性的生產關係。

由上所述，可知爲要使生產過程成爲可能，不但需要生產工具、勞動力和勞動對象這些物質的技術條件，而且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社會條件——建立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一定關係；只有在這種關係之下，生產工具、勞動力和勞動對象這些生產所必需的物質要素才能結合起來，實現生產過程。譬如資本主義社會底生產過程，不光是有了廠房、機器、原料和勞動力即可無條件地成爲事實；除這些東西外，還必須先行建立工廠所有人（資本家）和勞力所有人（工人）中間的僱傭關係。沒有這種關係，工廠裏的機器是不會轉動的。

這裏發生一個問題：生產關係既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那末是不是說，參加生產關係的人只限於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人（如地主和農民，廠主和工人等），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人就置身於生產關係以外呢？不，任何人也不能置身於社會生產關係以外的。商業家，銀錢業者，醫生，教師，科學家，著作人，小說家，演員，機關幹部，部隊人員等等，雖均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却沒有一種人能夠躲開生產關係的。

問題底關鍵是在對生產過程這一概念的解說上。一般所說的生產過程，平常都指的是製造、耕種、或開採等類的過程；這是狹義的或直接的生產過程。但使人們發生生產關係的那種生產過程，是廣義的社會的生產過程，而全部社會生產過程則包括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諸環節（或過程），缺少了其中

的任何一個（除原始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無需乎交換這一環外），社會的生產過程就會中斷。要使社會生產能夠循環不斷地進行，生產之前，先得從事交換：買進機器、原料及一切設備。生產之後，又得從事交換：把製成品賣出去。其次，生產還必須以分配爲前提，並與分配相伴而行：首先要有物質資料底分配，資金底分配，勞動力底分配以及生產工具底分配；同時還要有收入底分配——凡是參加生產的成員，都應得到一定份額的收入。最後，生產又與消費相統一：布底生產過程就是棉花底消費過程，機器底生產過程就是鋼鐵和電力底消費過程，電力底生產過程就是煤底消費過程，一切價值底生產過程也就是人類勞動力底消費過程。由此看來，整個社會生產過程必須包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四個環節。用馬克思底話來說，此四者『構成一個整體底各個部分，是統一中的差別。』（『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關係是多方面的。任何人要生活，就必須消費；一切所消費的東西都是經過勞動生產出來的；在達到生產和消費底目的以前，均必須先行購買（交換）；要購買就必須有購買力（一定數額的貨幣收入），而這又是國民收入底一定比例分配底結果。因此，任何人都可能置身於社會生產關係以外。生產關係實際是一個複數名辭，嚴格說來，應該被稱爲生產諸關係。在階級社會內，生產諸關係必然表現爲階級諸關係。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正是這些生產諸關係——在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即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諸過程中所發生的人們間的相互關係。但這四個過程中，最基本的、決定的環節當然是生產，離開了生產，其他一切就都無從談起。正因如此，所以只有在直接的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生產關係，例如封建社會內的領主與農奴間，資本主義社會內的資本家和工人間的生產關係，才是最基本的、主導的生產關係。其餘的關係，例如封建社會內的農民與商人間，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工廠主與農業投資家間，商業資本家與銀行家間或產業工人與小農業主間的關係，便都是從屬性的生產關係。

主導和從屬的生產關係，還有另一種解說，那是指主體的和殘餘的或萌芽的生產關係而言的。譬如在封建初期（不論是紀元五、六世紀的西歐或西周時代的中國），領主和農奴底關係是當時生產關係底主體，但與這種關係同時並存的，還有奴隸制底殘餘關係。在十六——十八世紀前期的西歐，主導的生產關係仍然是封建的，同時卻已發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底萌芽——工場手工業。在現代資本主義各國內，往往還保存着或多或少的封建關係殘餘和小商品生產，這是相當普遍的事實。在解放前的舊中國，主導的生產關係之一是帝國主義的壟斷資產階級及其卵翼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與中國工人和農民羣衆間的剝削關係；另一種是掌握大量土地而僅佔農村人口約百分之四的地主與貧無立椎之地而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之間的關係。其他如中小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間，商人與手工業者間等等的關係，都是從屬性的生產關係。革命勝利後的新中國底經濟面貌就完全不同了。舊時代的主導生產關係已基本上被澈底摧毀，代之而起的主導生產關係是以國營經濟爲代表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了（雖然它在數量上所佔比重不大）。但同時我們目前（一九五一年夏）還殘存着不少的封建關係，因爲還有一億數千萬人口的地區尚未完成土改；此外，西北邊陲地帶甚至還存在着更落後的經濟殘跡。

四

人類歷史上基本的生產關係有五種：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它們各自與在一定發展水平上的生產力相結合、相統一，就形成歷史上的五種生產方式（СПОСОБ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Mode of Production）。

原始公社制或氏族制社會，是無階級區別、無剝削關係的原始社會。這裏的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手段底公有制。公社制生產關係與當時以石器、弓箭爲代表的生產力水平是相適應的。奴隸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種階級對立的社會制度；這裏的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階級佔有生產手段和生產者本身（奴隸）。這種生產關係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這時人們所使用的已經不是石器，而是金屬工具；已經出現了畜牧業、農業和手工業，以及這些生產部門間的分工。繼奴隸制而起的是封建制社會。封建制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封建領主佔有生產手段（主要是土地）和不完全佔有生產的勞動者（農奴）。與這種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生產力狀況，是鐵器底進一步發展和普遍化，手工業底逐漸發達，乃至手工作坊和工場手工業底出現。最後一種階級對立和剝削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以生產手段底資本家佔有制及藉此剝削僱用勞動爲基礎；與此種基本生產關係相適應的是機器化的生產力，機器生產的大工業制。偉大的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開闢了人類歷史中的一個嶄新時代，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種新的生產關係，是以生產手段底社會公有制爲基礎，它給生產力發展開拓了無限

寬廣的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中歐和東南歐一些人民民主國家中也建立起來了。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底誕生，也開闢了走向社會主義的寬廣大道。

這就是人類歷史上連續發生的五種基本生產關係，五種生產方式底簡單情況。

在社會主義以前，社會底發展，一種社會制度底過渡到另一種較高級的社會制度，始終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所引起的。這種矛盾在階級社會內，必然表現爲階級矛盾，表現爲階級鬥爭。所以社會發展底動力，應該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對於剝削壓迫階級的階級鬥爭；人類社會底歷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生產勞動者底歷史。這一條定律是與生產力底變動爲社會發展底基本原因這一定律完全相一致的。因爲生產力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勞動力，即生產的勞動者本身。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這種矛盾必然表現爲被剝削的勞動階級與剝削的統治階級間的階級矛盾；這種矛盾惟有通過那擁護生產力發展的勞動羣衆對於維護現存的腐朽生產關係的統治階級之勝利的革命鬥爭，才能得到解決。

因此，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底序言中寫道：『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着的現存生產關係，或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生產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底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底時代就到來了。』

作爲階級鬥爭之最尖銳表現的社會革命，便是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的惟一途徑，是解放生產力、使新的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獲得誕生的接生婆。但是這樣的由低級的生產關係過渡到高級的生產關係，根本原因却是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不論那已經腐朽的舊生產關係（它的社會代表是反動的統治階級）怎樣頑强地阻撓着它的發展，它或早或晚終究是要突破那頑强的舊生產關係底『硬殼』，而使自己獲得解放，同時又使新的更高一級的生產關係獲得誕生。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產發展過程中決定的要素。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也就應當怎樣。』（斯大林）

舊中國底國民生產力，被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在中國所建立的殖民地型的生產關係、農村中封建性的生產關係、及國民黨匪幫底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三者，多方面地束縛着、摧殘着，造成了中國勞動人民長期的深重苦難。但是經過了最近十餘年的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中國底國民生產力終於突破了這三重頑强無比的反動生產關係，促成了新民主主義生產諸關係底誕生。這個突破，具體地是通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以工農羣衆爲主力的中國人民革命底勝利而實現的。而工農勞動羣衆自身就是生產力中最重要的要素，所以舊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矛盾就必然表現爲以工農羣衆爲主體的被壓迫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三者底政治代表是蔣匪幫國民黨）的階級鬥爭。所以斯大林判定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相適合（即矛盾）的情況，是以破壞現存生產關係及建立起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新生產關係爲使命的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只有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才達到完全相適合的狀態。

學術簡訊

『太平天國史料』將出版

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太平天國史料』在北京大學向達教授領導下，經過編輯委會的努力，已於近日完成。全書計分四大冊，共收一百餘種，一百五十餘萬字。即交上海神州國光社排印，並爭取於本年十月內出版。此書係有重點的選擇，其中包括稿本、傳鈔本、罕見本在三分之一以上，經過校勘標點分段並附若干圖版。這是一部太平天國史料的總集，對於歷史教學及一般讀者貢獻很大。

治淮發現大批珍貴古物

在治淮工程中曾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古物，其中有泗洪縣出土的唐代陶碗二隻，陶枕（陪葬品）一隻，漢代陶罇一隻。泗縣汴河區馬頭鄉民工程紹忠在今春治淮期間掘出銀枕頭一隻，重五十兩，亦是古人陪葬器物。

又禹縣白沙水庫在五月初先後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六處，發掘漢墓六座，內有古物甚多，現在已有一百十七件運到開封，其中有石器、陶器、鐵器、瓷器、銅器、骨器、玉珠、蚌片及松脂等。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下）

潘光旦 · 全慰天

這樣，一個貧苦的族人，從生到死，從教育以至於『青雲得路，指日高升』，從設立義莊的族人看來，都不能說完全沒有機會；再要怨天尤人，尤同族的人，未免有幾分說不過去。到此，同族之內貧富懸殊、勢位高下的矛盾，如果還不能緩和，階級之間的摩擦，如果不能減輕，對於氏族與階級以外的、尤其是農民階級的、種種有形無形的侵襲的力量，如果還不能合力應付，如果還有『不肖分子』，甘心『淪落』，不但不肯鞏固自己的階級陣營，並且和敵對的階級打交道，替他們說好話，甚至於與他們『同流合污』，即自己『降』而爲農爲工——那眞就沒有辦法了。

七

上文再三提到義田與義莊制度的封建性，如今應該比較仔細的加以說明，普通地主階級的封建性，是早經證明了的，勿庸再說。如今義田的地主，上文已經提到過，和普通個別的地主本質上毫無分別。個別地主的種種封建的特點，它全都有，而又外加一個特點，就是，它是有些集體的、有些組織的、以至有些計劃的。它動不動拿全體族人，所謂『闔族』，檯出來。有好處時，說這是『大家』的利益，不能不爭。有責任時，也說是『大家』有干係，可以往『大家』身上一推。管理義莊的人老實，如此；不老實，尤其如此。其結果，特別是對於農民，便擴大了剝削的範圍，加深了剝削的程度。這種剝削是和封建分不開的。這在下文第八節特別有討論。

義田的封建實質原就如此。不過此外它還有兩種推波助瀾的力量，爲普通個別的地主所沒有，或雖有而所能利用的程度究屬有限。一是屬於封建理論的，就是所謂宗法的理論。一是和官僚階級的勾連、糾合，以至於完全成爲一事。

宗法本是封建的一個主要的因素。封建結合到氏族組織，就成爲宗法；換言之，氏族的所以能表現其封建的力量，成爲封建社會的組成部分，以至封建社會的基礎，或基本單位，就得透過宗法。所以，在中國，宗法與封建的歷史是同樣的悠久的，是同終始的。

宗法包括三個原則：尊祖、敬宗、睦族或收族。祠堂、家譜、族長等制度都是所以實現這幾個原則的。祠堂與尊祖最有關係，是顯然的；目的在維持族人在精神上的聯繫與一致。族長就是所謂宗，一族的組織與社會的聯繫是他的任務了。家譜、祠墓祭掃、春秋合食等活動，多少有一些收族的作用，但象徵性有餘，實際的效力不大，日久更成爲一種形式，終於不足以維繫，不足以收族睦族而後已。義田的辦法正所以替睦族的原則安上一個物質的基礎。於是義田就形成了一個古所未有的制度，在經濟條件較好的區域日見發達起來；義田一發達，有義田的氏族就蒂固根深，牢不可破，成爲全部封建力量的中堅。

但當初范仲淹創立義田，倒並沒有措詞上多少宗法的議論。既是宗法社會裏長大的人，他對宗法自然是充分瞭解的，否則他決不會把他的再嫁的母親從朱家接回來。即錢公輔爲范氏作義田記，也沒有就宗法一點說話。因義田而大發宗法的議論，大發睦族的議論，是後來的事。南宋袁采作『世範』，有『置義莊以濟貧族』一則，始專就原則發言（世範，卷一，睦親；今知不足齋叢書本，未載）。明初，方孝孺著『宗儀』，以『義田』爲一種『睦族之法』。明中葉後，湛若水設湛氏義田，即自稱爲『湛氏小宗義田』，已見上文。明末，于鎜作『中說』，論『合族』之道，更想擬訂一個家家可行的辦法，說：『同族有賢貧愚富之不同者，可不輔之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勸出義田五十畝，有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遞爲增減，而二頃以下免之……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其田，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寡，無田可助，則設義廩……』。無論義田義廩，目的自都在『收族』。

清代的學者大都歌頌宗法，連顧炎武都不是例外，他說：『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

給人之求，為周且豫』，接着，在自註裏就引用范仲淹義田之制，作為一個有效的實例，說『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日知錄，卷六，『庶民安故財用足』一則）。此後設置義田的氏族越來越多，結合了義田發為『恢復』（其實宗法始終存在，無待恢復）的議論也就越來越熱鬧了，如清中葉的錢大昕說得最為詳細（潛研堂集卷二十）。

到清末馮桂芬作『復宗法議』，便更進一步的主張『推廣義莊之令』，即普遍設立義莊，使成為社會行政的單位，很有些像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所提倡的各式各樣的『新村』或『公社』，不過是以氏族做基礎罷了。

他不但稱讚范仲淹，還根據范氏的遺意，擬出了一個『普遍推行義莊的計劃』，我們摘出它的綱要如下：

甲、義莊的組織——期於億萬戶皆有莊可隸為止

一、一姓一莊，以一千人為限，逾比分設支莊

二、單門、稀姓、流寓，而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擇所附，例如，附於源出同姓的其它氏族（按如，胡可以附於陳，因二氏均出嬀姓）

三、無可附者，合數百人為一總莊（按，這大概不以氏族為限了）

乙、義莊的建築

一、建莊舍

二、無力建築者，以寺廟為之

丙、義莊的執事

一、宗子，稱為『族正』，以貴貴為主，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

二、二人皆由族公舉，如今義莊『主奉』法（按、范氏主持義莊的人，即稱『主奉』，他族或稱『掌莊』，或稱『莊正，莊副』）

丁、義莊的任務

一、闔族薦饗、合食、及其它公事的處理

二、教育及福利之事

1、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

2、嚴教室——不肖子弟入

3、養疴室——篤疾者入

4、養老室
5、恤嫠室
6、育嬰室
——鰥、寡、孤、獨入

三、登記族人行動事項

1、嫁娶、喪葬

2、入塾、習業

3、應試、游學、經商

4、分居、徙居

5、置產、斥產

6、孝弟節烈或敗行

7、一切涉及官府之事

四、就上列登記事項對無力者的資助

戊、復宗法、廣行義莊後可以期待的效用

一、盜賊可不作，因無人患饑寒

二、邪教可不作，因宗子可代教主

三、爭訟械鬥之事可不作，因宗子有權有責，足以排難解紛

四、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

・馮氏在這裏沒有提到義田的字樣，但義田是假定在內的，否則，計劃中的教育、福利、資助一類的事拿甚麼錢來支付呢？也不用說，地主階級才有用，才有力量把它捐出來，作為義田，然則沒有田的貧農雇農又怎麼辦呢？說『一姓為一莊』，姓王的地主背和無田的姓王的農民合一莊麼？怎樣合法？這些問題，馮氏沒有答覆，他根本沒有提到，沒有看到。所謂『億萬戶皆有莊可隸』，那億萬戶還是地主戶，而決不是農民戶，凡屬地主戶各有其義莊以後，各各適用同一的義莊計劃以後，地主階級將越發頑強，越發牢固。如果義莊包括同姓的無田農戶在內，試問所謂保甲團練又是幹甚麼的？此種農民既全都成為義莊的成員，保甲團練豈不成為無的放失？

義莊的理論，到馮氏而臻於大備！幸而當時反動的政權並沒有睬它。馮桂芬生於一八〇九年，死於一八七四年，對於當時從西洋輸入的一些進步的影響不至於全無接觸，而乃有這一類的倒退的空想，眞也怪事。不過，我們應當知道，馮氏畢竟是吳縣人，生長在義莊林立之鄉；同時，也不要忘記，對於利用帝國主義的兵艦來打擊太平天國革命的建議，他也還是表示同意的一人。蘇南的封建主義和英美帝國主義沆瀣一氣，在那時候，就在馮桂芬身上，便可以看出苗頭。

普通的地主階級和官僚主義分不開，有義田的地主階級和官僚主義更分不開。宗法之於義田，只是一套理論，用來說明義田的『義』之所在；官僚主義之於義田，却是非常實際，使義田可以把它的『義』有保證的實現出來。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

第一、出了大官的氏族才能設立義田，太小是不行的（大商人亦有購設義田的例子，但那是很後期的事，晚清以前是沒有的）。試查看一下，范氏而下，設立義莊的，尤其是規模較大的，那一個不

是『累世仕宦之家』（俞樾、長洲俞氏續安義莊記，吳縣志，卷三一，註引）？不是大官，不是累世簪纓，更沒有錢，沒有勢，來收購大量的土地，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有如蘇南，這眞是談何容易。本文已經是太長了。如果有機會，我們不妨把義田之家的家世，逐一對照的敍述一下，便極容易發見，相關係數一定是正面的，並且是極高的。

第二、一個氏族有了義田的設備，便可以孕育更多的官僚士紳；官僚是在職的士紳，士紳是退休的官僚。地主階級本來有此方便，但有了義田，便更開方便之門。義田之家往往有義學或莊塾，如果沒有，至少也資助族中子弟，爭取讀書的機會。讀書做什麼？搏取科第。取了科第做什麼？做大官，而不做芝麻荼豆的官。義田的一大效用既在產生更多的科第人物，義莊的維持發展，當然要仰仗做官後退休林下的此種人物了。馮桂芬不是主張以進士或舉貢生監做『宗子』麼？不是主張所謂『貴貴』的原則麼？這就又回到第一點的話了，一二兩點原是相爲因果的。官僚地主產生義田，義田產生更多的官僚地主，更多的官僚地主從而更擴大義田，加強義田的作用。蘇南的封建勢力，總有一大部分就是這樣『厚自封殖』起來的。

第三、設立與維持義田的官僚或退職官僚，不但自己有官勢，還要充分利用中央與所在地方的官勢。要求得『合法』當然不能單憑自己的勢位。中央與地方官自然也極願意出力，來促成這一類的『義舉』，一則就因爲它是『義』的，合乎宗法與封建的意識形態的，促成『義舉』，自己也就行了『義』；再則官官相護，如果義莊發生困難，引起糾紛，例如農民可能拒絕把田地廉價出讓之類，地方官總得設法使地主一方得到有利的解決，因爲，在這裏，利與『義』是分不開的！范氏創義田不久（一〇六四），到仲淹的兒子純仁手裏，便已須運用官府的力量。當時純仁上了一個奏章，說：『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文，本家難爲申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義莊規矩，范集）。朝廷自然答應了。義田與官府發生關係，這當然是第一次。後來就成了一個例規。辦理義莊必須呈報，呈報的手續是，先報到縣，由縣而府，由府而藩司（布政使），藩司核實後申巡撫，巡撫一面申報禮部，一面奏朝廷給銀建坊，經准許後，再一級一級的下到藩司，由藩司發給執帖，即許可狀；捐置義田的氏族一面領銀建坊，以資表揚，一面世守此項執帖，有此執帖，族外人的覬覦侵佔，族人自己的串捏盜賣，便一概可以禁止了。到義莊發展全盛的清代，官府立案與奬飾的情形，大概如此（參看『題報昭文縣歸氏義莊疏議』，歸兆籛，京兆歸氏世譜，義莊志。）

此外，義莊還有一些爲官府所准許或默認的特權。例如在司法方面，有的義莊條規中規定訴訟必先通過義莊，俞樾爲陳氏作義莊記，說，『所輯條規三十有六，〔中有云〕……族中爭訟，不得越義莊而逕訴有司』（吳縣志，卷三一，註）。又如在經濟方面，官府規定『義田如歲逢歉收，一概停捐』；這比普通地主更佔便宜，只要年成不好，便可免捐，無須特別申請呼籲。還有一種規定，看去有些費解，『義田應完錢糧，州縣官墊捐』，在甚麼情形下如此，並無說明；但錢糧可以有人墊捐，在義田方面總是一個特別權利，爲普通私人的田地所沒有（這二規定均見『度支省例』卷六，清末摘抄稿本，摘抄的人大概是一個所謂『錢穀師爺』，摘抄了專供自己參考的）。這些特權是很容易理解的。封建的政權自然贊成許多封建的做法，封建的做法越多，官府越省事，越『政簡刑清』，因此，才發生司法一類的特權。官僚與地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封建政權下假公濟私的事眞是太多了，『墊捐』未必眞墊，免捐卻是眞免，表面上是免了行『義』之人，實際上是免了自己，免了自己所從出的階級。在這種制度之下，沒有特權，是不可想像的。

關於義田的封建性的話，我們在上文已經說得不少了。但還有很顯然的一層，不能從略。上文說到，義田是一種『公產』，是一種『公堂田』，非經闔族同意，是不能轉移產權的。上文也曾說到，凡有義田的氏族必嚴禁子弟串捏盜賣。范仲淹『初定規矩』於此雖沒有明條，但治平元年范純仁的所以奏請朝廷降旨，事實上怕因爲已經有人盜賣，所謂『漸致廢壞』的話，所指不止掌管人的侵漁中飽而已。並且，一一一五年增訂的一條規矩說到『族人不得以義宅舍屋私相兌賃質當』；兌賃質當猶且不可，何況出賣？族人之間猶且不可，何況向族外之人？義宅舍屋猶且不可，何況義田？上文也曾說到，義田的面積，只許加大，不許減縮，這在范氏規矩中却早有明文（一一〇六年續增）：『義莊遇有人贖田，其價錢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如〕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農民把原先是自己的田從義田中贖回去，自不能不讓他贖；但贖田時所交付的那筆款子只能有一個用途，就是趕快把它用來買進一塊大致相等的土地，來補足被贖回去後的缺額。這也證明，義田的面積是不容減縮的，農民贖走的田畝尚須補足，何況用出售

的方式任其隨時減削呢？後世立莊設規，始有『永禁典賣』的明文規定，例如彭氏莊規的一條裏面說：『誼（不自稱義，而稱誼，有自謙之意，古代誼義相通）田方單各以次黏連成冊，加用戳記，註明「彭氏誼莊田，永禁典賣」字樣……並呈官鈐印發還』（彭文傑等、彭氏宗譜，卷十二，頁十八）。用『買』字而不用『賣』字，是對族外人說的；族人不能賣出，是早經確定了的，但若萬一有人盜賣，族外人一概不許買進；族中人不得買進作爲私人田地，自亦在文義之內。土地改革期間，一個關於太湖東山區義莊的調查也說：『義莊土地，個人均無田權，不可隨便買賣』。

義田不得買賣，即義田實際上成爲凍結了的土地，吳縣常熟兩縣便有到這樣凍結了的土地一二十萬畝。這一二十萬畝在市場上不再流通。這便引起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比宗法理論與官僚關係更見得嚴重。

在義田出現以前的封建時代裏，有些普通地主出賣土地，是表示他們衰落了，極少數的農民買進土地，自已耕種，是表示他們興旺了；正因爲土地可以在兩個不同的階級之際有極些微的流通，也正因爲盛衰興替的情況極偶然的可以換換手，社會整個的經濟生活還能維持一分兩分的活力，不到完全窒息的地步。義田出現以後，部分的土地便凝固在少數氏族的掌握之中，可以幾百年以至近千年不轉手；凝固的範圍有多大，社會停滯的時期也就多久，社會進步的障礙也就多大；而凝固的程度減深，社會生活也就越趨於死板。在辛亥革命以前，義田範圍的越來越大，義莊數目的越來越多，義莊傳統的越來越悠久；即凝固範圍之大與時期之長，我們是已經看到了的。至於凝固程度之深，我們還應在這裏補充一筆。上文提到過，范氏的義田許原主贖田，這表示全部義田面積裏總有一部分還沒有凝固在范氏手裏；大抵是貧苦的自耕農，起初把田押給范氏，范氏收下來，作爲義田的一部分，這農民也就在義田上耕種，暫時成爲義田的佃農，後來景況比較好轉，又把田贖回，恢復小自耕農的身份；而范氏可以拿贖田所得的款買進別的田地。這不表示義田的一部分土地還可以流動麼？但後來便不同了。彭氏的莊規就斬釘截鐵的說明：『凡置田，祇許買絕，不得典押，以斷葛藤；』又說：『凡誼莊恆產，皆勒石莊中，呈官立案』（彭氏宗譜，卷十二，頁十七——十八）。『斷葛藤』就是禁絕流通，『勒石呈官』，更象徵由凝合而至於完全凍結。

眞要像馮桂芬所主張的那樣，普天之下，盡設義莊，率土之濱，莫非義田，那就等於把整個的社會經濟放進電氣冰箱，使整個社會成爲藥製的僵屍，表面上形完體整，實質裏生氣全無。近百年的蘇南社會文化，尤其是蘇州一帶，便已經有幾分這種光景，除了普通地主階級而外，我們認爲有義田的地主階級應負更大的責任，爲的是，普通地主階級的封建勢力是廣泛的，中間還有夾縫，有漏洞，而有義田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勢力却是深刻的，中間沒有夾縫，沒有漏洞。普通的地主們只教中國社會停頓不前，有義田的地主們却致中國社會實行倒退。分析蘇南封建勢力，到此地步，我們才覺得搔到了癢處。

八

最後，我們對義田的剝削情況不能不加討論。這方面的資料並不太多。以前講田賦，講土地租稅，文獻雖汗牛充棟，說來說去，總不外政府與地主之間的交涉，至於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係，是不談的，不屑於一談的。這一來，文獻中直接關於封建剝削的資料，就幾乎沒有了。不過間接的是有些的。

先說義田的一般剝削性。這是和普通地主完全一樣的。地主一般不種田，靠別人種他的田，收租享用；有義田人家的人，也是如此，並且往往享用得更多一些，因爲除了接受一部分義田的收入而外，他自已一樣可以有私人的田產，更有私田的收入。彭氏的『潤族舊規』雖說明『有田產者不給』月米，但後來改爲『有田產而不過百畝』者『一律致送』（彭譜，卷十二，頁二〇至二一）。百畝之田還算少麼？但依然可以領取月米，這不是增加他的不勞之獲，無功之祿麼？

『族人不得租佃義田，詐立名字同』，是范氏義莊規矩很早（一〇八三年）就定下的一條。立此一條的目的大概有兩個。一是一般的看不起種田，不屑於體力勞作。以前歷史上時常提到『孝弟力田』的人才，又說到某人以『力田起家』，這是靠不住的。實際上，那些住在鄉村裏的地主，至多也不過是一些經營地主，並不是眞的胼手胝足的農夫。二是防微杜漸，避免族人把『租田當自產』，不知不覺的把義田拆散了。間有因月米分配並不敷用，想爭取義莊土地自行耕種的例子，義莊還須加以禁止。南渡後（一二一〇年）續訂的規矩裏，便有有關的兩條，一條涉及功德寺（家寺，專爲祖宗薦福）裏的和尙田，一條涉及普通的義田租戶；後一條說：『近來有恃強公然於租戶名下奪種者……爲害甚大；今後探聞有違犯之人，罰全房月米半年。』無論爲了什麼原因不許佃種，也無論事前防止，或事後責罰，結果總是一樣，就是鼓勵不勞動，不生

產，剝削別人，現成享用。

但范氏當初的情形還算是好的。讀書人家也還有窮苦子弟想種種田，想用自己的血汗來謀取生計，所以規矩裏不得不安放上幾條，來事前防範，事後追查。明末嘉善陳龍正作家矩十六條，也申說到這一點，並且索性把第二個理由明白說了出來：『義田本贍親支，然親支不得承種，恐他日有擅行侵扣者，縱則非義，懲則傷恩，謹之於初，可以無弊』。後來潘彭兩氏的莊規，雖以范氏的爲範本，卻完全沒有這一條。這不是說，從此族人得以租佃義田了。決不是。而是書香人家子弟，不下田，不屑於下田，用不着下田，到此已成習慣，已成規律，無須律有明文了！土地改革期間太湖東山區的一次調查報告說：『義莊田本族人是很少耕種的，在東山區本族人耕義莊田的只有一戶，是吳氏義莊的佃戶，僅種一點零八畝；原因是田離家近，本人又無職業之故』。這人定是一個『沒落王孫』，萬不得已才自己下田的。

在有一點上，義莊的剝削是和普通地主的剝削不同的，就是，不許放債，不許放高利貸。至少在規矩上是如此。范氏規矩於一〇九五年續訂一條說：『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貸』，反過來說，應是『義莊費用雖有餘，也不得放有利債貸』。潘氏的條規就兩面都說清楚了，『……蓄有羨餘，亦祇准添置田產，不得放債取利』。吳縣陳氏義莊條規三十六條之一也說：『歲入所餘，封存鐵櫃，不得借貸取息』（俞樾，陳氏義莊記，見前）。彭氏的條文一面謹防親友挪借，一面着重把羨餘『發商生息』，爲日後添置義田地步。大抵彭氏訂立規條時，已是清代末葉，蘇南一帶，由於帝國主義的影響，商業比較發展，商業方面既有利可圖，正不必走高利貸的一途了。無論如何，義莊謹防高利的借進貸出，關鍵不在原則上反對高利借貸，不在高利借貸的不道德，而在預防管事的人假公濟私，從中漁利；換言之，目的不在減輕義莊對別人的剝削，而在防止別人對義莊的剝削。

其次說義莊收租的實際情形。上引常昭合志稿的資料裏，有一部分義莊的收租量是比較採訪得清楚的，如今用來製爲下表：

莊名	成立年份	全部或一部份義田畝數	租米總量(石)	每畝租量(石)
臨海屈氏義莊	一八一〇	四九〇	八〇〇	〇•八一六
歸氏義莊	一八一〇	一〇四三	四〇〇	〇•九四〇
董氏義莊	一八二八	三五〇	三一五	〇•九〇〇
周氏義莊	一八四四	五一〇	四七九	〇•九三九
瞿氏承裕義莊	一八四五	七二八	五四六	〇•七五〇
衛氏義莊	一八五六	一〇〇〇	八〇〇	〇•八〇〇
瞿氏義莊	一八六二	五〇〇	五三〇	一•〇六〇
席氏義莊	一八六七	五七〇	四〇〇	〇•七〇二
張氏孝友義莊	一八七一	二六七〇	二六三〇	〇•九八五
毛氏義莊	一八七五	五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錢氏承志義莊	一八七八	五〇〇	四九〇	〇•九八〇
周氏鶴記義莊	一八八〇	五〇〇	四九〇	〇•九八〇
胡氏卹寡義莊	一八八三	五一〇	四三〇	〇•八四三
沈氏承志義莊	一八八五	五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陳氏紹輝義莊	一八八七	五四一	五〇〇	〇•九二六
何氏餘慶義莊	一八九二	三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范氏義莊	（未詳）	五〇〇	四〇〇	〇•八〇〇
總計		一二六二一	一一六八〇	
總平均				〇•九〇二

上表所列的每畝平均租量是大米〇•九〇二石；這和土地改革期間調查太湖東山區所得的資料是很可以相比的。東山區義莊田租，就稻田說，分活租板租兩種。活租最高額每畝一•八石，一般一•五石至一•六石，最低一•四石；實收根據這些額子打七折後再打七五折。如以一•五五石爲一般平均租額，再如此打折扣兩次，則每畝實收的租量爲〇•八一四石。上表中的〇•九〇二石，實收時可能也要打些折扣，打了以後，可能和〇•八一四石差不多，可能還要少些，大概以比〇•八一四石略少爲更近實情，因爲四五十年來，租額是一般的增加了。板租最高額〇•九石，一般是〇•五石至〇•六石，最低〇•四石（大都是壞田、蕩田，收成有限）；實收時可打七折。大體說來，這比〇•九〇二石爲低，但板租田有押板，即押租，相當於一石米，加上押租的利息，也就相近了。東山區的義田還有包租，那是通用於棉田的，上表所列全是稻田，不能相比，可以不論。無錫蕩口鎮也有好幾個氏族的義田，土改期間也有人做過調查，說，『租額規定每畝大米一石，實收時稍有折扣。〔抗日〕戰前，每畝收糙米六斗五升（〇•六五石）和麥二斗（〇•二石）；戰後收米一二〇斤（合〇•八石）水旱荒年略有折扣』。這也和打折扣以後的〇•九〇二石很相近似。

大體說來，義田的租額和普通私人田地的租額不相上下；實收的數量也是如此。上表又告訴我們一點，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尤其是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蘇南義田租額有顯著的上漲的趨勢；這也是和普通田租一樣的。

根據上面的資料，義田的租額與實收數量，說普通的租額與實收數量，不相上下，甚至好像還低得一些。但這只是一個表面的現象，實際上並不如

此。換言之，義田的剝削並不低於普通田地的剝削，爲的是下面幾個原因。

義田是屬於一族的，就宗法社會的意識形態言之，也算是『公』的，甚至『大公無私』（上文引盛康語），不比私人或一家之事，可以將就過去。潘氏的條規在這一點上說得最清楚：『義田與大概私產不同。私產供一家之用，租缺尚可別挪。若義田缺租，錢糧、膶給，公用何從挪補？嗣後收租，例限年清年欵，不准顆粒拖欠。頑抗者分限追根，呈官後立與准行』。無錫蕩口鎮華老義莊的莊規裏，也有這樣的一條，大概是照潘氏抄襲的。彭氏莊規，於此雖不明說公私原則上的話，口氣也還是一樣的。『國課早完，不可拖欠，糧從租辦；莊用全取給於田租。如佃農恃頑，送官立懲』。范氏『規矩』是比較的不仗官勢的，所以把催租的責任完全放在『勾當人』的身上，勾當人也是族中的人，如催收不足額，即在勾當人應得的月米內扣除，至扣足爲止。條文說，『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尅除請受（原註，謂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請受之類），至納米足日全給（原註：已尅數更不支）』。這就逼得勾當人非把租米收足不可。無論所責成的是佃農，抑或是催租人，目的是一樣的，就是，不准顆粒拖欠；就是，剝削務盡，不留餘地。

上面潘氏的條規裏說到『頑抗者分限追根』。分限的辦法，是值得加以說明的。普通佃農繳租，在蘇南向有『三限』之說，我們在『誰說「江南無封建」？』一稿裏已經說到。頭限是應繳而照繳之日，二限是過了期，但日子不多，三限就更遲了，越遲則外加的租額越重。普通地主大率的半個月至一個月爲一限。如在頭限之前提早繳納，可以照實打九折，頭限照實繳納，二限照實加一成，三限照實加兩成。義田一樣的講求三限，逾限加成，也完全一樣。例如無錫蕩口鎮的華老義莊，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貼出的收租佈告上說：

頭限：開倉日至十一月二日，平田、圩田每畝淨米五斗五升（〇•五五石）。

二限：十一月三日至二十三日，平田、圩田每畝收淨米六斗（〇•六石）

三限：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平田、圩田每畝收淨米六斗五升（〇•六五石）。

一過了三限，每畝便須繳租七斗五升了（〇•七五石）。七斗五升是原定的租額，一過冬至，便須照原額繳清，毫無折扣了。這數目好像比上文所論的租額爲少，但我們應該注意，那是糙米，而這說明是『淨米』，是碾淨了的。華老義莊的三限，每限約爲三星期，與普通的三限無大分別，但有的義莊，追得比它緊得多，至有以五天爲一限的，例如太湖東山區的各義莊。蕩口鎮華老義莊所在地的村子，因爲義莊催租緊，贏得了『老虎村』的渾名。華老義莊規定，水旱可酌量免租：『旱荒要莊房門前河內石頭人出現，水荒要陳大圩淹沒，方可免租』；但到時未必照此辦理，渾名大概是這樣來的。老虎是够兇猛的了，而以五天爲一限的東山各義莊看來比老虎還要兇猛幾分。至於何以要如此兇猛，說來說去，總是因爲這是一族的『公』事，上要完糧，下要贍族，不敢怠慢！

後期蘇南義莊，不但自己加緊剝削農民，還要幫同普通地主剝削農民。我們在『蘇南封建勢力的幾個特點』一稿裏，說到普通地主們，爲了增加收租的效力，有所謂租棧的組織。義莊原是一個有組織的東西，利用現成的機構，比設立一個新機構，要方便得多，於是一部分的義莊就同時成爲本族或他族的普通地主的租棧。太湖東山區便有這種情形，土改期間的調查發見席氏義莊與嚴氏義莊，『爲地主代收租米，帶來了租棧的性質』。無錫蕩口鎮的若干義莊似乎也有同樣的行爲。這在以前，至少在條文上是絕對不許的，目的自然也在避免『公私混淆』，使主持人或委託人得以於中取利，彭氏莊規在這一點上說得最嚴格：『子姓有田產者，凡出由收租完糧等事，均不得借用誼莊名目，違者將田歸莊，永爲莊產』。我們料想，一到抗戰以後，解放以前，租棧的惡風大開，這一類的規條大概也是無法維持的了。

有人以爲，義莊附帶的成爲租棧，更加緊了對農民的剝削，雖屬事實，此種剝削卻不應寫在義莊制度身上。我們認爲這是一個不瞭解問題本質的看法。要知義莊本身就是一種租棧，是一族的租棧；而租棧事實上也就等於一種義莊，由許多不同氏族的地主結合而成的義莊。二者在這一方面的任務完全相同，就是集體收租。二者的性質也完全相同，就是集體剝削。二者原是一邱之貉，所以一到封建的窮途末路，便自然而然的走在一起。說到集體剝削，就說到了義莊義田的本質，揭穿了義莊義田的眞相；我們既認識了它的本來面目，也就從而瞭解，上文所討論的一番宗法的理論只不過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幌子罷了。

九

我們的結論很簡單。義田義莊，好比武訓的義學一樣，名爲義，事實上是不義的。封建的剝削，

不義。封建組織的集體化，更不義。就氏族的內部言，表面上是賑養貧弱，獎助孤寡，實際上是剝奪了勞動生產的能力，培植了依賴游惰的心情，當然是不義。就氏族外的農民與社會說，加强了剝削，壟斷了土地，阻絕了經濟以至其它生活方面的發展，當然是更不義。義田的義字原從墨家的傳統而來（不屬儒家傳統，在此姑不深論），旨在『兼相愛，交相利』，我們看了上文的討論，知道推行義田所得的結果，實質上是『兼相惡，交相害』，恰好與義字的眞諦相反。

義田的不義，以前也有人看到過。明人莊昶作『吉水張氏義莊記』，責備范仲淹不勸君行井田之法，而但知行義田，『以私於一家』（莊定山集）。井田之法是甚麼，我們姑不論，但莊氏認爲政治之道，在推行一個能『公於天下』的方法，而不是『私於一家』的方法，那在原則上總是對的；也唯有『公於天下』的方法才能眞正的兼愛交利。後來陳龍正作家矩，於義利之辨，討論得尤爲詳細，他說，『自從范希文設義莊，後世慕義者多效之。然希文意存至公，後人慕效，遂雜行以利心。即如讀書，豈非佳事？然養贍同宗，專以周急，若不讀書者，雖急寡助；讀書營舉業，雖溫飽猶與之，不過謂舉業可博科第，大門閭，非如農業，僅守廬舍，無光宗族耳。是爲義耶？利耶？恤之耶？覬之耶？又義之爲稱，較自私家室者而言；若通計物我，則周恤同宗，固猶一姓之私惠，非萬物共沾之理也』（家矩，宗族篇）。

以前對義田的批判性的議論，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僅有的兩段，莊氏陳氏的公私義利之辨，在當時已不能不算是進步的了。但是還不夠，他們只看到賙濟的範圍應當推廣，却沒有問到此種賙濟的經濟的來源；他們完全不認識剝削的現象。因此，他們也就無法知道，剝削不去，賙濟的範圍是推不廣的；也不知道，只要剝削一去，社會便無需乎甚麼廣泛的賙濟制度，只要人人能各盡所能，各取所値，一般的賙濟問題也就根本不再發生了。他們更不知道，原有義莊制度的存在，目的正在緩和氏族內部的矛盾，從而加强對氏族以外的農民的剝削。這些是他們所不瞭解的，唯其不瞭解，所以才有一面批判義田、而一面還得寫作義田的正面文章的矛盾。中國社會雖已發展到今日的境界，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這一類思想上的矛盾怕還存在，並且很尖銳的存在。對此，本文如能引起一些消除的作用，就算沒有浪費筆墨了。

編者按：原文長約三萬字，因爲限於篇幅，由編者刪去了關於設置義田和義田畝數的四個統計表（范氏以後的），附此聲明。

稿約

一、本刊是學術性的月刊，內容包括哲學、史學、經濟、政治、法學、文藝理論及一般學術界應知的自然科學理論等部門，性質是研究的、介紹的和批判的。對於現實問題的理論分析，本刊尤爲注重。凡是這方面的學術論著或譯文，一律歡迎投稿。

二、投稿文字，以語體文爲主，須加新式標點。

三、譯稿請儘可能附交原文。

四、來稿一經發表，每千字即按北京人民銀行折實牌價六至十個單位致酬。

五、來稿刊出前如已發表，恕不致酬。

六、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七、稿末請註明作者眞實姓名和通訊處，以便聯系。

八、來稿請寄：「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新建設雜誌社編輯部」收。

訂正

本刊四卷五期第四十四頁『關於後天獲得性和人的階級性』一文第五段所引劉少奇副主席『人的階級性』中的幾句話，承讀者馮俊先生指出錯誤，據作者陳安湖先生來函稱：『我所引的「人的階級性」裏的幾句話，是根據東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的「論思想意識」一書所載的原文。我不知道那篇論文後來已經過劉少奇副主席的原則性的修改，所以引用的時候，未曾加以留意，這是很大的疏忽。既由馮俊先生指出，請予更正爲感。』特此訂正。

論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

——反對漢字改革理論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趙宋光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到今天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了，然而仍然沒有成功，這是什麽原因呢？

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因爲政治條件沒有具備，因爲受到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摧殘，因爲在全國範圍內革命力量還不够强大，因爲文化建設問題還沒有提到革命日程上來？——這種種說法，在革命勝利以前，還能使人相信，但在今天，顯然是完全站不住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失敗，是不能用政治條件來辯解的。

原因是什麽呢？

拉丁化使統一的民族文字分裂爲好幾種方言文字，這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在實行拉丁化以後，許多固有的詞彙會和別的詞彙混淆，因爲拉丁化是從個別方言的角度來記錄語言的。拉丁化新文字只能丢棄這些詞彙，結果，詞彙太貧乏了，思想的表達受到了限制，這也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漢字在中國的民族文化生活中已具有悠久的深厚的傳統，而拉丁化新文字簡單地拋棄了這種傳統，這也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這一切現象，不是偶然堆在一起的，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理論根源。

我們在拉丁化的工作綱領裏找到了這樣的話：

……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羣衆的工具之一，實爲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註一）

……一個民族的文字改革，是這民族在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必然的要求，也就是民主革命無可逃避的任務。（註二）

這兩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文字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當舊的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它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漢字只能替舊的衰亡的制度服務，不能替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務，只能替剝削者服務，不能替被剝削者服務。漢字應該像封建的上層建築一樣被消滅。

我們以爲，漢字改革是必要的，然而像拉丁化新文字論者這樣來提問題却是錯誤的。

因爲文字，正如語言一樣，不是上層建築，不是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消滅而變化消滅的，它不是某一個階級所創造的，而是全社會，全社會各個階級幾百代的努力所創造的，因而可以一視同仁地替新舊制度服務，替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服務。

文字是語言的記錄，是書寫的語言，它在實質上就是語言。『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把語言認爲基礎的上層建築，把語言與上層建築混爲一談，就是犯了嚴重的錯誤。』（註三）——這一論點對文字來說也是完全適合的。

但有人要反對說：文字和語言究竟是不相同的，語言當然是全社會的，文字呢？旣然在舊社會裏，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那麽文字不明明是少數知識階層的『同行字』嗎？

然而問題的中心是在：文字畢竟是語言的紀錄，是作爲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而使用着的。只要文字具有這樣的性質，它就只能記錄全社會的語言而不能只記錄某一階級某一階層的同行語，否則便不成其爲文字。由於文字的這一性質，儘管有文盲的存在，文字仍然是屬於全社會的，而不會成爲某一階層的同行字。文盲如果要用文字，能不能自己創造一種以非知識階層多數爲代表的『全社會』所用的『全民文字』來代替原有的文字呢？顯然是不能的，他們必須向知識份子學習，用知識份子所用的文字。因爲原有的文字同樣可以記錄他們的語言，可以爲他們像爲原有的知識份子一樣服務得很好。

所以文盲存在的現象，絲毫也不改變文字的全社會性，絲毫也不能證明漢字必須作爲階級壓迫的工具而被消滅。漢字的現狀，是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我們把漢字敎給工農羣衆，固然有許多教學上的困難，但並沒有什麽根本不適合之處，並沒有由於漢字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知識階層的同行字』而

與工農的要求發生矛盾。工農羣衆是渴望着學習漢字的。

漢字是不會作爲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消滅掉的。那末究竟爲什麼要實行漢字改革呢？既然文字不能像上層建築那樣發生革命，那末漢字改革還有什麼成功的可能呢？

不對，漢字改革是有充分根據的。當然，文字不是上層建築，像上層建築那樣的革命，在文字裏是不可能發生的。但漢字却有它自己的革命規律，漢字改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漢字自己的革命規律，只要我們對漢字作一番分析，就可以發現的。

漢字本身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字的音，它和語言的音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是字的形，它和語言的音是毫不相關的。

漢字發展的歷史，是這兩個方面鬥爭的歷史。漢字的發展過程，即它的構造方法由象形指事到形聲的發展過程，我們如果加以分析，就會看出其中音和形的鬥爭。

舉『貢』爲例。這個字，由『工』和『貝』兩個原始字形組成，它們像任何原始字形一樣，是以摹擬一定事物的情狀而構成的。（註四）在這裏，音和形的矛盾已經存在了，音是從語言的音取得的，形則是從事物的外形取得的。它們各有其不同的來源，因此也有其不同的發展方向。發展下去，矛盾便展開了。

按照音的發展方向，就是借用原始字形的音以構成或成立新的字，（註五）像這裏的『工』。在這種字裏，音佔了優勢，形已經失去了意義，變成一堆骸骨。但是音雖然優勝了，却並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它還是依賴着與它對立的形的。這表現於以下兩點：一、『工』和另外一些具有共同音素的字『公』、『高』、『瓜』、『鬼』，在字形上毫無共同點。在字裏面，有和音對立的形存在着。二、『貢』是去聲的，『工』却始終只能表示一個平聲，我們所要求的去聲不能自由地表示出來。在字裏面，形已經成了音的桎梏。由此可見，正由於音的優勝，矛盾倒尖銳化了。

至於形的發展方向呢，情形就不一樣了。如果我們把事情簡單化，我們可以說：在『貢』裏，『貝』是採取了由它的形體所直接表示出來的意義，而失掉了原來的音。然而這是不充分的。事實上，借用原始字形的原意的造字法，曾經經過兩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借用過來的字構成新字的主要部份。例如，『代』是由『人』『戈』構成的，其中兩個字形都是主要的。又如『考』是由『老』轉化來的，其中『老』是主要部份。（註六）第二個階段，借用過來的字在新字中僅居從屬地位。像『貝』在『貢』裏面就是這樣。『貢』的主要構成部分是『工』，但『工』是平聲，而我們要的是去聲，爲區別音才加上『貝』。（註七）這樣，雖然對於『貝』這種原始字形來說，字形是佔了優勢，但就整個字的範圍來說，形是從屬於音的。第一階段所產生的字，數量很少，第二階段所產生的字，却佔了漢字的絕大多數。由此可見，即使按着形的方向發展，最後的和主要的結果也還是音佔了優勢。只是這裏矛盾更爲複雜。

從漢字的發展過程中，我們能看出什麼呢？

一、音是優勝者。

二、音是漢字發展中的革命因素。爲什麼『借音』的方法終於成了主要的造字法？爲什麼『借義』的字普遍地從屬於『借音』的字呢？唯一的原因是在於音是革命的因素。而這是不難理解的。文字是記錄語言的工具，只有語言的發展才能推動它的發展，而文字的音，正是傳遞這個推動力的槓桿，因此，文字的音推動了文字的發展。

漢字的音，是優勝的，革命的，而它的形呢，是笨拙的，起着相反作用的。這就是矛盾的鬥爭。原始字形的形體，總是跟不上語言的發展，不能簡單明瞭地表現豐富的語音，約束着字形表現音的能力，阻礙着文字的發展。這就是漢字難學、難寫、難印刷等等的根本原因。

怎樣來解決矛盾呢？拚音化。在舊漢字，音是藉它的對立物，非拚音性質的原始字形來表現自己的，拚音化就是叫音化身爲字母而表現出來。征服它的對立物，轉變其成爲自己的化身，這就是音的要求。

誰賦予了音以權力來執行呢？是文字的發展。

在語言文字的迅速發展中，音的重要性提到第一位了，因爲每一個新字的成立實質上都是一個新的音在文字上的出現。新音的迅速成立，已經不是那些原始字形本身所勉强說明得了的了，而要求創立一門新的學問來說明它們，聲韻學便這樣創立起來了，聲韻學發展的結果，就使我們能精密地分析每一個字的音，從音本身的內部結構來把握每一個字。於是就給字的創立準備了條件，給音的擺脫原始字形束縛而獨立準備了條件。

漢字拚音化，是漢字內部矛盾所爆發的革命，是它自己的音的進一步發展，這就是漢字改革不僅可能成功而且必然成功的原因所在。

這是問題的正確提法。（註八）

那末，社會革命和漢字改革有沒有聯繫呢？漢字改革是不是與革命無關的呢？

不，社會革命和漢字改革是有聯繫的，而且有很密切的聯繫。但是如果把這聯繫當作唯一地，把社會革命的影響當作文字改革的直接原因，那就看錯了。因爲事實上社會革命並不必然引起文字改革，所引起的文字改革也不都是同一種性質的。（註九）我們說，漢字改革是社會革命所引起的，沒有社會革命的推動力，漢字拚音化運動是不可能上升，更不可能勝利的。但如果把問題簡單化，看不見漢字本身的矛盾發展與革命規律，那就錯了。因爲對拚音化運動的發展說來，社會革命是外在的條件，間接起作用的因素，而漢字本身的矛盾則是內在的根據，直接起作用的因素。社會革命縱是十分重要的條件，但到底是外在的間接的，革命只是促使矛盾成熟、爆發，只有在漢字本身有其矛盾的情況之下，革命才能起作用。

漢字改革問題有兩種提法。拉丁化的提法：把漢字作爲封建上層建築予以消滅；我們的提法：按照漢字自己的音的發展要求來實行漢字拚音化。

這兩種提法，既然都主張漢字改革，又都肯定社會革命與漢字改革的密切聯繫，那末還有什麼根本不同呢？

如果我們看一看在實際問題上兩者所採取的態度，那末就立刻會認出，兩者不僅是根本不同，而且是根本相反。

拉丁化的提法，因爲沒有能把漢字內部的革命的音和保守的形區別開，所以主張丟棄漢字，置之不理；我們的提法，因爲區別了這矛盾的兩面，所以主張深入漢字，研究它的音。

漢字的音，在各方言中有各方言的念法，這是漢字字音的特性。由於這一特性，在各地方言分歧的情況之下，統一的全民族文字仍然有存在的可能。拉丁化的提法，因爲主張丟棄漢字，也就主張把各地的方言分別地記錄爲好幾種不同的文字，代替原有的統一的全民族文字。這樣，就把文字的統一性破壞了。我們的提法，因爲主張發展漢字的音，所以主張用拚音方法把漢字的音照樣的表示出來，保留它原有的特性，容許同一個字，在各地念各地的音。這樣就保持了文字的統一性。

漢字的詞彙，是各方言詞彙集中起來的產物。由於漢字能夠集中各方言詞彙，所以我們民族語言的詞彙有這樣豐富。這樣豐富的詞彙，在各個別方言看來，其中有不少同音的字，但在許多情況下，甲方言中的同音字，在乙方言中卻把它們區別開了，不是同音了。（註十）拉丁化的提法，因爲主張把各個別方言分別紀錄爲不同的文字，因而在每一種方言文字裏都造成了不少同音詞彙，所以就主張淘汰不少原有的詞彙，創造新的詞彙來代替它們。但是新的詞彙是不能很快創造出來的，尤其是不能靠主觀主義的設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結果祇是破壞了民族語言的豐富性。我們的提法，因爲主張把漢字的音照樣表示出來，保留它適合各方言讀音的特性，所以就主張保留原有的詞彙，以便在原有詞彙的基礎上發展語言。這樣就保持了民族語言的豐富性。

拉丁化的提法，反映了一部分漢字改革工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他們一說要改革漢字，就否定漢字的一切方面，忽視漢字的現實意義，看不見漢字內部的革命因素，看不見漢字字音的特殊優點，甚至把優點當作缺點，把漢字一腳踢開，丟在腦後，再擅自制訂了一套『新文字』，革起漢字的命來。這樣否定一切，片面誇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使漢字改革運動失去了現實基礎，變成少數人的空想，因而遭受失敗。

這是嚴重的錯誤，不克服這個錯誤，就會陷於革命的空談，就會使漢字改革不可能成功。而只有把漢字改革看作漢字本身的拚音化，才能克服這個錯誤。這一觀點要求我們實事求是的對待漢字，研究與分析漢字的音，在現實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工作。

然而拉丁化理論裏還有一些別的論點，總是來證明拉丁化的提法似乎是正確的，在這些論點裏，同樣反映着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

……妨害中國語言統一的最大障礙，就是方塊漢字。（略）…每一個漢字沒有一定的讀音，同一書面的『統一語』，在北方人讀起來與廣東人完全兩樣，因此使各地方言——口頭語越來越分歧，越少統一性。（註十一）

這顯然是錯誤的。馬克思論到統一的民族語言形式道路的問題時說：『方言、習慣語集中爲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政治的集中來決定的。』（註十二）漢語不統一的主要和決定的原因是經濟政治的封建性質，不在文字，文字不可能成爲統一的『最大障礙』。如果我們要估計文字對語言統一的任何可能的非決定性的反作用的話，那末，說統一的文字會妨礙語言的統一，也是完全不合理的。

事實上，文字讀音的不統一，正是語言音不統一的結果。上述這種說法，顯然是倒因爲果。而在各地語言音很不一致的情形下，漢字的統一性正是其優點而不是什麼應該排斥的缺點。採取主觀主義的態度否定漢字的這種特點和優點是不對的。

在另一個地方，拉丁化理論宣稱漢語已經發生了革命，變成複音節語了。（註十三）這是指的什麼呢？這只是指一種現象：在現代漢語中，多音節詞的形成，已經非常普遍了。

然而多音節詞的形成，難道就等於『變成複音節語』嗎？

多音節詞有兩種：第一種，構成詞的各個音節，並無其獨立意義，正確的說：它的成立只是由單純的音，而不是由有含義的音互相結合成的。像歐洲、非洲的多數語族，語言剛一發生，就出現了這樣的詞。第二種：構成詞的各個音節原有其獨立意義，詞是由有含義的音互相結合成的。這種詞的形成，總是在語言發展成熟以後。它可能在單音詞的基礎上產生，如漢語中的多數多音節詞，例：『國際』，它也可能在第一種多音節詞的基礎上產生，如西洋多種語言中的合成字，例 International，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第一種多音節詞，稱爲複音節詞很合適，同樣，把那些以這種詞佔優勢的語族語系稱爲複音節語也很合適。但第二種多音節詞却應該稱之爲合成詞，因爲在某種情況下它的多音節不是生就的而是發展的結果。因此，把像現代漢語那樣的這種詞中的以單音詞爲基礎者佔優勢的語族語系稱爲複音節語，就非常不合理。既然漢語中的多音節詞絕大多數——如果我們只計算全民族通用的複音節詞，那末幾乎是百分之百了——是在單音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合成詞，那末，我們就沒有理由稱現代漢語爲複音節語，而仍應該稱它爲單音節語，只是可以冠以『高級的』，以說明它的新特徵。

語言『革命』在漢語中發生了沒有呢？沒有。單音節語由低級發展到高級，非但絲毫沒有丟棄原來的單音節詞，而且倒是以保存它們爲條件的。

按照漢語革命論的說法，漢字應該被消滅，代之以複音節的文字，正如封建社會應該被消滅，代之以新民主主義社會。然而漢語革命論是完全錯了。漢語革命論的錯誤，和馬爾的語言『突變』論一樣，歸根結蒂是在於把語言當作上層建築。

其次，犯這種錯誤是由於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緣故。漢語革命論者看見西洋的複音節語的特徵之一是有複音節詞，又看見在漢語中已經發展了大量的多音節詞，於是宣稱道：漢語革命了，至於這些多音節詞的本質的差別呢？那是不管的。

拉丁化者這裏還犯了一個極嚴重的錯誤：他們把帝國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語言學『理論』搬過來了。

帝國主義的語言學家爲要裝扮自己民族爲『高等人種』，就發明了一套『理論』，說什麼單音節語是低級的、落後的，來汚蔑我們的民族語言。我們的『語言改革家』（註十四）把這種理論搬了來，而且還給它劃上一副『革命』的花臉，叫人家看不透它的眞面目。這種說法的實際效果就是，歪曲我們對漢語發展方面的認識，斬斷我們民族語言的發展，叫我們把遺產全丟乾淨，把語言弄得貧乏不堪。

拉丁化的問題提法儘管有拉丁化理論的一些其他論點所支持，總是站不住脚，因爲那些論點都是不合事實的。

按照漢字自己的音的發展要求來實行拚音化，從而建立符合於我們的語言文字發展規律的字母、拚法、讀法、寫法等。這樣來提問題，固然會引起一些看起來不容易立即得到解決的問題，但是，它之不同於並且優越於拉丁化的問題提法者是在於：它把這些問題正面提了出來，以便解決它們，而不是用主觀主義的革命的空談把它們掩蓋起來，或是一筆抹殺。

一九五一年八月七日

註一：『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收於『中國語文的新生』，倪海曙編，時代書報出版社，一九四九）

註二：『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收於同書）

註三：『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

註四：這是象形與指事，兩者的不同是：前者是具體的，即表形；後者是抽象的，即表意。

註五：借用其音而單獨成字的，是假借；與別的字形結合成字的，是形聲或諧聲。

註六：由兩個以上這樣借用來的字形構成字的，是會意；由單個這樣的字形加上別種字形構成的，是轉注。關於轉注，頗多爭論。說文解字序解釋轉注說：『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這句話有兩種解釋。依段玉裁的了解是：「一其義類，所謂建類一首也，互其訓詁，所謂同意相受也。」鄭樵通志六書略中的說法也與他相合：『諧聲轉注一也，役它爲諧聲，役己爲轉注』。（下轉25頁）

現實主義的美學基礎

鄭爲

『社會物質生活，是離開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馬克思。

辯證唯物論認定自然、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思惟、意識是第二性的，藝術的活動，乃是社會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物之一）的一種形式，一定的社會基礎， 決定一定的藝術內容與形式 。ALTAMIRA洞穴裏的『牡牛』壁畫，是狩獵時期人民生活的對象；埃及的金字塔，刻劃奴隸社會帝王的血腥統治與人民被奴役的悲苦跡象；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與，說明了新興的社會力量對封建權力的鬥爭。我們說藝術是感情的表現或性格的發揮，這是不『錯』的，但並不完全『是』的，因爲其間沒有說明感情、性格是決定於他那生活的社會基礎之上的。歷史唯物論昭示我們：『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社會存在，而是相反的，乃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同樣，我們要洞察藝術的形式和內容，也不能從個別或少數藝術家的『個性』或『天才』中去探索，而必須從藝術作品所由產生的社會基礎中去尋求。每個藝術家都自覺地與不自覺地表現了他作品的『階級性』。拿亨利摩爾（HENRY MOORE）偃臥的形體（RECLINING FIGURE）和畢卡索（PABLO PICASSO）在一九四九年所作的靜物（NATURE MORTE）和一九二九年所作的紅靠椅的女人(BUSTE DE FEMME AU FAUTEUIL ROUGE)等給那些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工人看，不論你批評家如何說成這是現實裏最樸素的作品，他們仍然連一絲一毫也不能在『形體的結構』裏叫出個物體的名字來。元代四大家的『山林逸趣』，爲士大夫所撫摩不忍釋手，但對當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動農民，就壓根兒也無法領略這種墮落的『逸趣』的。在階級社會裏，特殊的階級思想意識，不但不相同，卻常常完全相反。階級的存在，意味着剝削關係的存在。這種剝削的社會關係，都直接間接地反映在藝術活動上，因爲藝術最能傳達人的情緒，特別是階級的情緒，而且他感染媒介的能力亦最大。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帝國主義階段時，資產階級藝術的特點，就是用腐化的思想意識，來麻醉廣大的羣衆，誘導他們走墮落的道路，並用頹廢的形式，來導引藝術家『製造』藝術的『純』性，以掩蓋其政治上的反動性，不但如此，他們更進一步抹殺古典藝術上優良的現實主義的法則與技術，在音樂上『把基調性（ATONALITY）不協和音（DISSONANCE）與不協合的和聲（DISHARMONY），宣傳做好像是音樂形式發展中的「進步」與「革新」的表現，拋棄音樂作品中最重要的基礎——旋律；熱中於混亂的神經質的聲音結合，把音樂變成不協和的噪音，變成一堆亂七八糟的聲音的堆積，這種音樂……表現階級文化的衰敗，音樂藝術的全部否定和它的絕路。』——（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摩拉德里的歌劇『偉大的友愛』的決議）。

在繪畫上，也遠遠地離開了現實主義的風格，捨棄內容、主題，用荒誕不經的『形體結構』來歪曲現實，把物質世界隸屬於個人無組織的感覺印象，盡量地發洩精神上的淆亂與矛盾，使藝術品成爲不可理解的『物自體』了。

資產階級這種在藝術上亂七八糟奇形怪狀的反人道反自然的表現，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絕無一點根據的『幻想的宇宙』，甚至連那些被批評家捧爲優秀作家的如馬諦思、畢卡索之流，在他們的自白裏，也完全承認他們作品的不可理解，一致都說在創作前，自已也完全不知道要在畫布上做些什麼，會有些怎樣的後果，可是從這裏，我們卻看到這正是在資本主義的下坡路上，頹廢的資產階級最具體的『精神現象』。它反映了帝國主義在今天最唯心最反動的形式，反動統治者設法使藝術與人民脫節，高唱藝術『超階級』的論調，麻痺人民的『理性』，同時僱用一些庸俗的理論家，來引誘那些使形式破壞，言語瓦解，使事物不可辨認，使音樂成爲非音樂，美術成爲非美術的藝術家。這些反理性反人道的作品，都說明了藝術家要受他階級的約束，即在畢卡索，勃拉克，馬諦思等資產階級藝術家的作品上，我們不難看到藝術家的靈魂已被腐朽的資本主義所侵蝕，藝術家已經失去了作爲一個『人』所能控制的理性了。他們的作品是不健康的，他們的精神是有痛苦的。所以我們敢於相信，這些作家的心

還沒有完全死掉，祇要自覺到他靈魂被腐蝕這一點，就能够在『死灰』裏重新復活，面對人民而走向健康，畢卡索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知道：歷史是發展的，階級關係也是發展的。而藝術的形式與內容，就是孵胎於對立的階級意識之中的，唯其因爲階級意識也是彼此對立的，所以藝術是『反映社會物質基礎及產生在這基礎之上的階級鬥爭』的表現，而成爲人類意識形態與情緒的衝擊力量，它一面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時期的經濟、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反映，是社會存在的產物，而同時這種反映却對這個存在着的社會起着能動的作用。唯有理解到這一點，我們來從事美學的追求和藝術史的探討才有可能，也才有價值。藝術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裏，是鼓舞階級情緒的武器，儘管資產階級的統治者渲染了頹廢藝術的『純』性，抹殺了現實的眞實，但他們的歪曲，決然逃不脫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頹廢藝術必然趨於崩潰的規律。

因此，藝術工作者必須提高階級覺悟，認識到勞動人民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體會他們的思想和生活。車爾尼舍夫斯基在美學上提出重視生活、主張『藝術低於生活』，『美的對象不依附主體而客觀地存在的』。這種富有胆識的斷語，說明了他理解藝術，因而重視生活，所以他又說『現實必須通過主體的感官和頭腦才能反映被認識的事物』。不僅如此，這種通過了感官和頭腦所反映的，不單是直觀的圖式的描寫，『而是伴着強烈愛憎的感情』。伴着強烈愛憎的感情，在沒有認識到勞動階級與熟習他們的思想和生活之前是絕不可能的。唯有瞭解了他們的思想和生活之後，才能够正確地體會到他們的要求與興趣，才能在作品上表現出現實生活的眞實性，才能烘托出人民的快樂或痛苦。在這裏，也同時回答了一個問題，就是：一件屬於人民的藝術品，甚至一個人民的藝術家的產生，不能決定於他的階級出身，而決定於藝術家的生活實踐鬥爭實踐。如果衡量一件藝術品的『人民性』，局限於作者的階級出身，這就不是唯物辯證的看法，因爲把『人民性』看做特定的事物，而忽略了它本於『整個創造最偉大的和永遠汲取不盡的泉源』——人民。因爲，它是佔世界絕大多數的，是『偉大的海洋』，是最普遍的眞實，沒有一個階級範疇可以拒絕或孤立這種力量的，尤其在偉大的藝術家，他愈深刻愈卓越地體驗到這種力量，心照到這種眞理，而且常常是先於人們感覺到這個眞理的呼召與壓力，『用詞句來焦灼人們的心』的普希金，在很早時候，已經預見到在專制壓迫下的俄國人民將甦醒回來，向着新的生活前進。柏林斯基說過普希金的詩篇『是對俄國社會的一個認識上的判決書，並且差不多是第一個判決書』。同樣，托爾斯泰的作品，有着俄羅斯人民生活的最廣泛的反映，在列寧與高爾基的談話裏曾說：『在這位伯爵以前的文學中，是找不到眞正農民的』，這些偉大的作家們，都是貴族出身，但在革命的前夜，眞理照亮了他們，使他們做了人民的火把，他們的作品，一直充滿着革命的熱。所以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所表現的『人民性』，要從他對人民的關係上來看，要從作品所反映的人民生活內容的深度與作品所表現的人民的要求與希望來看。我們都承認：創造人類歷史的是廣大的勞動人民，所以『人民性』就成爲藝術這個概念裏的一個必要的因素，它使生動的現實形象化了，它不斷地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最豐富的內容，祇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現實主義的美學來。

唯其如此，我們要確立現實主義的美學基礎，就必須站穩了爲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這一點。第一步，藝術家要有對勞動人民的生活體驗與階級感情。一八二三年，被幽禁在米哈洛夫村的普希金，在冬夜裏聽他的乳媽阿林娜、羅地翁諾夫娜講故事，這給普希金體驗了勞動階級的生活與感情，才創作了金魚與漁夫，沙皇薩爾丹等故事詩，儘管這是間接的。要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內容，就必須關心人民的生活，要與他們共甘苦，要瞭解他們的興趣，這樣才能把活生生的現實溶解在作品裏。在哈利・馬爾特爾(HARRY MARTEL)和馬爾文・雷斯(MARVIN REISS)合著的『藝術與階級』裏說：『勞動階級的利益，要求藝術中的眞理，正如經濟政治學中一樣』。所以體驗生活，提高階級覺悟和熟悉勞動人民的感情，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藝術工作者所應具備的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主觀條件。

藝術工作者對藝術創造既然有了正確的認識並且具備了上述的條件，就應該基於這樣的認識，在現象世界裏，進一步有組織有重點地凝固他的『形象』，使散在空間形式裏的『形』，轉而爲『型』，使閃爍在時間形式裏的『相』，具而爲『體』，從生活『形象』之眞，昇華爲藝術『概括』之眞。像這樣的藝術品，才是經過藝術家千錘萬鍊後所創造出來的，它百倍豐富了生活對象的眞實性，它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觀事物。文藝創作上的『白毛女』，可以作爲一個例子，我們通過了它，認識到北方地主欺逼農民的醜惡面目，這故事表現了典型的封建環境中典型的地主面目，這裏面每一滴現實的血淚，都伴同着藝術家的強烈愛憎的感情，以百倍的豐富（在音節，形象的創造上），還給生活的『對象』，還給現實的人民，這樣的藝術作品才是現實主義美學基礎進一步所要求的。

（下載六七頁）

關於認識的發展過程

楊贊時

學術討論

『新建設』第四卷第三期載有沈志遠先生的『「實踐論」的意義及其基本觀點』一文，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部份是有待商榷的。

第一，沈先生把『對某一事物在一定階段上與一定時間內的認識過程』看作只『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過程。』㊀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爲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㊁因爲『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眞理性這個問題，在……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够達到預想的目的。』㊁只有到了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時，『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才『算是完成了。』㊁檢驗理論（跟發展理論）的過程即再實踐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㊁否認這一點，縱使只討論『對某一事物在一定階段上與一定時間內的認識過程，』也是錯誤的。

沈先生也清楚地指出『由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認識沒有『就此停止。』但爲什麼不就此停止呢？沈先生答道：『因爲上面所說的理性認識，是指的對某一事物在某一階段上的認識。可是事物是不斷地在發展着變化着的，成爲客觀事物之反映的認識，也就必須隨之而發展、變化。』㊀由此可以知道，他認爲認識運動之所以不停止於理性認識，只是因爲客觀過程推移到了另一階段，而不是因爲理性認識是否合於客觀眞理性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所以，照沈先生的見解，如果只要認識某一事物的某一發展階段而不是較高的另一階段，那末理性認識就『算是達到了眞理認識之域，』㊀用不着在再實踐中去檢驗。

其次，沈先生對認識過程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對於某一事物（或事件）在某一發展階段中的認識。另一種是指人類認識發展的全過程、長過程。』『對某一事物在一定階段上與一定時間內的認識過程，也就是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過程。』『認識發展的全部過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㊀

根據『實踐論』，我們知道認識發展的形式只有一種：實踐、認識（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實踐（理性認識指導實踐，在實踐中檢驗理論跟發展理論）、再認識。因此，對認識過程有『兩種看法』是錯誤的。

註㊀沈志遠：『「實踐論」的意義及其基本觀點』

㊁毛澤東：『實踐論』

答楊贊時先生

你的意見，已由『新建設』編者轉給我了。承你指出我在『實踐論的意義及其基本觀點』一文第三節關於認識的發展過程部分中的錯誤，甚爲感激。我應承認，在說明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之後，不提及回到實踐中去檢驗這一點，確是一個重大的疏漏。即使對於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事物（或過程）的認識，亦決不止於理性認識，而應回到實踐中去，經過實踐的檢驗而能實現預期的目的時，這一認識運動才算告一段落。雖然在我的文章的第二節第二段內，關於認識必須受到實踐的檢驗，實踐是認識眞理性的標準，都曾反覆舉例說明了，但是我在第三節文章裏，確有給讀者以對一定階段內一定事物的認識過程就是從感性認識上昇到理性認識爲止的印象，這總是一個錯誤。承你指示，對我和對讀者都有裨益。

至於『對認識過程可以有兩種看法』的話，我認爲這樣說並沒有毛病。因爲說『對於認識過程可以有兩種看法』，並不等於說『客觀上存在着兩種認識過程』；如果是後者，那是錯誤的；如果說對發展中的某一事物可以有兩種看法，那是可以的，而且是並不矛盾的。毛主席在『實踐論』裏也說到『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這就是我所說的『某一事物在某一發展階段中的認識』，又說『然對過程的推移而言……任何過程……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向前推移與發展』，『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這就是我文中所說的『人類認識發展的全過程，長過程』，亦即我所說的認識是『永無止境的長過程，人類不斷地實踐，不斷地認識，實踐永無停止地進行一天，認識也就永遠沒有止境。』總之毛主席的書裏既說經過實踐的檢驗而得到預想的結果，『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接着又說：『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這裏很明顯地表示着對於認識過程是可以有兩種看法的。

臨了，我要聲明一句：那篇文章是我的一篇講演紀錄稿，雖曾由我自己看過校過，由於事情忙，仍不免有粗糙之感。除你所指出的和經我認識的一點錯誤外，可能還有別的毛病，還望別的讀者們有以教我！對於你的指示，我敬表謝意。

沈志遠

關於黨性與階級性

李澤厚

讀了「新建設」三卷四期關於黨性、階級性等問題的討論。對於莊先生的一些意見，我有稍許不同的看法，提出來和大家商榷。

一、關於黨性與階級性的關係問題。賀麟先生說：「黨性廣義說來就是階級性」，這話的確有些「欠確切」；但莊先生所說的「黨性的基礎應該是階級性」，也不過是對這種說法作了一個着重的修正和補充，指出了黨性與階級性一定從屬和相互的關係。但若僅就這點來認識黨性那還是不夠全面和明確的。因爲黨性不僅是在階級性的基礎上產生出來，與階級性有着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它還是有着它與階級性的差異的特點。而這特點就正是它是階級性的明確化、組織化和集中化。比較起來，也正如莊先生自己所說，黨性是更富於原則性和戰鬥性的。因此，只有具備了這種特性，馬列主義哲學的黨性才能是無產階級鬥爭的「最尖銳的武器」，才能是無產階級宇宙觀的「最深刻的科學性的表現」，也才能夠指導整個無產階級進行鬥爭。所以，如劉少奇副主席所指出：「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也才正是最明確和深刻地闡明了黨性與階級性的一定的關係。至於用狹義和廣義來說黨性和階級性，這幾乎是把黨性和階級性完全等同起來，把黨性還元於階級性，這也是不夠正確的。

二、莊先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每一個階級都有黨性？」但又並沒有作明確的回答。而只是說：「因此，我們一般說到黨性，與日丹諾夫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所提到的「黨性」，也只是指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黨性而言。」這是對的，我們一般所說的「黨性」，都的確是指我們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黨性，因爲我們是以承認和强調黨性爲自然和光榮的事的。但這是否說：用「無黨性」「超階級」標榜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就眞正沒有黨性了呢？顯然，如所周知，還是不正確的。任何科學和哲學都是有黨性的。任何科學和哲學都是服役於特定階級及其政黨，都是建築在對於現實的黨派的立場之上的。所以，哲學中黨性的有無，就並不一定決定於這種哲學與某個有一定組織形式的政黨是否發生密切的、公開的關連；或是否公開依附於某一政黨。哲學中的黨性也就並不隨着某一政黨的存亡而存亡。

再談哲學中的黨性

莊本先

我讀了李先生的文章，得到了不少的啓發。這裏謹對李先生所提出的意見作一個初步的答覆。

一、我說「黨性是階級性的高度集中表現」原是根據劉少奇副主席「黨性就是人們這種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一句話而來的。（人的階級性）劉少奇副主席說「最高而集中」，我則說成「高度集中」，這與賀先生和李先生所說的「階級性的明確化、組織化和集中化」正是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所爭論。

我認爲「黨性的基礎應該是階級性」，這也是「高度集中表現」這句話反過來的又一引伸。我說黨性是建立在無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上的，又說黨性是意識形態的原則，因爲是意識形態的原則，所以是一種上層建築。

二、我認爲一般說到黨性，與日丹諾夫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所提到的黨性，只是指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黨性而言，這並不等於說除了無產階級以外，其他的階級就沒有黨性。因爲我旣已肯定了黨性是階級性的高度集中表現，又說了意識形態是有其階級性的；「人們也有各種不同的黨性：有封建階級的黨性，資產階級的黨性，無產階級的黨性等。」（劉少奇：人的階級性）「現代哲學是有黨派性的，正如兩千年前的哲學一樣是有黨派性的。」（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但我只着重說明了我們一般說到黨性是指無產階級的黨性，又引證了沃斯特利可夫的論黨性中所說資產階級公開地以「無黨性」來掩蓋他們意識形態的黨性的說法，這樣也許容易使人誤會我認爲資產階級的哲學是沒有黨性的。李先生的意見補正了我忽略另一面的說法，這是應該感謝的。

三、正如資產階級慣以「超階級」的形式來表現它意識形態的階級內容一樣，資產階級的黨性也是以「無黨性」相標榜的。强調「無黨性」正是它特別明顯的表現形式，資產階級的哲學是慣於躲身在「非黨派性」和「中立性」的外衣之下的。相反的「世界歷史上只有共產黨員及馬克思主義者，才承認自己與一切人們及歷史社會事物的黨性與階級性。」（人的階級性）這是兩者的重大差異。

我們知道政治上是沒有中間路綫的，在哲學的領域上也是一樣，古今中外只有兩個營壘，兩條基本路綫，兩個基本方向，「或者是澈頭澈尾的唯物論，或者是哲學唯心論的謊言和糊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既然「互相鬥爭着的黨派實質上是唯物論與唯心論」（同上），那麼談哲學上的黨性，自然不一定要以某一階級有無正式的政黨爲依歸，也就是說，哲學裏的鬥爭不過只是反映着在衝突的階級和政黨之間的鬥爭罷了。（論黨性）我想李先生所說的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就是政黨，任何科學和哲學都是服役於特定的階級和政黨，也就是這個意思。

（寄自青海日報社）

本社新書
學習「實踐論」第二輯
李達 謝覺哉 何思敬等著
定價每冊四千元
新華書店總經售

關於『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第二編

俞元桂

老舍先生等所草擬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新建設』四卷四期），對『中國語文學系』的教師來說，那是得益不少的。不過，對於大綱裏第二編『新文學的擴展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二七）』裏的章節，我要提出一些淺薄的意見。

第一、在整個大綱的編製上，第二編和其他各編是不統一的。因爲其他各編是先論述文藝思想鬥爭，而後論述各該時期的文藝創作，這樣是較合理的。第二編的二、三兩章是論述文藝創作的，應該放在第二編的末後。

第二、在文藝創作的各部門——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的作家，隨着新民主主義革命形勢的發展，而起訖他們的創作生活或轉變他們的創作態度，這些作家是不斷地在改造自己的。像教學大綱緒論第三章『新文學發展的特點』所論列的；如果這個作家不受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沒有做爲新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裏的戰鬥員，沒有實踐工農兵方向，缺少新現實主義的精神，那麼他必然不受人民大衆的歡迎，不是終止他的寫作生活或是轉業，便要逃避到虛無幻滅的境界裏，甚至自殺。這些現象從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的文藝作家表現得淋漓盡致了。第二編第二、三兩章沒有明顯地指出本時期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創作的面貌，在文藝創作各部門和個別作家創作生活的發展上，就不能給讀者以明確的承先啓後的線索。第二編二、三兩章所提到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作家，魯迅及其有關的作家，那是偏重於小說方面，這是不够的。

第三、我非常同意教學大綱裏第三、四、五各編有關作品各章的類例與分類，雖然可能掛一漏萬，但起碼是較爲具體的。我現在嘗試給『新文學的擴展時期』的文藝創作部分擬些小標題，向原草擬的四位先生請教。

一、本時期的詩歌

1. 熱情的和踏實的戰鬥（蔣光慈、郭沫若、劉一聲、朱自清等）

註：教學大綱第三編『左聯成立前後十年』所提到的蔣光慈和郭沫若的詩歌，比起本時期內的創作是有發展的。

2. 對渺茫將來的顫慄（冰心、周作人、俞平伯、劉大白等）

3. 超現實理想的破滅（聞一多、徐志摩、朱湘等）

4. 朦朧的幻夢（李金髮、戴望舒、王獨清等）

註：『左聯成立前後十年』的『新月派』與『現代派』的詩歌，是在現實鬥爭更殘酷的時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作家的創作更進一步的表現。

二、本時期的小說

1. 革命的道路（蔣光慈等）

註：蔣光慈的『少年飄泊者』及『鴨綠江上』在這時期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

2. 正視農村（魯迅、王魯彥、許欽文、蹇先艾、彭家煌等）

3. 美與愛的追求（冰心、廬隱、孫俍工、葉紹鈞、王統照、許地山等）

4. 苦悶彷徨的自我寫照（郭沫若、郁達夫、馮沅君等）

三、本時期的戲劇

1. 對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暴行的揭露（洪深、鄭伯奇、郭沫若等。）

2. 反封建的婚姻自主的題材

3. 感傷的情調（田漢等）

四、本時期的雜文及散文小品

1. 戰鬥的匕首（以魯迅的雜文爲主）

2. 通訊與遊記（瞿秋白、郭沫若、鍾敬文、鄭振鐸等）

3. 優美的情趣——危險的道路（冰心、周作人、徐志摩、林語堂等）

在『新文學擴展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了。所以有的作家已經有意識地在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下進行文藝創作的戰鬥。但是大部分的作家爲了階級立場的局限，他們對馬克思列寧黨的理論表示懷疑與畏懼，他們企圖尋找其他輕便的改造中國的道路，所以苦悶彷徨成爲這一時期創作的特色。這一時期的新文學史是充分地證明凡是沒有受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作家，沒有作爲文藝統一戰線上的戰士，沒有進行自我改造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一一走向破滅的道路上去。凡是受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作爲文藝統一戰線的戰士的，努力進行自我改造的都滙集於左聯的旗幟下繼續他們光榮的勝利的戰鬥任務。

一九五一、七、福州大學

簡單的意見

李何林

一

我在發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時，寫在大綱前面的一段話裏曾經略述過這個大綱的草擬經過，『因爲大家都忙，我們只在一塊商討了兩次』，『而大家認爲第三、四、五編內有關作品各章的那樣分類和所例舉的那些作家，是否妥當，是否掛一漏萬？實成問題。』最後我說：『由於這個大綱是四個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匆忙的草成，粗濫是在所難免的；所以不但希望全國中國語文系的有關教師同志們提示意見，而且還盼望文學界的同志

們也能注意、研究、和批評，以便將來修改。所以我把它發表在這裏。」這個大綱可商量的地方實在太多，尤其是第三、四、五編各章內的那些小標題：分類的標準是不一致的，主要的是就題材來分，但也雜以主題（如『暴露與歌頌』『熱情的憧憬』『煩悶與憤怒』等），文學種類（如『歷史小說』『遊記』『散文小品』『雜文』『敘事長詩』『政治諷刺詩』『新歌劇』『新話劇』『報告文學』等），作家集團（如『中國詩歌會』『東北作家羣』『七月詩叢及其他』）等的標題方法，顯得不統一；但主要的缺點還在於：無論是就題材，主題，文學種類或作家集團來標題分類，思想性都不够明確；但要說這些分類的標題是完全的客觀主義，是也不盡然的。這只是一個『中國新文學史』的分編、章、節的『大綱』，它的思想性的比較細緻的具體的表現，是在講授者的實際講授：同是應用這個大綱講授的教師，講授的思想性是會很不相同的。當然大綱的思想性能表現得愈明確愈細緻愈好，但我們限于學力和時間，沒有能够做到這一點，所以把它發表出來，希望集思廣益，用全國文學界關心這一問題的同志們的力量，把這一工作做好，這是我發表它的原因。至于每個小標題下面括弧內所『例舉』的二三作家，確是當作『例』子而略『舉』的，不是『列舉』，同時下面還放上一個『等』字：因爲我們覺得在匆忙間寫出來的這些作家，勢必『掛一漏萬』，以至不妥。譬如在小說方面我們就遺漏了吳組緗先生；倘與我們所已舉的同時代的其他作家比，吳先生是應該舉出來的。其他作家被我們遺漏的一定還多。同時，我又想：是不是不必例舉這許多作家，在三十年的範圍內，只重點的選十幾個有代表性的，影響比較大的，來講一講呢？倘若可以，又是那十幾位作家？請大家發表意見。

二

俞元桂先生所提供的意見是很好的，是值得我們參考的。我的簡單的意見是這樣：

第一：第二編各章的標題爲什麼和其他各編不同，爲什麼不先論述文藝思想後論述創作呢？這由於：一、第四章的『與封建的和買辦的思想鬥爭』，不是新文學本身的理論建設，與新文學創作的關係比較少一些；與『甲寅』『現代評論』派的鬥爭，時間也比較晚一些，都在一九二五年以後，對于創作也很少影響。第五章的『革命文學的萌芽和生長』，這種理論雖然在當時也多少影響了創作，但這一章的目的是爲下面第三編的『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找它的思想的『萌芽』和『生長』的過程，所以放在第二編的末了，以便和第三編可以銜接得好一些。二、第二章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的殊途同歸』，也不單純只講創作，就那幾節標題看，也是先講理論，後講創作的。第三章的『魯迅和其有關的作家』，我們沒有把第五章第三節的『魯迅前期的文學主張』放在這裏來講，因爲想把魯迅當時的文學主張去和當時『革命文學』的理論比較一下；和魯迅有關的作家的創作態度，又是和文學研究會基本上相同的，他們也很少理論，所以這裏沒講。

但俞先生的意見，仍然值得我們討論。

第二：『第二編第二、三兩章沒有明顯地指出本時期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創作的面貌，在文藝創作各部門和個別作家創作生活的發展上，就不能給讀者以明確的承先啓後的線索。』這假使是缺點的話，則其他各編的論創作的各章也同樣如此；但這個工作是不是『大綱』的標題所能做到的？是不是當教師講授的時候或寫作成書的時候才可以做到？『第二編二、三兩章所提到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作家，魯迅和其有關的作家，那是偏重於小說方面，這是不够的。』單從標題看，是看不出偏重於小說方面的：『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等』裏面也有很多詩歌、散文和戲劇作者；魯迅也不單純是小說家，與其有關的作家中，也有寫詩歌和散文的。所以這也還是決定于教師的如何講授；標題的未能分類細舉各方面的作家，像第三、四、五各編一樣，可以算是第二編的缺點；所以我同意俞先生『第三』那一部分『嘗試給「新文學的擴展時期」的文藝創作部分』擬的小標題，雖然分類的標準也和其他各編同樣的不統一；思想性也同樣的不够明確；所例舉的作家或者也不够全面，掛一漏萬，甚至不妥：在這些方面我想俞先生也同樣的歡迎大家提意見。

第三：第二編假使照着俞先生的意見，在體制上修改成爲和第三、四、五編一樣，即先講思想或理論，後講創作的話；則第一章不動，第二章的大標題改成：『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文藝思想』，其第一節爲『文學研究會文藝思想的本質』，第二節爲『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本質』。原第四章改爲第三章，第五章改爲第四章，大小標題都不動。第五章是『本時期的詩歌』，第六章是『本時期的小說』，第七章是『本時期的戲劇』，第八章是『本時期的雜文及散文小品』，每節分類小標題都照俞先生所擬的：這一切也都希望大家發表意見。

蘇費多林科論述
中國新文學的成長

蘇聯文學報最近刊載費多林科的以『中國文學的青春力量』爲題的論文。該文指出中國人民的勝利給中國文學打開了廣闊的發展的道路，許多作家和詩人以巨大的創作熱情從事創作關於工人階級領導的作品，他們所歌頌的人物多是勞動英雄，生產模範和新中國優秀的人們。

西康彝族新文字
初步創造成功

爲貫澈人民政協共同綱領中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各民族訪問團與西康省西昌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彝族內識彝文者經過四個月的研究，完成了西康彝族拼晉文字的設計工作，這種新文字經過實驗，效果良好，得到彝族人民熱烈的擁護。新設計的文字是用拉丁文字母根據彝族語言拼寫而成。這種文字極便於學習、記憶和使用；尤其適宜於創造新字。這種文字的創造成功爲彝族人民文化的發展開闢了光明的道路。

譯文

形式邏輯的對象和辯證法

蘇·П·C·波波夫著
張秋華譯

一

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完成了蘇聯語言學中的改革，並且為語言學的創造性的發展開闢出新的前途，這篇論文也是和邏輯有直接關係的。

既然思惟和語言是密切地結合着，所以有些關於語言性質的基本判斷也可以應用到思惟的形式和規律上。那就是說，應用到邏輯上。同語言一樣，思惟的形式和規律是人類經驗億萬次重覆的結果，它並不隨着經濟基礎而改變。

斯大林同志寫道：『思惟交流是經常而且迫切需要的，因為沒有它，就不能協調人們和自然力鬥爭的共同行動。』（一）

因為語言有階級性這個斷定是錯誤的，所以說概念，判斷，推論這些思惟形式，以及在任何發展階段中都是基本思惟形式的同一律、矛盾律等有階級性也是錯誤的。思惟形式既不能有階級性，也不能有民族性，它是全人類的。全人類都採取同樣的思想形式，利用共同的思惟規律來思想和推論——否則人們不能互相瞭解。

主張邏輯形式有階級性的人不承認去研究思想的各種抽象的形式是可能的，即是說研究沒有具體性質的那種關係是不可能的。

然而，古典的俄國哲學家却很明瞭研究各種抽象形式的重要性。遠在一八七八年，謝欠諾夫Сеченов就曾寫道：『……在思惟裏，如同在一連串生活活動的過程裏，應當存在着那與內容無關的共同的一面。』（二）

如果思惟的形式隨着與其相關的具體物質而改變，那就不可能有任何邏輯，因為邏輯是關於思惟形式的一般的研究，是可以普遍應用的法則。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文法這種科學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是將辭、句中的一些特殊的、具體的東西加以抽象化，概括辭的變化和用辭造句的基本共同之點，並用這些共同之點組成文法的規則和定律。（三）

在這裏，文法的形式和規律是被除掉一切具體性後的那些關係，正因為如此，文法的規則才有普遍的力量。而邏輯的規則，也是有普遍性的。

然而，有許多同志甚至害怕『形式』邏輯這個名詞，並且把那些不害怕這個名辭的人叫作形式主義者。

對於這些人，完全可引用斯大林同志對馬爾及其門徒們所講的話，斯大林說：『馬爾認為文法是空洞的「形式」，並且認為那些以文法系統為語言基礎的人們是形式主義者。這完全是愚蠢。我想，「形式主義」這個名詞是「新學說」的作者們想出來的，為了便利他們與反對者的鬥爭。』（四）

說到從具體對象中抽出來的抽象形式時，必須要明確：應該注意的是甚麼。當然，科學的抽象方法決不是要脫離一般具體的世界，因為那樣就將成為形而上學的形式主義了。所以，要從無數各式各樣的具體事物中，去辨別它們的差異、不同和共同之點。邏輯所研究的思惟形式是與個別對象的內容的差異無關係的：由於客觀世界是一個統一的總體，它們反映出對象的內容的共同的一面。

確實如此，因為我們周圍的客觀世界是一個物質的統一的整體，所以每個對象的內容都有兩方面：一方面各對象互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彼此相似。各個物體互不相同，但不同的物體間的聯繫，和它們的類之間的聯繫，却可能完全一樣。自然界，現實，組成一個統一的體系。在完全不同的對象、事物及現象間存在着統一的關係。不同的對象形成同質的類，如行星的各種類，礦物各類，動物各類等等……。在各個不同的類的範圍裏，對象間可能有完全同樣的相互關係。各樣不同的對象形成不同的羣和子羣。例如，具有各樣特性的不同的對象間是有共同點的，這共同點就是各個對象所共有的特定屬性。如果沒有客觀世界的這些共同的相互關係和聯繫，我們就不會有、也就沒法研究任何思惟形式；各種思惟形式之可以同樣地應用在不同的對象上，就是因為它們反映着共同的聯繫。而反映事物間最普遍的關係的思惟形式，就是形式邏輯的對象。

斯大林同志說，上層建築不是被動的，不是中立的，並非對於它的基礎的命運漠不關心的。思惟的形式和規律，按其性質說，並不是上層建築，但它受一些別的階級的上層建築的影響。不同階級的思想家都企圖按自己的方法和看法來解釋思惟的規律和形式。

所以必須嚴格地區別邏輯與邏輯學；前者是思惟形式的總合，人類思惟的基本工具，是沒有階級性的，而後者是從不同的邏輯學家的理論觀點來解釋這些思惟形式。

這樣看來，雖然思惟形式沒有上層建築的性質，也沒有階級性，有些邏輯學家却一定要按他們的觀點將階級性引入他們對於邏輯意義及形式的說明中。

例如，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因為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驚嚇，禁止在大學裏教授哲學

，曾明說：『哲學的用途尚未經證明，可能有害。』邏輯與心理學的教學工作被移交到神學家手裏。這樣就產生了彼得保教士拉伊高夫斯基Раиковский的邏輯教科書，書名叫做『邏輯、從基督教觀點說明思想的結構、形式和規律。』

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認爲在資的爲階級目的而歪曲了邏輯的教科書裏，思惟形式和規律是被解釋爲中立的，無黨性的。

而近代的外國邏輯書也是如此。一九三八年，在紐約出版的一册『邏輯學』是爲愛爾蘭的從前的皇家大學，現在的國立大學學生們寫的，作者高菲Кофи公開地聲明說，他這本書實現了他的意圖——就是將與教皇訓諭相合的新湯馬斯主義Неотомизм的觀點引入了哲學作品中。作者還這樣談到他的基本原則，他說：『現代任何系統中的哲學教義，都並不比煩瑣哲學更符合於已經證實的科學眞理。』

當然，這本書充分地反映了帝國主義的階級本質。

那麼，形式邏輯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它是有階級性的學科還是沒有階級性的學科呢？至於形式邏輯的非階級性可用它與文法的相似點來說明，至於文法的階級性，則經斯大林同志指出，說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五）

因此，應該注意到列寧『哲學事記』中關於黑格爾『邏輯學』摘要的一部分，在這裏關於黑格爾對於邏輯與文法間的聯繫，它們的相似點，以及邏輯對於初學者是一回事，對於通曉語言者又是另一回事這種情形，列寧曾在書頁的空白上寫下這樣的批語：『微妙而深刻！』（六）

由此，就得到結論。邏輯是兩面的。對於初學者是一回事，而在哲學理解範圍內，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在前一種情形下，邏輯不是意識形態那樣的上層建築，在後一種情形下，它是深有黨性的，因爲在那個範圍裏它是哲學的科學。

實際上，要知道思惟形式與思惟規律的重要性，必須把它們認爲是認識論的一部分，反映論的一部分。只有在這種哲學的理解下，才能將唯心論者所作的歪曲附會的解釋從邏輯中清掃出去。

恩格斯說：『唯物論世界觀是指對於自然的眞實的理解，沒有任何附會。』（七）恩格斯的這種主張可以適用於任何科學；而如果用基於唯物論世界觀的科學來研究現實，則可使知識免於任何歪曲附會。對於邏輯說來，也是這樣的。從馬、列主義的立場來解釋邏輯，我們就可以判明：那些確定思惟規律性的規則和定義，思惟的技術規則，這種邏輯的工具，是初學邏輯者的對象，但它僅是一些規則而已。對於它，階級性的尺度是用不上的。它就像乘法表、幾何命題和文法規則一樣，是不屬於意識形態範圍以內的。

二

由此看來，爲要正確地解釋教科書中的那些基本規則和方法，必須將歪曲的解釋從形式邏輯中澄清出去，而這種歪曲是充滿了資產階級理論的。要使邏輯形式免於一切唯心的和形而上學的歪曲，只有靠辯證法的幫助。這是唯一的道路能保證其結果是無可非難的。因爲辯證法在基本上將形而上學驅逐掉了。在以前的形式邏輯裏，形而上學的看法控制了邏輯規律與形式的性質。由於資產階級理論家與學者的歪曲，邏輯已從一些健全的規則變成了顯著的有階級性的學科。對這些法則都必須加以研究，以剷除形而上學的歪曲。

圍繞着形式邏輯的對象，一直到現在，都進行着猛烈的爭論。

這就是因爲形式邏輯在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一直被形而上學的範疇及形而上學的觀點束縛着，當然，這樣的形式邏輯是應剷除的，它是被辯證邏輯所摒棄的。

恩格斯堅決地强調形而上學和邏輯的不可妥協性。恩格斯寫道：『絕對分明的界線與進化論是不相合的。脊椎動物與非脊椎動物間的界線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了……。辯證法不知……有絕對分明的界線，當然也不承認有那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非此——即彼』，辯證法可以把那靜止的、形而上學方面的差異互相溝通，而且除了『非此——即彼』之外，又很正確地看到了『亦此，亦彼』，它把矛盾調和在一起，它是唯一的適合於高級發展的思惟方法，它符合於今天自然科學的發展。當然，對於日常應用，對於科學的零售商業，形而上學的範疇還保持相當意義的。』（八）

我們必須將形而上學（康德的）所解釋的形式邏輯與邏輯那一門科學區別開來，邏輯這一門科學即是根據唯物辯證法、從形而上學者所加於邏輯規律的絕對意義中解放出來的邏輯學。如同有兩種對立的辯證法的存在：非科學的、唯心的（黑格爾的），以及科學的、唯物的，也就存在着兩種形式邏輯；和每門科學一樣，兩種邏輯都各有它一定的世界觀：即唯心的（絕對的、康德的）、反科學的邏輯——已被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所征服的階段——，和唯物的邏輯（在這裏，形式不是從絕對意義去瞭解的）。在所有的邏輯範疇裏，唯物主義觀點都應該佔有主要地位；在蘇聯學校裏，應該用唯物主義的看法來教授任何、甚至最專門的邏輯各部門，並且也應該用這種看法來組織學校裏關於邏輯的領導。

然而，我們仍然是說『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這意思是說我們把它們兩個分開了嗎？對於這一點必須加以討論。從學校的學科着想，邏輯可以並且也應該做爲一種專門的東西來教授。但這並不是說，作爲一門科學，形式邏輯就與辯證邏輯分開了。認識的過程永遠是一個。知識的內容是需要用辯證的方法來辯證地予以掌握的。在認識與推論過程中，一個人思想的形式正確性，是可能認清任何對象與現象的條件。恩格斯指出說：『所謂客觀的辯證法統治自然界，而所謂主觀的辯證法，即辯證的思惟，則僅是用對立的方法反映出支配全自然的運動。』（九）

主觀辯證法反映客觀世界裏的運動、自然的過程。爲了要正確地反映它們，它利用前後一貫地進行着的思想所具有的形式。沒有思惟的正確形式，就不可能有任何辯證的認識。而以下列寧所說的話，其意義也正在此，列寧說：『在經濟、政治的分析裏都不應該有「邏輯的矛盾」——當然，這是指在正確的邏輯思惟條件下。』（十）

所以，政治、經濟的分析都要利用邏輯上不相矛盾的思想方法。但這當然並不是說，

這種分析就止於此。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主要的東西是在於事情本身的本質的發展，而各種思想形式是有助於揭露這個本質的，所以，主要的任務是必須瞭解以及批判的修正這些思惟形式。

如果單獨應用形式邏輯，那是不夠的。它只是認識的第一階段。在數學的範圍裏，初等數學也處於同樣的地位。在它後面跟隨着高等數學，它利用初等數學而更前進一步。辯證邏輯也正因爲不能滿足於初等邏輯的形式，而跨過了它，或者如恩格斯所說的，它打破了形式邏輯窄小的範圍。這樣看來，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僅是認識的一架梯子上的兩個不同的階段。所以不應該講形式邏輯是與辯證邏輯相反的，或說辯證邏輯完全否認了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也是不對的。

那麼，直接揭露了自然的辯證發展、事物間之聯繫的辯證法的思惟形式，其特點何在呢？

辯證法的思惟形式，是發展中的思想的形式（它們表徵對立的同一是怎樣發生的），而不是在某些結果裏，固定凝固的思想形式。我們所賦有的各種辯證的思想形式是運動着的、改變着的、從一個概念轉變到另一概念的，在概念的運動中的。

辯證法跟隨着思想的發展，跟隨着從一個思想到另一思想的轉變，這就是說，它研究在發展中的思想形式，而不是思想的固定形式。發展是純粹的辯證法的範疇，這範疇是形式邏輯裏所沒有的——如果認爲可以由此獲得新結論的思想的單純一貫性不是一個發展。這種思想的一貫性是形式邏輯的範圍。

形式邏輯使用在推論過程中不變的前提。形式邏輯不能使用那些當我們下判斷、下結論時會改變意義的那些辭。對於形式邏輯，在思惟過程裏，那些辭必須是常量。所以，在形式邏輯裏，思想形式是被當作爲固定的與已經形成了的形式，而辯證法的思惟形式是發展的思惟形式。邏輯的格固定了自古以來活動着的人類實踐與思惟的穩固的結果。列寧寫道：『……人的實踐活動應億萬次地把人的意識牽引到重覆各種邏輯的格，以便使這些格能獲得公理的意義。』（十一）

馬列主義的古典學者在他們許多言論中，將邏輯當做是唯一的。所以不能將它瞭解爲只是辯證的，或只是形式的。

比如說，我們拿列寧以下的話作例。列寧說：『邏輯是關於認識的學問。是認識論。認識是人對自然的反映。但這不是單純的，不是直接的，不是總體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定式化、概念和規律等的過程。這種概念，規律等（思惟、科學——『邏輯的理念』）是有條件的，接近地把握了永遠運動着的、發展着的自然的規律性。這裏，確實在客觀上是有三項：一、自然；二、人的認識——人的理解力（作爲同一自然的高等產物）；三、自然在人的認識中的反映形式，這形式就是概念，規律、範疇等。人類不能把握＝反映＝描出整個的全部自然，它的「直接的總體性」。它只能永遠接近於自然，創造抽象，概念、規律，科學的世界的圖畫等、』（十二）

列寧所講的是那種思惟形式呢？關於辯證邏輯的、還是形式邏輯的呢！

列寧在這裏談到各種邏輯形式。形式邏輯的一些規律是唯一的認識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實際上，列寧所說的抽象化與概念，這些都是形式邏輯所研究的思惟形式和工具。但是列寧所說的第三項，關於自然在認識中的反映，當然不能解釋爲只是形式邏輯的規律。形式邏輯的規律僅是認識過程的一面，而在本質上，這認識過程是辯證的。

三

在形式邏輯裏，我們研究那些最單純的思惟形式，它們對於一般的科學知識和認識是必要的呢？它們對於科學知識和認識的內容的辯證關係的掌握是不夠的，但對於要加深這內容的分析卻是不可缺少的。

有些同志仍抱有這種觀點：思惟的一些基本規律是不能普遍使用的，它們在按辯證邏輯的規律而進行的辯證思惟裏，就會失去效力。爲要揭露這種看法的缺點，我們談一下矛盾律，看它在初等邏輯裏是怎樣被講解的。大家都知道，矛盾律就是要求矛盾的不存在。如果思惟不遵守矛盾律，思惟就會混亂。如同我們承認A是B，就不能同時又肯定A不是B。

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講：不可能也不應該有矛盾，並且事物是不變的。而辯證唯物論說，物質是運動着，改變着的。在這種情形下，思惟不相矛盾的原則還適用嗎？當然適用，因爲思惟在最初就應該會辨別眞與假，那就是說，甚於這個出發點：如果有一個判斷是眞的，那麼與它相矛盾的那個判斷無論如何不能是眞的，那就是說，是假的。思惟不相矛盾這個規律，和同一律一樣，不但是能認識靜止的事物的保證，（十三）而且要瞭解永遠改變着的，矛盾的『存在』，它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現在我們有兩種互相排斥的觀點：一種肯定一切都是流動着、永遠變化着的，另外一種剛剛相反，認爲世界並不是流動着的、也不是變化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一切存在的事物的變化性。但是，如果『一切都是流動着的』這個命題是眞的，那麼相反的就不眞，那就是說，如果我們認識存在的流動性是眞的，就不能同時又認識『存在是不流動的，不變化的』這個命題也是眞的。所以比如說，我們即持眞正的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而又承認巴門尼達的命題的正確性——即一切都是不變的，那我們就不會是辯證主義者。承認『一切都是流動着的』這個命題是眞的，就使我們必須承認『一切都是不變的』這個命題是假的。換句話說，就禁止我們承認自然的不變性是眞的。這種禁止就是形式邏輯矛盾律的表現。由此，形式邏輯的命題在辯證法裏是通用的，而且是必要的。

如同馬克思所說的，思惟完全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十四），而人人都必須採取思惟的正確形式。所以，我們不可以說，辯證法不用形式邏輯的規律。

我們只談到矛盾律，但是能不能把另一條規律（實際上已被一些思想家誇大成形而上學的絕對）——同一律置之不理呢？我另說辯證法必須考慮它呢？

我們決不能將同一律理解爲：任何概念都必須毫不改變地、永遠保持其原有的內容。而傳統形式A＝A之所以沒有道理也就在此。內容可以改變，可以變得複雜，在所研究的對象裏可以發現一些完全新的方面。但是當某種東西演化發展時，我們應該注意這改變是發生在某種現象範圍之內的。

假設我在現象A裏先看到特徵a，然後b，然後c，後來又發現在現象A裏顯出從未見過的特徵X，現在就研究這特徵X。這時，如果我突然宣佈，我所研究的根本不是現象A，而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現象，現象B，那麼這思想的整個的辯證的進程就要攪亂了。在這種情形下，我既不能確定其變化性，也不能確定契機的連續變化，也不能揭露新的特徵。要瞭解其變化，只有把變化來同與它有關的某種東西聯繫在一起。

存在的基本特徵就是它的永久的流動性，變化性，和不穩定性。關於客觀存在的變化性，恩格斯說：『生命主要的是一種實質，它時時刻刻都現出是同樣的，而又是異樣的。』恩格斯在這句話裏表現出他新的，深刻的辯證的思惟，揭露了存在的最基本的聯繫，但同一律（當然不是按形而上學的瞭解）在這種場合下，仍是完全適用的。恩格斯指出說：任何實質都時時在改變着，但要瞭解恩格斯的話，只可在這種情形下：就是在實質的任何具體情況裏，仍能認出那個實質。如果我們假設實質A失去了一種特徵，實質B得到了一種新的特徵，這就是歪曲了恩格斯的話，因爲恩格斯說，任何一種實質，在某一時刻都只是它自己，並不是別的東西，而在同時，這個實質又現出像另外一種東西。在這種意義下，同一律在確定任何辯證的變化性時，是永遠保持其說服力的。

反對上面所說的，可以引起以下的反駁，我們的思想是反映外界現實的現象和對象的。站在這種唯物主義的立場，我們知道，自然是對立的力量與傾向間的一個鬥爭。我們周圍世界是矛盾的鬥爭，而就在思惟中我們也觀察到這種鬥爭。恩格斯說，辯證法本身『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及思惟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十五）所以，爲要眞實地反映周圍的現實，思惟裏也應該包含着矛盾。那麼，爲甚麼又要有思惟的不相矛盾性呢？它是不是需要改變或根本的改革呢？

我們看看思惟的定義是甚麼。

思惟的規律反映現實。思惟的規律也就是自然，物質存在的規律，但它是被意識着的。恩格斯曾寫道：『辯證法是外界運動普遍規律的科學，也是人類思惟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這兩組規律，本質上是一樣的，但按它們的表現來看，兩者是不同的，因爲人類的頭腦可以有意識地運用它們，而在自然裏，它們是無意識地前進着的。』（十六）反映在人頭腦中的，並且確定了思惟及其過程的自然的規律，提出將反映與被反映對象加以比較的必要性。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惟是第二性的。思惟是一種新的品質，隨着智力器官的發展，在有機性的自然裏出現的。雖然是一種新的品質，思惟是有它自己的規律的，如果沒有這些規律，它就不成爲思惟了。如果我們將對於周圍現實的認識的反映比成鏡子對於對象的反映，那麼有這種反映的鏡子，應有必要的特性。它應該是磨琢光滑的，以便能正確地反映它面前的對象，並將它們聯繫起來。鏡子不應該放大或縮小對象，所以它不應該是凹的或凸的。同樣地，爲着要正確地反映現實，我們的智力活動也應該具有一些必要的性質。應該正確地運用智力，那就是說，如果沒有客觀的原因時，不應該將對象放大或縮小。它應該正確地反映出對象的關係。我們周圍的外界現實是形形色色的，它充滿了矛盾與複雜的聯繫等。但爲要正確地認識這些聯繫，爲要正確地反映一切形形色色充滿矛盾的現象，必須對於這些客觀的矛盾有澈底充分的認識。如果我們用來認識的這面鏡子是不乾淨的，就會引起矛盾的，那麼它就不能清楚地，不相矛盾地反映出現實之客觀的、矛盾的特性。那麼，圖象將是一片混亂，不可能從裏面認出被認識的對象的性質，正如同在曲面鏡中，我們不能確定，那改變了大小的反映是客觀存在的對象與現象的複製，還是由於鏡子的曲面所引起的歪曲。爲了要有正確的反映，鏡子不應該是曲面的，同樣地，要有客觀的正確的認識，思惟也應該有步驟地，不相矛盾地進行着。

思惟間的互相協調不只是概念間的互相協調，思惟間的協調就是反映着外界現實的概念間的協調。爲了思惟能够一貫地進行，它應該在各環節裏與客觀現實完全協調，完全符合地反映出周圍的客觀現象。

恩格斯說：『我們的主觀思惟與客觀現實完全服從於一些同樣的規律，所以，它們在結果裏不能互相矛盾，而應該互相協調——這個事實有絕對的力量來支配我們一切理論的思惟。』列寧又這樣闡明了恩格斯的思想：『理智（理性），思想和意識脫離了自然，和它不一致，就是虛假的。』（十八）這樣看來，邏輯不相矛盾的規律是完全與列寧的反映理論相符合的。

所以，在思惟裏應該有兩面：發展的一面，它包括辯證法的契機，突變和矛盾；和思惟不相矛盾的一面，因爲，當反映辯證的過程時，思惟應該一直與外界客觀自然相符合，應該正確地反映它，那就是說，不相矛盾地反映它。在這種場合下，談到矛盾是荒謬的，因爲由此我們就可以廢除反映論。人類思惟應該反映自然，而不是與它鬥爭，那就是說，並不和它相矛盾。

但是，這裏存在着另外一種矛盾——就是客觀現實本身的矛盾。這是活的矛盾，而應該被正確反映出來的。

而甚麼叫做正確的呢？按『正確』這兩個字的字面上的意義，就是不相矛盾。恩格斯寫道：『如果我們的前提是眞的，如果我們對它們應用了正確的思惟規律，那麼，結果是應該符合現實的……。』（十九）

正確的思惟，是不能有矛盾的，列寧將這種矛盾叫做不正確的推論的矛盾。所以必須好好掌握思惟，以便能看出生活中的矛盾。

在聯共中央委員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斯大林同志說：『我們爭取國家的衰

亡：我們同時又擁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到現在爲止的一切國家政權中最有力量最強大的政權。國家政權最高的發展，其目的便是準備國家政權衰亡的各種條件——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矛盾的」嗎？是的，是「矛盾的」。但這矛盾是活生生的矛盾，它整個的反映着馬克思的辯證法。』（廿）

並且，斯大林同志還舉例說：『列寧有時用簡單的公式來寫關於民族自決的論文：「爲團結而分離」。你僅僅想——爲團結而分離，這簡直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話。但是這個「矛盾的」公式正反映出馬克思的辯證法的活生生的眞理，它使布爾什維克能在民族問題範圍內佔有最堅固不破的堡壘。』（廿一）

如果同時承認列寧所說的爲團結而分離是可能的，而又是不可能的，那是荒謬的。必須要區別活生生的、合乎規律的矛盾和不正確的推論中的矛盾。關於這種思想，我們可以在斯大林同志在聯共第十八屆代表會議裏所作的報告的結束語中找到（『一些理論問題』）。

所以，思惟的不矛盾性，思惟這認識工具的不矛盾性，是認識客觀矛盾的基本條件。

我再說一遍，我的基本思想：關於可能有些命題，從形式邏輯觀點看是眞，而從辯證法觀點看是假，或有相反情形的這種無謂的爭論，現在正是放棄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只取那些從形式邏輯看是眞，而且從辯證法看也是眞的命題。馬克思列寧主義古典學者的言論和推論可以作爲例子。

關於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在原則上不能妥協的這個錯誤的思想，按本質來看，是從黑格爾出發的。它被孟什維克的思想家抓住利用了。

很不幸地，在今天，當學校裏都教授形式邏輯的時候，我們還遇到那僞裝的虛無主義的觀點。有些同志，在本質上，仍持有三十年代時所有的那種看法，承認對於初學者，只有教授形而上學的形式邏輯才能被接受。

形式邏輯用不着任何改變，它的規律對於人類思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不應該希望作爲求得眞當知識的方法。這個思惟可以形成以下的公式：形式邏輯永遠但也從不決定我們的思想；永遠——當它是思惟方法的綜合，從不——當它是作爲研究的自足的認識的方法。一切都決定於在甚麼意義下來解釋它。

形式邏輯研究最普遍的思惟規律，最普遍的前後一貫的思惟規則，以及知識的原則。思惟形式正確性的規律及原則是不變地應用着，但是在什麼時候，怎樣去應用它，並不是形式邏輯本身可以決定的，而是被與人類實踐相連結的知識內容的發展所決定的。辯證邏輯打破了形式邏輯的窄小範圍而更前進了一步，因爲辯證法決定應用形式邏輯規律的條件。辯證邏輯是思惟發展進程的領導者。

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如同一律、矛盾律等，在有些情況中，是特別重要的。我們已經說過，沒有它們是不行的，但不能機械地運用它們：運用它們的條件不在它們自身，而在於從辯證觀點來處理那些認識的對象，認識的對象具體決定了規律的運用是否可能與適當。這些具體條件的發現卻又藉助於一般形式邏輯的思惟規律，但是思惟規律的運用是隨着知識的發展而發展的；它們本身不能決定這種發展，而僅爲動的思惟進程開闢必要的道路。

總結起來，思惟規律的運用是有限制的，它必須從眞理的具體性這一辯證原理的觀點，去處理知識的對象。應用思惟規則或規律的一些具體條件是被辯證法所決定的；形式邏輯決定共同的抽象的規則，它是認識過程中正確的、前後一貫的思惟過程的共同條件，但只此而已。在這種意義下，形式的思惟規律是抽象的，而辯證的思惟過程是具體的——它與所研究的現象的內容的發展直接聯繫着，這些現象是在人類實踐活動中所認識的。

抽象的，形式邏輯的思惟契機和具體的辯證知識並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依靠的，如同進展着的言語總要依靠利用個別的辭和句：因爲沒有赤裸裸的思想，也就不能有脫離同一律矛盾律等而發展着的思想；但是這些規律只要一旦認爲自己是恆久不變的、自足的，那麼，它們就會立刻減低效力，凝固起來，並且開始隱蔽，歪曲了現實的眞正的世界。列寧觀察到唯心論的認識論的根本也有這種類似的直線性，一面性和生硬性。

用形式邏輯來獲得眞正的科學知識是不够的。

如果我們認爲在最簡單的關係裏辯證法是不需要的，並且認爲在這些最簡單的關係裏我們可以僅靠形式邏輯來獲得瞭解，那麼就是貶低了辯證法。實際上，在任何應用辯證法的地方，都不要和辯證法本身發生矛盾，不要反對它，那就是說，正確地應用邏輯在高級思惟裏是不可缺少的，而在低級思惟裏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低級思惟裏，如同在高級思惟裏一樣，辯證法是最有効的。我們記得列寧的話：『從最簡單，最平凡，最通常的開始：……這裏已經有辯證法：特殊之中有普遍。』（廿二）這樣看來，在最簡單的關係裏，如想揭露它們的本質，只靠形式邏輯是不行的。

形式邏輯的規律是辯證而有具體內容的思想的一面，那些思想反映事物的眞實存在。馬、恩、列、斯的任何言論都是研究對象的具體內容的分析的最好範本，也是分析形式的最好範本。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古典學者的任何定義中我們可以找到：內容的辯證完整性（該內容具有與它相應的辯證形式），以及陳述這定義的模範邏輯形式。形式邏輯的思惟是思惟的辯證形式的契機。如果我們拿思惟的聯繫和發展，思惟形式的聯繫和發展作例，那麼這發展，這些過程都是完全辯證的。所有這些，當然在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古典學者的言論時，都要注意的。在它們的邏輯分析裏，用不着害怕形式邏輯與辯證法混合在一起——這將會引出假的結論：即在有些形式邏輯思惟範本裏沒有知識內容的具體分析；這是淺薄的形而上學家的玩意兒，而不是有具體內容的思惟形式的分析。

在這種瞭解下，形式邏輯和辯證法之間是沒有矛盾的，沒有鴻溝的。只有在形而上學和辯證法之間才有鴻溝。按形而上學來解釋形式邏輯，我們是反對的。在蘇聯的邏輯裏應該把思惟形式看成與周圍外界認識的內容相符合的。形式邏輯並不是形式主義的邏輯。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應該講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劃分界線，而是它們的統一。

（原文載一九五一年第一期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下轉67頁）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下）

（原載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一年第二號）

楊興順著
李何譯

毛澤東論中國無產階級時，指出三個特點。第一，中國無產階級曾處在三層壓迫之下——帝國主義奴役者、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第二，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上了政治舞台，因此站在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封建的反動勢力的英勇鬥爭的前列。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當中同農民結成了鞏固的聯盟。

基於對中國每個階級特點的具體分析，毛澤東作出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中工人階級的同盟軍的結論如下：『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鞏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所以證明了的根本規律之一。』（同書，頁二二七）。

毛澤東關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學說，是創造地運用辯證唯物論到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具體歷史條件去的經典模範。

毛澤東是以斯大林如下天才的指示為這學說的基礎的：為了擊破強大的敵人們，『除了其他一切種種之外，還需要無產階級靈活的和深思熟慮的政策，善於利用敵人陣營中每一裂縫，善於給自已找到同盟者，甚至於這些同盟者是動搖的、不堅定的同盟者，只要在這樣的條件下，就是這同盟者是人數衆多的同盟者，他們不限制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宣傳與鼓動，不限制這政黨做組織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的工作。』（斯大林全集卷九，頁三三九）。

列寧和斯大林的忠實學生毛澤東，對於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第一個、主要的要求，是保持共產黨的組織獨立性和政治獨立性。他教導說，對於這要求的最小退讓，實質上都是出賣民族解放運動。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度指出了：『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上面的統一戰線，

的暴動了，這就就變成無原則一戰線，沒有任何的統定綱領的實行就離開一是投降主義的傾向。』（毛澤東選集，哈爾濱版，頁四一七）。

只有為實現民族統一戰線綱領所作的原則鬥爭，才能給中國人民帶來勝利。只有由於中國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的堅強鬥爭，由於中國共產黨在團結全民力量的事業上的正確政策，才有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起了巨大作用。

論到創造哪些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必要條件的辦法時，毛澤東寫道：『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鬥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同書，頁四七六）。

毛澤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中策略的內容和具體形式。發展進步勢力，就是到處組織和開展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婦女的羣衆運動，爭取實現有利於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的民主權利和自由，爭取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人民解放軍（原文如此），爭取廣泛地創立敵後民主根據地。

中國共產黨向自己提出了吸收一切中間分子到統一戰線來的任務，他們包括中產階級、開明士紳和地方實力派。

毛澤東指出成功地爭取中間勢力到民主方面來所依賴的三個必要條件：共產黨和整個民主陣營有充足的力量；尊重這些中間勢力的利益；對頑固勢力作堅決的鬥爭。

為鞏固和發展進步勢力，為反對民族統一戰線中頑固派的反動政策，為最

大限度地爭取中間勢力到民主方面來，這一鬥爭中矛盾之辯證地解決——這個毛澤東的馬列主義策略，是戰鬥的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體現，收到了巨大的好成績。

毛澤東創造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到中國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去，局部說來，運用它到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中去，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全體中國人民達到了最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成功，就是做到了現在在全國完全地殲滅國內外反動勢力並且建立起自由、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列寧斯大林關於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和內容』（斯大林全集卷九，頁二八六）的原理出發，毛澤東指明了土地問題是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之基礎。

還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反革命政變的前夜，毛澤東寫道：『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毛澤東選集，哈爾濱版，頁一九——二〇）。

在土地問題上面，毛澤東找到了了解某一階級的政策和它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的鑰匙。毛澤東教導說：政黨的民主主義不是由宣言來決定，而是由它對中國土地改革的態度來決定；中國政黨的命運也是取決於它對農民的態度。

一九四五年四月，論到在實行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反人民的國民黨匪幫進行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時，毛澤東指出了：『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同書，頁三三二）。

中國人民民主的土地革命，是在特殊條件下完成着。因爲中國曾經是遭受帝國主義沉重壓迫的半殖民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經歷了爲建立革命陣營和中國資產階級之間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複雜道路。由於同樣的情況，中國人民的武裝鬥爭，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具有特別意義。

因此，毛澤東從分析不同階級的特點、這些階級之間的關係和矛盾，發現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在土地問題上的實質，而由此出發，他在每一歷史階段上提出了具體任務並找到了解決這些任務的方法與方式。

三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實踐論』裏特別着重列寧關於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運動的原理。毛澤東看到認識的全部意義在於，在具體現象的研究過程中作出的科學理論，應當作爲行動的指南，應當有目的地指導革命地改造世界的實際活動。毛澤東寫道：『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他在中國革命的每個歷史階段，在最複雜的環境中，總是正確地和準確地從發生事件的鍊子中找到基本環節，揭露事件的基本矛盾和互相聯繫，揭露事件的實質，並且在這基礎上指出事件此後發展的明確前途，指示使新的戰勝舊的的具體辦法。

毛澤東根據革命實踐的豐富材料作出的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戰略戰術，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領導中國人民鬥爭的顯著範例。

從斯大林關於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特點與優點（見斯大林全集卷八，頁三六三）的指示出發，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六中全會上的演說中說過，現代中國民主與反動之間鬥爭的主要形式是戰爭，而兩個陣營鬥爭力量的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一切其他鬥爭形式都是服從於這主要鬥爭形式。毛澤東屢次提醒過，中國共產黨的全部歷史實質上是準備和進行由共產黨員領導的中國人民戰爭的歷史：『我們懂得，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毛澤東選集，哈爾濱版，頁二〇一）。

有過一個時候，共產黨的力量總共只有幾千游擊隊員，而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軍隊有幾百萬。許多人懷疑過人民武裝鬥爭勝利的可能性。國民黨反動派許願（多少次呵！）在最短期間消滅共產黨的游擊隊，而他們的走狗『軍事理論家』吹噓說，由美、德、日及其他國家的顧問專家指導的蔣介石軍隊是不可戰勝的。正是這個危急時期，毛澤東粉碎了反革命者關於國民黨軍隊是不可戰勝的神話。

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澤東指出了在全國黑暗反動統治的環境下不大的蘇區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

一個半月之後，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又談到同一問題，指出了小塊解放地區產生和存在的可能性，其原因由於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當中經常發生分裂和戰爭。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過的，在這樣環境下，小塊的革命根據地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之下，不但可能存在，而且可能擴大。

一九三六年秋季，毛澤東總結了中國紅軍的多年戰鬥經驗，發展了關於在國內帝國主義的和地主買辦的反動勢力統治條件下，中國人民武裝鬥爭勝利的可能性的學說。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著作中指出中國革命戰爭的兩個方面，它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內部條件。

如下是有利的條件：中國領土廣大，使得數量少的中國紅軍可能對強大敵人進行機動的游擊戰；國家自然資源豐富而經濟落後，特別是城鄉經濟聯繫薄弱，允許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獨立地存在與創造自已的物質基礎；中國軍閥各幫之間，帝國主義者各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在一定程度上便於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存在和發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爲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在中國南方省份的組織與發展，創立了必要的條件，在這些省份曾經走過了國民革命軍並且開始了大規模工農運動的高漲時期；最主要的條件——這是政治上受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及其正確的領導的存在，它保證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成就。最後，對於中國數量少的紅軍戰勝內外反動勢力的強大的聯合武裝力量，有決定意義的，是中國紅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實行了土地革命的任務。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着重指出，正是土地革命使得中國紅軍有可能勝利。農民擁護紅軍，造成了國民黨軍事圍攻的巨大困難。毛澤東說過；『由於這個特點，……就使得紅軍雖小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爲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產生爲着自已的利益而戰鬥的，而且指揮員與戰鬥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則與國民黨成了相反的對比。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却不能使士兵羣衆及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幹部自覺地爲國民黨拚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減少了它的戰鬥力。』（同書，頁六〇二——六〇三）。

因此，毛澤東非常明確地證明了，中國紅軍在敵人力量佔不可比擬的優勢時候勝利的可能性。

中國革命戰爭的不利條件，毛澤東指出了，這是敵人在數量和技術上的優勢，和紅軍在數量和武器上的弱小，因而不允許它迅速擴增自己力量和在最短期間擊破敵人。由此發生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長期性質。

勝利的可能性和長期性質——毛澤東說，『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着，那是說在順利的條件下又有它的困難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同書，頁六〇三）。

爲了變可能性爲現實，爲了克服走向勝利途中的一切困難和障礙，毛澤東根據他所發現的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作出了中國紅軍的戰略和戰術。他所作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歸結如下：『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要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却又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與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消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與流寇主義，承認紅軍是蘇維埃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國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與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立主義，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同書，頁六〇三——六〇四）。

毛澤東的戰略計劃和戰術規定，得出了輝煌的成果。蔣介石對革命根據地的六次圍攻（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五年）全部被中國紅軍勝利地打破了，而紅軍的主力，完成了歷史上空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從南開到北，開到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前綫。（註）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之後，毛澤東根據他所作的中國紅軍的戰略戰術，創立了戰勝日本侵略者的軍事理論。他打破了日本代理人和蔣介石反動派所傳播的關於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失敗論。毛澤東指出了使中國軍隊取得對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軍勝利的四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中國有廣大土地和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第二個因素——中國經濟不統一及其不平衡的發展，便於進行抗日戰爭。第三個因素——在中國作戰的日本軍隊，處在敵對的包圍中。最後，最主要的，第四個因素——反

（註）這裏所指的『六次圍攻』實際上應該是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五次圍攻。這裏也沒有提到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攻中，由於當時『左』傾機會主義者佔據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違反了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思想，因而使紅軍沒有能擊破這次圍攻的事實。請讀毛澤東同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編者

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是全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他們依靠以偉大蘇聯爲首的整個先進人類的支持。這個情況使中國軍隊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從防禦轉到進攻。

失敗論者和投降論者硬說，既然中國沒有跟日本一樣的武裝力量和物質資源，那麼它就不能取得對日勝利。在揭發這些明暗日本代理人的罪惡作用時，毛澤東指明了他們關於不可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議論的錯誤方法論。他指出了，類似的議論是所謂『唯武器論』——反映着對戰爭問題的機械論、觀念論和片面的態度。在揭發軍事科學問題中的機械論時，和這虛僞的有害的觀點相反，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戰爭的原理：『我們與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與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與人心的對比。武力與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同書，頁七〇三）。

同時，毛澤東也揭發了那些對日本帝國主義認爲可能速勝的冒險主義論者。毛澤東指出了他們看不見現實的力量對比，『他們又沒有勇氣承認自己長處之有限度性，而夾雜以吹牛精神和客氣，因而抹殺了眞理的又一方面。』（同書，頁六九四）。

毛澤東以列寧斯大林關於正義的與非正義的戰爭的原理，作爲他關於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學說的基礎。還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他寫道：『日本的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是强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與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的時代，其戰爭是進步與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是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與人民是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點。』毛澤東結語說：『這些特點，規定了與規定着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與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與規定着戰爭的持久性與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同書，頁六八七）。

根據對中日的內外政治因素的全面評價，根據交戰雙方力量對比的正確估計，毛澤東規定了中日戰爭的三個可能階段，並且擬定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具體戰略計劃。第一個階段——敵人的戰略進攻和中國軍隊的戰略防禦。第二個階段——敵人的戰略防禦和中國軍隊的準備反攻。第三個階段——中國軍隊的戰略反攻，和敵人的戰略退却。

第一個階段主要戰略是運動戰，而游擊戰和陣地戰是它的輔助形式。第二個階段游擊戰成爲主要鬥爭形式，而運動戰退爲次要的。毛澤東着重指出，這一時期對於整個戰爭結局有決定意義。第三個階段——這是解放淪陷區的反攻時期，這時正規軍的運動戰成爲決定的戰略的形式，而陣地戰獲得頗爲重要的意義。游擊戰在這階段作爲鬥爭的輔助形式而退爲次要的。

上述戰略計劃是實現毛澤東關於中國人民可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學說的具體道路。爲了變這可能性爲現實，曾經須得創立必要條件。爲此，首先要求民族統一戰線的進一步鞏固，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爲了準備中國軍隊的戰略反攻而動員人力物力的大規模愛國運動的廣泛展開。中國共產黨員盡了一切努力來創立這些條件。爲了團結全民抗日力量，他們在戰爭時期用減低地租的要求代替了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在解放區建立這樣確定的制度，在所有人民民主政權機構中，共產黨員在數量上不超過三分之一。新四軍八路軍廣泛地展開了敵後游擊戰和運動戰。到一九四三年前他們曾經吸引了全部侵華的日軍百分之六十四和僞軍百分之九十五在解放區周圍。

蔣介石叛國匪幫實行了另一條路綫。它想進行戰爭，同時繼續反人民政策，不使國家民主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像它的華爾街主子一樣，無恥地破壞了它所簽訂的協定，並且施行了壓制羣衆運動、掠奪人民財產、殺害共產黨員的政策，從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特別是這樣。此外，蔣介石匪幫派了數達八十萬人的龐大精銳軍隊去封鎖陝甘寧邊區和日軍後方的解放區。因此蔣介石賣國匪幫事實上幫助了日本侵略者和力圖破壞民族統一戰線。

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叛國政策，共產黨的戰略計劃沒有及時實現，中國人民抗日解放戰爭在第二個階段——開展游擊戰的階段上拖延得很久。僅僅由於偉大蘇聯的援助和蘇軍進軍東北，日本在華軍隊才被殲滅了，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束縛下解放出來了。

論到武裝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結局時，毛澤東對於在戰爭最後階段上以新式裝備武裝的中國人民的解放軍隊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到這時，他說，『軍隊將獲得高度的集中性與組織性，作戰將獲得高度的正規性，大大減少其游擊性，低級將變爲高級的，中國型的將變到世界型的，這將是戰略反攻階段中的事業。』（同書，頁一九〇）。

毛澤東的這一部分戰略計劃，在抗日戰爭中沒有得以實現，可是它在爭取徹底地消滅國民黨軍隊和把中國從美國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大規模作戰

中成功地實現了。

末了，恰好再引毛澤東的一段明確的話：中國共產黨在其英勇鬥爭中『不但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强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而且鍛鍊出來了一條堅强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我們不但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政治問題，而且會使用馬克思主義去解決戰爭問題。不但造就了一大批會治黨會治國的有力骨幹，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會治軍的有力骨幹。這是無數先烈的熱血澆灌出來的革命之鮮花，不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光榮，而且是世界共產黨與世界人民的光榮。』（同書，頁一八九）。

毛澤東所教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但是本國人民的拯救者，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最重要因素而已，也是東亞和平和民主的可靠堡壘，由偉大的蘇聯領導的世界民主陣營的可靠支柱。

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豐富經驗，現在被其他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奴役者的武裝鬥爭的東方殖民地人民有成就地使用着。它被運用到緬甸、馬來亞及其他太平洋區域國家廣泛展開的游擊戰爭中去。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經驗，被越南人民運用着，他們已從法國帝國主義者手裏解放了本國百分之九十的領土；這經驗也被朝鮮人民軍運用着，他們同中國志願軍一起，給美國侵略者及其傭僕一個又一個的致命打擊。

四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實踐論』中寫道：『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與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與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與發展。』在認識過程中，人應當預見到事件發展的進程，並且尋找鑰匙去解決在革命地改造世界中的實際問題。科學的認識，使人擺脫任何偶然性和意外，而使他可能有信心地前進。局部說來，在作出關於中國新的、人民民主的學說時，毛澤東提出了這種科學認識的任務。

還在一九三九年，就是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十年前，毛澤東就在他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敘述了關於中國人民民主的基本原理。論到中國人民民主革命時，毛澤東特別着重指出，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份，是堅決地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同時，在書中指出，既然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勢力，所以中國資產階級也參加這革命。毛澤東指出，即使在大資產階級叛變之後，中國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着帝國主義與封建獨佔。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毛澤東選集，哈爾濱版，頁二二八）。在如下的意味上中國革命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它的領導作用已不屬於資產階級而屬於無產階級，這是它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前提。只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保證這革命的勝利，而這是在以蘇聯爲首的全世界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之下的。

在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問題時，毛澤東完全是從列寧斯大林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學說出發的，同時估計到一種新的情況，就是這種過渡將發生在世界社會主義堡壘——蘇聯存在的條件之下。

還在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同志寫過：『我想，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一般說來，按它自己的性質，將類似我們在一九〇五年所談論的那種政權，就是說，像某種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却有這樣的差別，即這將是特別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將是中國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的政權。』（斯大林全集卷八，頁三六五——三六六）。

由斯大林的指示出發，毛澤東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看作國家從半封建地位到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告是爲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準備必要條件的第一步。人民國家爲完成自己歷史任務的鬥爭愈順利，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就會愈快開始。

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廿八週年的論文中，毛澤東給了中國新民主主義深刻的定義。他寫道，中國人民爲它而鬥爭的新政權，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頁十九）。

它就是對人民的民主和對反動派、對帝國主義走狗的專政。毛澤東着重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爲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同書，頁十七）。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北京召開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歷史中開闢了新的紀元。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組成。在會議的宣言中說：施行人民民主專政的人民政府，將指揮人民解放軍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完全勝利，到解放全國領土和統一全中國爲止，它將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窮和愚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保衛人民利

益，無情地鎮壓反革命分子——叛國分子的破壞活動；它將盡力鞏固國防，保衛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將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首先是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一起爲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新戰爭挑撥者而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給自己提出了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强的新中國的任務。

解決這個歷史任務的關鍵，是國家工業化，把中國從農業國變爲工業國。而在歷史現階段上，發展生產力和工業化的基本條件，正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所指出的，是土地改革，這現在正在自由民主的中國，有利於千百萬農民羣衆地順利地實行。

爲了實現共同綱領中所提出的歷史任務，首先要求盡力鞏固人民政權的國家機器。毛澤東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强化人民的國家機器……以此作爲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同書，頁一三）。

論到中國新民主主義發展的前途時，毛澤東着重提出，在人民的國家面前擺着教育工作的巨大任務。它應當教育和改造勞動者，使他們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脫離他們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這些是阻礙他們前進到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去的。毛澤東指出，在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上，中國人民民主之從基本上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政權，過渡到起着無產階級專政作用的政權這一過程，將告完成。

毛澤東估計到，經過農業社會化來改造農民，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爲了實現這個任務，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努力。『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同書，頁一五）。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將取決於國家工業化的程度。

毛澤東指出，爲了從現代中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至少必須三個主要條件：（一）以共產黨爲代表的工人階級的正確領導，共產黨是最徹底地代表和保護勞動人民的利益的；（二）對任何破壞和削弱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的企圖之無情的鬥爭；最後，（三）偉大的蘇聯的援助以及同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密切合作。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締結的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好同盟和互助條約及其他有關的協定，是一個證據，表明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滿懷信心地堅定地走向自己的目標，並且永遠把自己的命運同蘇聯領導的整個民主與社會主義陣營聯結在一起。毛澤東在離莫斯科時的演說中說：『業已經過條約固定下來的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團結，將是永久的，不可破壞的，沒有人能夠分離的。』（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日眞理報）。中蘇人民的永遠友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完成其歷史任務中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證，這歷史任務就是爲將來過渡到國內社會主義改造而準備必要的條件。

※　※　※　※

毛澤東的一切著作，都具有戰鬥的黨性。他所研究的每個問題，都爲了解決某一歷史階段上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迫切任務。毛澤東以創造地理解馬列主義的精神來教育中國共產黨員。他教導說，共產黨員應當有目的地研究馬列主義，把它同中國革命運動聯繫起來，在它那裏找出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方法。

毛澤東教導中國共產黨，對機會主義、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動搖之任何表現，作堅決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在兩條陣線鬥爭中（反對政治上的『左』右傾，反對在解決理論問題與實際任務時方法論上的唯心論和機械論）鞏固起來了。

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實踐論』中非常深刻地揭發和揭露了右傾機會主義和『左』翼空談主義在方法上的唯心論基礎。毛澤東寫道：『唯心論與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爲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爲特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

毛澤東指出，在這鬥爭中，自我批評、對黨員羣衆的布爾什維克式教育、辯證唯物論哲學的廣泛宣傳，是主要的武器。

毛澤東之創造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到科學認識中去，他根據列寧斯大林學說所作出的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靈活策略，他的戰略戰術，他的中國新民主主義學說，他在對共產黨隊伍內各種唯心論的和機會主義的動搖所作的鬥爭中的布爾什維克式不調和性，——這一切使中國人民取得了對國內外敵人的最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勝利，並且建立了新的人民共和國，永遠地結束了帝國主義壓迫者和封建反動勢力在中國的統治。

中國人民之所以達到這些巨大成功，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之下走了和走着全世界勞動者導師列寧斯大林所指點的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和整個殖民地東方的生活中開闢了新時代，標誌着天才的馬恩列斯學說的偉大勝利。

六月九、十、十一日譯，十二日校。

學術問答

〔問〕普遍眞理、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之間有些什麼關係？有人說：馬列主義是普遍眞理也就是絕對眞理，對不對？

（瀋陽 趙祖剛提）

〔答〕所謂普遍眞理，是這樣的一種眞理，就是：它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事物的普遍發展規律，因而它所適用的範圍是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是普遍眞理，就是由於它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普遍發展規律，就其一般原則來說，它不是僅僅可以適用到資本主義的國家，其他的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例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也同樣可以適用的。但在具體運用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眞理』（毛主席語）的時候，則可能如同列寧所說的：『在英國是與法國不同，在法國是與德國不同，在德國是與俄國不同的。』（『我們的綱領』）

所謂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則是就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的界限說的。關於這個界限，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曾有極其精闢的意見。列寧說：『對於辯證唯物論，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之間是沒有不可超越的界限的。……從現代唯物論，即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我們的認識之接近於客觀絕對眞理的界限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這種眞理的存在却是無條件的，我們之逐漸接近於這種眞理也是無條件的。畫像的輪廓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這幅畫像描繪着客觀存在着的模特兒是無條件的。在我們對於事物本質的認識中，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我們達到了在煤脂中發現茜素，或在原子中發現電子，這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是，每個這樣的發現，是向着『絕對客觀認識』前進一步，却是無條件的。一句話，任何觀念形態都是歷史地有條件的，但是任何科學的觀念形態（與——譬如說——宗教的觀念形態不相同的觀念形態）之與客觀眞理、絕對自然相照應，却是無條件地眞實。』（第二章，第五節）預料到人們會以爲：照這樣說來，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的區別是完全不確定的，列寧回答道：『是的，這是够「不確定」的，以便提防科學變爲惡劣意義的獨斷，變爲死的、凝固的、僵化的東西；但是它同時又是够「確定」的，以便使我們能够最堅決和斷然地跟信仰主義及不可知論、跟哲學唯心論及休謨和康德的信徒之詭辯主義區別開來。』（同上）

毛主席在『實踐論』中發展了列寧關於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相互關係之辯證法的觀點。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眞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眞理性。無數相對的眞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眞理。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與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與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眞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眞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眞理的道路。』——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相對眞理與絕對眞理相互關係的正確回答。

如果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是絕對的、客觀的眞理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爲就其無條件地之與客觀世界普遍發展規律相照應這一點來說，它無疑地是絕對、客觀的眞理。懷疑這一點，就要使我們走上信仰主義、不可知論的道路。關於這一點，列寧在駁斥波格達諾夫認爲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論只是『我們時代』的客觀眞理、而把這個理論認爲是超歷史的客觀眞理的見解叫做『獨斷論』時，認爲這是糊塗的觀念。列寧寫道：『這個理論之與實踐相照應是不能被將來的任何情況所改變的，它所依據的簡單的理由，正就是「拿破崙死於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永恒眞理所依據的同一的理由。但是，既然實踐的標準，即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最近數十年來的發展進程只是證明着馬克思的全部關於一般社會經濟的理論之客觀眞理性，而並非僅僅是某個部分、某個公式、等等之客觀眞理性，那末，顯然地，在這裏說什麼馬克思主

義者的「獨斷論」，就是向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作不可饒恕的讓步。』（『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二章，第六節）於是，列寧從這裏作出結論道：『從「馬克思的理論是客觀眞理」這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見解所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循着馬克思理論的道路走去，我們將日益接近於客觀的眞理（決不能窮盡）；而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走去，我們除了混亂和謊話之外，什麼也不能達到。』（同上）

但如果把『絕對眞理』這些字眼作形而上學的理解，就是說，把它看作是死的、凝固的、僵化的意義，認爲它既然是『絕對的』眞理，就以爲『宇宙的諧調全都存在於其自身之中』（狄得羅語），就以爲它已經無須或不會再向前發展了，那末，像這樣的『絕對眞理』，就決然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相同之處。正是爲了這個緣故，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曾和杜林作了不調和的鬥爭，因爲杜林庸俗地玩弄『最後的、終極的、永恒的眞理』的字眼。恩格斯說：當然，永恒的眞理是有的，但對於簡單的東西使用巨大的字眼是不聰明的。（參考『反杜林論』，第一編，第九章）三十年後，當列寧駁斥俄國馬赫主義者波格達諾夫詆毀恩格斯關於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的相互關係之辯證法的分析爲『折衷主義』時，由於波格達諾夫對於『永恒眞理』作形而上學的理解，列寧指出：『爲了推進唯物論，必須拋棄對於「永恒眞理」這些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須善於辯證地提出和解決關於絕對眞理和相對眞理的關係問題。』（『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二章，第五節）我們如果記着恩格斯和列寧是如何提出和解決問題，那末，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是絕對的、客觀的眞理這個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馬　特）

〔問〕怎樣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歷史上的人物？歷史和現實的關係是怎樣的？

（天津　鄧先仁提）

〔答〕毛主席在其『農村調查序言二』那一文件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確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方法。把毛主席所說的『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得對頭了，就是能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了。

怎樣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歷史上的人物呢？極簡單的說，就是首先要看清楚這一個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都有一些什麼階級，這些階級在歷史發展上，各自起着什麼樣的作用。例如，那一個階級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那一個階級是阻擋歷史前進的。再看清楚我們所要評論的歷史人物，是屬於當時怎樣的一個階級，對於歷史的發展起着怎樣的作用，如果判明了他是屬於當時先進階級的，對於歷史的前進，起着或大或小的推進作用的，他就是一個先進的歷史人物；相反的，則是一個反動的歷史人物。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歷史上的人物，大體上歸結爲兩個基本的類型：第一個類型是前進的，第二個類型是反動的。階級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總是有衰老的階級，作爲垂死掙扎走向滅亡；新興的階級，奮鬥着要求生存和發展。所以每個民族、每個時代，其歷史的具體形態雖然有所不同，但其中的歷史人物，總不出乎這樣兩個類型。

簡單說來，就是我們評論歷史人物，要看這個歷史人物主要的、最終的是爲當時那一個階級服務，這種服務對那一個階級有利。也就是說，要看清楚他所隸屬的和服務的階級，在當時的階級鬥爭中，估有怎樣的地位，在當時歷史的發展上，起着怎樣的作用。用『爲誰服務？對誰有利？』這樣一個階級分析的標準和方法，就可以看出任何一個歷史人物的本質。這就是說要分析歷史人物的『階級性』。歷史人物是歷史上某一階級中具有集中性的、代表性的、典型性的人物。因此，他的階級性一定是强烈的。

掌握必要的歷史材料，用『對歷史發展上所起作用怎樣』這種着眼點來分析和評論歷史人物，那就可以避免一些唯心論歷史觀所造成的混亂；用分析歷史人物的『階級性』的着眼點來發掘歷史人物的本質，那就可以避免被歷史人物某些表面現象和假象所蒙蔽了。

經過這樣分析之後，我們就有了科學根據，來判明一件歷史事實的是非，確定對一個歷史人物的愛憎。離開這樣一個科學的客觀的標準，來談判定某件史事的是非功罪，來談對某個歷史人物的愛憎，都難免不是由主觀願望出發、不顧歷史眞實的主觀主義的行爲。

這樣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和評論歷史人物，完全不是什麼『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過去的歷史人物』，也沒有什麼『苛責古人』的地方。

武訓所處時代的主要階級和階級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地主階級是剝削的與統治的階級。毛主席說，『由於地主階級這種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窮苦和落後，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當時地主階級對防禦外來侵略勢力的無能，對外來侵略勢力採取投降主義政策，又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損害。滿族和漢族的地主階級以及外來的侵略者，就是當時『壓

迫中國人民的敵人』。農民與手工業工人，在當時是創造財富與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又是對外來侵略勢力的抵抗力量，當時已經掀起反抗地主階級統治的農民戰爭。毛主席說，『只有這種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才是中國歷史進化的眞正動力』。（同上）

武訓那時代的階級狀況與主要的兩大階級在當時歷史發展上的不同作用，簡單說來，就是這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武訓，他是『爲誰服務』？他的活動是『對誰有利』呢？根據可靠的材料，都證明武訓是爲當時的封建地主階級服務，對當時地主階級有利的。他的『行乞興學』，對當時業已舉行正義戰爭的農民階級，起着痲痺鬥志和向地主階級投降的作用。武訓就是這樣一個可憎可鄙的人物。不同的階級立場，對待同一歷史人物就一定會有不同的態度。由此，我們也就涉及一個『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問題。

歷史上的一種學說、思想，一個人物，當前又被某一階級或集團加以推崇、讚揚，或者是加以批判、抨擊，這必須到現實生活中去尋找原因。與現實鬥爭無關的歷史人物，不會重新出現於現實生活之中。歷史人物出現於今天的生活中，是有一定的階級鬥爭的作用的，即是說，是符合當前一定的階級、集團之政治傾向的。

例如：『五四』反封建運動中，高呼打倒『孔老二』，出現了『三個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聶瑩）。抗日戰爭初期出現了鄭成功、戚繼光、岳飛、文天祥等歷史人物。抗戰臨近勝利的時候，蔣介石在其極端反動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大捧曾國藩。我們則先後發表了『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范文瀾著）、『竊國大盜袁世凱』（陳伯達著），來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保衛自己抗戰勝利的果實。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後，毛主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爲鑑戒，不要重犯勝利驕傲的錯誤』。即如電影『武訓傳』的出現，也有其反動的意義與影響。

這些證例，都足以說明：反動階級就推崇讚揚反動類型的歷史人物，把這樣的歷史人物打扮成『至勇至仁』『千古一人』，另一方面，他們就必定反對有任何進步作用的歷史人物，對之加以汚蔑（例如對李自成）；這就是由於他們反動的階級立場，只能繼承歷史上反人民的反動傳統。我們則恰好和他們完全相反，這是由於我們能夠繼承了歷史上人民革命的傳統。正像反動統治階級，必須歪曲現實一樣，他們也必須歪曲歷史。正像我們革命的階級，敢於正視現實一樣，我們也完全沒有必要來歪曲歷史。無產階級的革命本質，使得它對於歷史能具有最科學的態度。

用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就使我們明白了歷史眞相，解決了研究歷史與現實鬥爭的關係。毛主席在其所著論新階段中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爲方法，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承繼歷史上的珍貴的遺產，就必須對歷史經過一番清理和批判；轉過來變爲方法，用來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這就是最明確地指出了研究歷史與現實鬥爭的關聯，也就是指出了歷史科學的戰鬥性，因此對歷史研究，採取脫離現實鬥爭的所謂『爲學術而學術』的態度，是不可以的。

綜合上文看來，毛主席教導我們以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由此我們也就懂得了：怎樣把無產階級的立場，馬列主義的立場，體現在歷史研究工作中了。（王　南）

〔問〕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有什麼不同？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能實行全國性的經濟計劃？（開封　陳伯虎提）

〔答〕新中國對於經濟建設是有計劃的，但是這種經濟計劃是有別於蘇聯的計劃經濟的。其理由是：中國是在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就是說，在經濟機構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因而，在製定計劃時，對於這兩類經濟成份，不可能把他們全部地確實地組織進計劃中。今天中國所實行的經濟計劃，嚴格說來，是限於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三種成份。至於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雖然在國家經濟計劃中也有它們的地位，但這種地位，從貫澈性這一點上來講，是與其他三種經濟成份有很大的不同的。兩年來的經驗證明了一點：凡是服從國家經濟計劃的私營工商業及個體農民與手工業者，無不得到發展，因而，這兩種經濟成份在計劃中的地位逐步地在改進。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國家的經濟計劃將一年比一年地更爲全面，確實，雖然這過程是相當長期的。在新民主主義的建設過程中，我們要不斷地壯大社會主義性質的以及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份，提高它的比重，同時使私人資本主義逐漸走向國家資本主義，個體經濟逐漸走向合作化集體化，到了那時，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實行較全面的確實的經濟計劃。（孫曉邨）

書評

評翦編『義和團』

翦伯贊主編 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丁名楠

翦伯贊先生主編的『義和團』出版了，這是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第九種，也是這套叢刊中最早出版的一種，『義和團』的提前出版，據編者的表示，是爲了紀念義和團五十週年。

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爲主的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這次運動，曾經震撼了當時的世界。但由於那時中國資本主義剛萌芽不久，新的階級力量還沒有形成，因而也就沒有無產階級及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義和團運動因爲沒有先進力量的領導，也就和歷史上多次農民運動一樣，帶有它本身所特有的落後性，最後在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階級的聯合鎮壓下，遭到了慘痛的失敗。但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它是有其歷史意義的，它不但又一次地表明了中國人民頑强不屈的鬥爭精神，而且更重要的，中國人民從義和團的失敗教訓中，逐漸地認識了帝國主義，逐漸地從表現在籠統的排外主義鬥爭的感性認識的階段，走向五四以後看出帝國主義內外矛盾，看出帝國主義本質的理性認識的階段。

翦編『義和團』全書共四冊，除編者自輯的『有關「東南互保」資料』，『有關義和團上諭』，『有關義和團輿論』等三種，及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的『光緒庚子辛丑電報』一種以外，共輯錄中外當時人述著的史料四十四種。編者從已知的三百多種史料中，選錄這些資料，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而進行的』，即在提供『有關義和團暴動之發生發展及其失敗之全部過程的具體知識』，及『義和團之各個側面的具體知識』。第一冊輯錄義和團一般情況及初期活動資料，第二冊記述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時期圍攻天津租界北京使館情況，第三冊是關於義和團失敗後那拉氏母子逃離北京及辛丑條約簽字後返回北京的情形，其中包括帝國主義在華軍事活動和以劉坤一爲首的『東南互保』，第四冊收輯原始性的歷史文件，如上諭、奏稿、書函等。在第一冊卷首附有地圖和照片插圖，第四冊卷尾附有簡表和書目解題，全書約一百三十萬字，比原定字數要超過些。

翦編『義和團』是有不少優點的，這些優點，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第一，本書搜輯關於義和團的史料，達四十餘種之多，字數在一百萬字以上，就目前來說，在規模上可以說是空前的。這些史料，我們知道都是從已知的大量資料中選錄出來的，僅從這一點而論，本書對於今後研究義和團的讀者，已給予不少的便利。

第二，本書在編輯上，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而進行的』，全書四冊，每冊環繞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中心，其前三冊，大致依照時間的先後，依照義和團發生、發展、及其失敗的次序來編輯的，另外把一些原始性的文件，集合在第四冊裏，這種編輯方式，層次分明，線索清楚，表明本書在編輯上也有了進步。

第三、翦編『義和團』的附錄，是本書的一大特色，書前附地圖一幅，照片插圖三十二幅，書後附簡表三種，書目解題一篇，不管本書插圖，尤其解題是否做得適當，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但採用這種附錄的形式，是值得推許的。有了照片插圖，讀者可以從插圖本身窺知當時一些實際情況，從書目解題裏，讀者大致可以明白某些史料的性質內容以及前人研究的成績，作爲進一步研究時的依據，這對初學者無疑的是極有幫助的。地圖對於研究歷史的輔助作用，也是毋須多說的，如果沒有附圖，我們很難立即知道義和團的活動區域，和外兵進攻的路線。三種簡表，對讀者查閱當時人名，也很有幫助。我們希望以後絡續付印的其他各種資料，都能保存這種特色，並且做得更好。

上面所舉的是本書的優點，當然優點方面，決不只這些，但即使僅有這些優點，本書已不失爲一部可供參考的資料書。

本書一方面有它的優點，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點，我所說的缺點可能不完全是正確的，但爲了今後這套叢書編輯得更好，所以不揣冒昧的提出幾個問題來談談。

第一，本書在編輯上，有些重要部分，沒有照顧到。我們任舉兩例，略作說明。首先，關於義和團運動發生的基本的深遠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這是盡人皆知的，我們可以撇開不談。至於激起義和團運動在一九〇〇年爆發的近因，外國教士和公使應負最大的責任。從已公布的美英外交文書及教會文件上，都充分的證明了這個事實。中國教民依仗外國教士的庇護，自居於本國法律禮俗之外，從而經常引起中國人民和教民間的衝突。外國教士根據教民片面的報告，例如山東公理會美籍教士斯密司（A.H.Smith）和波德（H.D.Poter）等，故作危詞，聳人聽聞，要求美國公使向滿清政府提出嚴辦義和團的要求。美公使康格（E.H.Conger）就據此公然要求把山東巡撫毓賢免職，滿清政府第二天就發表毓賢的免職令。此後康格又根據斯密司和波德的建議，照會滿清政府，要求毓賢以後的任命，不得在有教士及教士傳教的地方。這和後來毓賢在山西巡撫任內，大殺他認爲造謠生事的傳教士，以示報復，是有相當關係的。

因山東義和團大刀會引起的『交涉』，遷延很久，一直沒有解決，康格主張以大沽海軍示威和北京使館駐紮外兵的方式，壓迫滿清政府，接受他們嚴辦義和團的要求。但由於滿清統治階級內部，分爲帝黨后黨，掌權的后黨，以爲外國軍艦集合大沽示威，和公使堅決要求使館軍隊進京，是一種於己不利的行動，表明公使有意擁立光緒，乘機排斥后黨，引起了他們極度的疑懼。實際上帝國主義擁帝擁后，都無所謂，主要關鍵看誰最能順從他們的意志。但因后黨對公使心懷疑懼，因此『交涉』愈鬧愈僵，雙方隔膜愈深，於是在扶清滅洋的口號下，滿清政府和義和團有了短期合作的可能。但造成這種合作可能的主要原因，便是帝國主義的壓迫。這些材料，在美國對外關係，英國對華藍皮書上，都有記載。編者沒有利用這些材料，把它摘譯出來，用具體的事實證明造成義和團運動爆發的近因，是外國公使和教士，這是值得提出來的。

其次，譬如庚子年東北義和團的活動情形，沙俄的藉口出兵佔領東北，及因之而起的『東省交地交涉』，本書內完全略去，這些都是富有歷史影響的大事，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直接間接都與這些事情有關。列寧說過：『日俄戰爭打擊了沙皇制度』，『旅順口的陷落是專制制度崩潰的開始』。日俄戰爭和俄國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知道庚子年沙俄出兵攻佔東北後，强逼盛京將軍增祺訂立『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沙俄想通過條約的形式，逐漸地將東北置於他們直接控制之下。增祺訂約後，沙俄政府又威脅利誘李鴻章訂立正式條約。但由於帝國主義內部矛盾，英日兩國一方面運動劉坤一、張之洞等有力疆吏，出面反對，一方面對滿清政府進行不斷的恫嚇，如果俄約簽字，英日也要援例瓜分中國，另一方面，英日對沙俄提出責難。滿清政府在內外反對的聲浪中，雖有李鴻章堅持簽字，也不得不多所顧忌，終於沒有答應沙俄的要求。沙俄壓迫滿清政府，用盡一切辦法，也就沒有成功，最後只得放棄通過訂約方式，取得東北控制權的企圖。沙俄政府與滿清政府駐俄公使楊儒在彼得堡進行的這一幕交涉經過，『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內所收集的駐俄使館檔案的資料，是可以採用的。至於英日帝國主義運動滿清疆吏反對的情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及李鴻章、張之洞諸人的集子裏，都有不少的記載。蘇聯科學院院士羅曼諸夫的『帝俄侵略滿洲史』，是很出色的一本著作，楊紹震的『庚子年中俄東三省之衝突及其結束』（翦書誤作結果），也是一篇可以注意的文字。沙俄和其他帝國主義同是鴉片戰爭後積極侵略中國的國家。我們瞭解了一九〇〇年沙俄對華外交政策之後，再和今天蘇聯對中國的友好合作政策對比起來，更能認識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的沙俄本質上的不同，更加倍珍視今日中蘇兩大國間所存在的兄弟般的友誼。

第二，本書在編輯上，對有些重要題目，沒有給予它應有的地位。例如結束義和團運動的辛丑條約，只在第四冊裏節錄了條約的正文，在『庚子辛丑電報』中，也只佔了一小部分的篇幅，這在分量上遠遠顯得不够的。辛丑條約是滿清政府和帝國主義訂立的賣國條約。這個條約，一方面保存了滿清統治的權位，一方面又鞏固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條約上除了『道歉』，懲『兇』，規定北京使館、京津、津榆鐵路沿線駐兵，拆毀大沽砲台，保證嚴懲中國人民中帶有仇外性質的會社組織之外，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因巨額賠款而引起的經濟上的巨大的災害。帝國主義最後以『經濟的瓜分』代替領土的瓜分，這是他們在華外交代表一年多長期吵嘴，你爭我攘，縱橫捭闔的結果，終於訂出這樣一個調和多方面矛盾的條約。從條約上，每個帝國主義國家得到了部分的滿足，但誰都沒有完全的滿足。俄法想用提高關稅，用共同担保的方式發行債券，

替滿清政府籌錢，以便一次取得全部賠款，英美因爲提高關稅，對他們商品的銷售不利，表示堅決反對，英國自以爲財政信用較高，以不參加共同担保募債，逼使俄法德日放棄原先的提議。但四萬五千萬兩的賠款數字，年息四釐，分三十九年還清的辦法，大致照英德兩國協議的結果通過的。英國雖因俄法的反對，沒有進一步攫取中國鹽稅管理權，但多年貪求的沿海常關管理權，這次總算如願以償了。沙俄多次的提議，由於英美的聯合反對，沒有獲得通過，但它取得了首位數字的賠款。沙俄外相拉姆斯道夫認爲『一九〇〇年的對華作戰，是歷史上最够本的戰爭』。德國的賠款數字，位列第二，也實現了威廉多索賠款擴充海軍的願望。這時羽毛未豐的美帝國主義，雖然在賠款方面，要求較爲少些，它的注意力，似乎放在另一方面，條約上關於中國地方官在轄區內發生仇外行爲，如不立即彈壓，永不敘用的規定，是美國代表柔克義(W.W.Rock-hill) 提出來放上去的，這樣，使中國的地方官成了替帝國主義維持治安的工具。至於拆毀大沽砲台，使館駐兵等要求，是法國徵詢各國意見後歸納出來，作爲條約的基點，後來的辛丑條約，便是從這些基點上逐次擴充出來的。關於上述各方面的材料，在中國文件裏，很少記載，在外國文件中，却是相當豐富的。例如：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二年英國對華藍皮書，大部分是英外交部和駐華公使往返的文電，在這些文電裏，帝國主義在賠欵問題上所表現的深刻矛盾，以及他們侵略中國的兇惡面目，暴露得非常明顯。而編者認爲紀念義和團的最好的辦法，是公布史料，讓讀者從歷史上去認識帝國主義，因而提高我們的警惕。我們果然可以從記載帝國主義士兵的殺人暴行的史料中去直接認識帝國主義，但是我們如果透過外交官的冠冕堂皇的詞令，從記載他們陰險毒辣的外交活動的官方文書裏，去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似乎能有更好的效果。編者沒有從這一方面來揭發帝國主義的罪行，暴露他們的眞相，那是很可惜的。

第三，本書在取材方面，似乎還有一些可以商討的地方，有些重要的史料，本書沒有加以利用。譬如盛宣懷的集子『愚齋存稿』，編者在書目解題上，沒有編入，『有關東南互保』資料中所引用的一部分盛宣懷的電文，都是從張之洞、李鴻章的集子裏轉錄過來的。盛宣懷是當時中國的大買辦，『東南互保』的局部妥協局面的出現，是以英帝爲首的帝國主義，和劉坤一、張之洞等中國封建軍閥，通過大買辦盛宣懷一手搞起來的。盛宣懷在『東南互保』中，起了居間拉攏的作用，這也說明了中國買辦階級的性格。『東南互保』的活動中心是上海，上海是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最大最集中的一個都市，所以他們對它特別關心。又因爲上海位於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轄區內，由於這種關係，帝國主義把劉坤一看得比湖廣總督張之洞更爲重要。這時，盛宣懷在上海，盛宣懷的活動對象，首先也是劉坤一。編者以爲『東南互保』是張之洞爲首的，那是不很恰當的，『東南互保』應該說是以劉坤一爲首的，這在本書第三冊內收集的趙鳳昌以惜陰筆名發表的『東南互保之紀實』一文中，已經相當清楚。在三月六日（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劉坤一給盛宣懷的電文上，也可以看出在『東南互保』中劉坤一所處的首要地位，和盛宣懷所起的居間作用。如果編者留意一下盛宣懷的集子，那便更容易明白了。至於英帝國主義勾結劉坤一、張之洞的材料，在一九〇〇年英國對華藍皮書上，也有記載。

第四，本書有一些材料，似乎可以考慮抽去，用其他更好的材料來代替，如樸笛南威爾 (B.L.Putnam Weale) 的『庚子使館被圍記』，作者（原名爲 (B.L.Simpson) 雖是當時在使館內參加抵抗義和團和清軍圍攻的一員，但並不是主持全局的人，當時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人員，推舉英國公使竇納樂 (Claude MacDonald)爲領袖，負責使館區內一切事務。事後，竇納樂有給英政府相當詳細的報告，叙述他們怎樣和滿清政府交涉，故意挑剔細故，拖延時間，等待援軍，比樸氏被圍一段的記載，內容更充實些，更有參考的價值。該報告分兩部分搜集在藍皮書內，可以考慮全文譯出。又樸氏『庚子使館被圍記』，約佔本書全書分量的十分之一，未免太多了些，該書雖記述北京陷落後聯軍大肆燒殺淫掠的暴行，相當翔實，但煩文浮詞，確也不少，如果把無關緊要的部分，加以刪節，可以騰出一些篇幅來。

第五，本書的另一缺點，即採用的外文資料原譯有錯誤及不妥當的地方，本書照樣保留下來，不加改正。如王光祈譯『瓦德西拳亂筆記』，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外國人名地名，一律沒有翻譯，這也許王氏譯書時受條件的限制，或者情有可原，例如王譯本中沒有把(Kobe)譯爲神戶，(Aoki)譯爲青木，(Komura Iataro) 譯爲小村壽太郎，(Jamagutschi)譯爲山口，沒有把在北京傳敎多年的天主敎北京及北直隸敎區主敎 (Fauier)譯爲樊國樑，翦編『義和團』最好能把它翻譯出來；又如原譯將美國國務卿，譯爲國務秘書，天主敎敎士譯爲牧師，這顯然是不妥當的，編者亦應趁此機會，加以更正。又如樸笛南威爾的『庚子使館被圍記』，由陳詒光、陳冷汰譯成中文，譯文較王譯『瓦德西拳亂筆記』更差，錯誤更多，最顯著的例子，如把耶穌會敎士Jesvits，一譯爲舊瑞嗣派，又譯作舊瑞第派；把明末來華傳敎的有名敎士湯若望 (Joan Adam Schallvon Bell)

譯爲史茄果，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譯爲匪比史梯，因原譯者歷史知識不够，不能適當譯出。翦編『義和團』是作爲研究學習近代史的資料來利用的，就有責任把錯誤改正過來。其他原譯中如將東交民巷台基廠作爲王府井大街，總理衙門章京譯爲司官等可議處尙多，因手頭沒有原著，不能査對指出。

第六，本書在技術方面，也有錯誤，必需加以校正。第四册恒謙手扎殘稿，第四二一頁第一行『並無此事』，至第四二四頁第二行『派八名馬勇護送』止，這一段文字，應移在第四二八頁第五行『遣專人送陝』之前；又第四二七頁第八行『云有五個月餘限也』，至第四二八頁第六行『只有』止，這一段字句，應移在第四二四頁第二行『神佛默佑』以前。按恒謙手扎共三件，是以前沒有發表過而比較可貴的資料，可惜都已殘缺不全。恒謙是當時護理陝西巡撫端方的表弟，恒謙信上多次提到的四哥，就是端方。手扎的收受人，恒謙稱之爲五弟六弟的仲綱叔綱，都是端方的弟弟。義和團運動初起時，他們從北京逃往陝西。這三封信，是恒謙從北京寄給他們的。叔綱即端錦，後任河南知府。辛亥年端方帶兵入蜀，鎭壓四川人民的革命運動，端錦也隨着端方去四川。端方、端錦同爲起義的革命黨人所殺。

翦編『義和團』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首先出版的一種，正如編者所說，『這部書不能說對義和團的研究沒幫助』，是的，我們肯定的說，本書的出版，對研究義和團是有幫助的，但因本書存在着一些缺點，使它不免遜色。我們知道，一切開始的工作都是困難的，希望翦編『義和團』再版時，能及時改正一些較爲重大的缺點；並希望今後陸續付印的近代史資料，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做得更細緻些、更完善些。

答丁名楠同志

新建設雜誌社寄來『評翦編義和團』一稿，我們拜讀之後，覺得丁同志提出的一些問題，對於『義和團』一本的改正，大有幫助，不過我們對於丁同志的批評，也有一點意見。

一、丁同志批評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沒有翻譯當時各侵略國的外交文件，我們承認這是本書的缺點之一。造成這種缺點的原因是受條件的限制。第一、爲了要爭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以紀念義和團五十週年，時間上太倉促，來不及翻譯這些材料。第二、我們這裏的人手很少，而且沒有懂得德、法、俄文的同志。英美的外交檔案，我們都已看過，而且正在擇要翻譯，最近再版時，預備先加入重要的一小部分。將來我們預備全部譯出，但這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

二、關於東北方面的材料太少，一方面是因爲這種材料，大半保留在蘇聯政府所發表的紅色檔案中，這種檔案，我們至今尙未找到，即使找到，也沒有人能够翻譯。另一方面，是限於篇幅，因爲我們要留出篇幅來容納全面性和集中性的材料。關於紀述義和團在北京的活動的材料，搜得比較多，我們認爲是應該的，因爲這是義和團運動的高潮，也是中國農民轟擊帝國主義的英勇之一幕。

三、關於材料方面的遺漏，謝謝丁同志給我們指出了『懸齋存稿』一書。現在我們已經把其中有關東南互保的材料輯出。再版時即可補入。我們自己覺得遺漏的書，決不只這一部，希望丁同志和其他史學工作者在續有發現時能告訴我們，以幫助這本書的逐漸改善。

四、關於『庚子使館被圍記』的取捨，我們認爲它還有著錄的價值，因爲這本書是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的自白，它不僅使我們看出當時使館中防禦的實情，並且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的野蠻刧掠行爲，這些都不是躱在屋中的公使所能詳細知道的。另外，這本書陳譯本中頗有錯誤之處，這次再版時，我們自己已按照原本校對改正了。

五、關於『瓦德西筆記』中的人名地名，王譯本沒有譯出，我們這次再版時已大部分加上了譯名，不過也有一些譯不出的人名（不出名的人），則祇好仍然暫付闕如了。

六、關於選稿的標準，我們在序言中已經聲明，一定有不適當的地方，但也不是漫無原則，不過我們的原則不是常見不常見。我們以爲在北京『常見』的書，到了外埠就會變成不常見的，專家學者常見的書，在非專家學者看來，就會變成不常見的書。我們編這部書的目的，不是爲了住在圖書豐富的北京的專家學者，而是爲了一些連常見的書都不易看到的非專家學者。而且，我們以爲一本書的重要與否，不在於常見與不常見，因此，我們這次選稿，即使是常見的書，如果重要，也把它著錄；反之，即使是不常見的書，如果不重要，也不

因爲它是鈔本或孤本即著錄。

此外，我們對於丁同志的這篇稿子，還有如下的幾點意見：

一、關於義和團性質之叙述似乎也可以精簡一些，因爲范著中國近代史中早已有更詳確的叙述了。

二、丁同志指出本書的一些缺點，幫助了我們再版時的改進，我們非常感謝。但見那種不能算作優點的優點，如丁同志所指出的一個『優點』——錯字少。我們認爲這是出版者至少應做到的責任，絕不能算做優點。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建議也可以把這四條『優點』精簡了！

三、丁同志拿『義和團』與向、王兩位先生之『太平天國史料』來比。我們以爲這種比法是不必要的。因爲我們知道自己的學識絕沒有向、王兩位先生淵博，而且我們也沒有條件去外國抄材料，同時，更重要的是這兩部書的編輯方向大不相同，一個是匯零爲整的彙纂工作，一個是拾遺補闕的輯逸工作，所以，我們從來就沒有想，同時，也不敢想和向、王兩位先生去比。

我們完全同意丁同志所說的，我們之所以有許多缺點，是由於對史料的認識和掌握的程度不够，因爲我們這幾個編者對於近代史多半是初學的，所以對於史料的認識和掌握非常不够。我們相信在讀者與專家的批評與指導之下，這本書可能逐步改善，做到如丁同志所說的：『充分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的地步！

金家瑞
林樹惠

（上接44頁）

所以，一個現實主義的藝術工作者，必須誠懇地生活再生活，列寧指示給我們：『應當把自己最深的根，放進廣大勞動大衆的最深的地層裏面，它應當爲這些大衆所理解和爲他們所喜愛，它應當統一這些大衆的感覺，思想和意志，提高他們，它應當在裏面來鼓舞藝術家與發展藝術家』。同時，我們必須記得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生活重於藝術』，但重於藝術的原因，是爲了提高藝術的眞實，而提高藝術眞實的目的，乃是爲了改造生活，高爾基所以說：『藝術高於生活』，這與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一點也不衝突。說得更具體一點：生活是藝術的能燃的柴薪。藝術是生活的美麗的火焰。

一九五一年·五月·在上海。

（上接53頁）

註解

（一）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二二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
（二）И·M·謝欠諾夫『思惟原理』九一頁。一九四三。
（三）參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二四頁。
（四）前書，四二頁。
（五）前書，四〇頁。
（六）列寧『哲學筆記』，七二頁，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七。
（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十四卷，六五一頁。
（八）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六七頁。一九四九。
（九）前書，一六六頁。
（十）列寧全集，廿三卷，二九頁。
（十一）列寧『哲學筆記』，一六四頁。
（十二）列寧『哲學筆記』。
（十三）參看維諾格拉多夫及庫玆明教科書『邏輯』，八二頁、八四頁。一九四九。以及『哲學問題』雜誌第二期，一九五〇，二一七頁。
（十四）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二〇九頁，一九四七。
（十五）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三三頁，一九五〇。
（十六）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終結』三六頁。一九三九。
（十七）恩格斯『反杜林論』，三四九頁。
（十八）列寧『哲學筆記』，二六七頁。
（十九）恩格斯『反杜林論』，三一七頁。
（廿）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三六九——三七〇頁。
（廿一）前書，三七〇頁。
（廿二）列寧『哲學筆記』，三二八——三二九頁。

波、匈兩國大量出版我領袖著作

波、匈兩國大量出版了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著作。波蘭出版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實踐論』（一九五一年出版）。

匈牙利火花社一九五〇年出版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文集，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雜誌『社會科學評論』今年第二期刊載了毛主席的『實踐論』。

學術文摘

文摘這一欄，主要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時間，摘錄的部分，只能包括各篇論文的要點和結論，以便讀者瞭解全文的大意。——編者

加强思想工作，展開思想鬥爭

鄧拓

一

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度中的勝利，及其實際影響的日益擴大；隨着中國人民思想的迅速進步，我們在思想工作的領域中就面臨着更加重大的任務。這就是要進一步在中國人民羣衆中，建立與鞏固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思想戰線，徹底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但是，目前我們的思想戰線却太薄弱了。嚴格地說，我們還沒有眞正形成强有力的思想戰線。我們的思想工作，還遠遠地落在實際生活和鬥爭的後面。不但這樣，事實說明，在某些方面的實際工作中，思想上的麻痺和混亂狀態，已經成爲嚴重的危險。

對着這個缺陷，我們應該做什麼呢？在這裏我們又接觸到了兩種錯誤的思想和錯誤的態度。一種是麻痺自滿；一種是喪失信心。這兩種在本質上都是庸俗的自由主義。

麻痺自滿的人，是政治上的懶漢，他們只依靠我們黨在人民羣衆中的政治影響，企圖毫不費力地坐待一切工作成績自然來臨。喪失信心的人，往往是做思想工作遇到困難，或者不得其門的。他們對自己的工作認識模糊，喪失信心，庸俗的自由主義也就更加暴露出來了。他們聽到或看到一些反革命的宣傳或錯誤的宣傳，居然漠不關心，沒有堅決地起來鬥爭。他們幾乎完全放棄了思想工作，放棄了對人民羣衆實際鬥爭的思想領導。這種庸俗的自由主義是決不能容忍的。

二

思想工作，通俗地說，就是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是依據這種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釋社會生活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去批判各種反動的錯誤的思想。共產黨人的宣傳工作，就是思想工作，就是思想鬥爭。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證明思想工作的重要。在黨的組織沒有建立以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已先開始了，並且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有了初期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然後才有中國工人階級的自覺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才建立了黨的組織。在我們的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中，毛澤東同志在一切方面，首先是在思想領導方面，都給我們做了無數光輝的範例。

一切實際工作問題，都不能離開思想領導。離開思想領導的實際工作是缺乏靈魂的；同樣，離開實際工作，就不可能有思想領導，而只是無用的空談。我們有些同志往往把思想領導和實際工作分裂開來。有教條主義傾向的同志，往往離開實際，流於空談；有經驗主義傾向的同志，則往往忽視思想領導，盲目埋頭工作。後一種傾向在目前相當普遍。『關門建設，不問政治』的想法就是這種傾向的具體表現。

根據我們國家目前的狀況，叫喊『技術决定一切』是不適時宜的，是錯誤的。許多人不知不覺地犯了單純技術觀點和經濟主義傾向的錯誤，必須糾正。

我們在經濟戰線上的工作和各種鬥爭，無疑地應該和政治方面的鬥爭，特別是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密切結合。任何實際工作部門的幹部，都應該首先從政治上思想上提高起來，才有可能求得工作上的提高。

思想工作應該由誰來做呢？應該由所有的共產黨員和全體革命幹部一齊來做，必須這樣才能做好這工作。

三

我們有不少同志雖然已經開始注意了使自己的工作政治化，提高自己工作的思想性；但還有許多同志却很苦於不知道怎樣進行思想工作和思想領導，不知道在工作中怎樣提高思想性。因此，應該使每個同志都通曉社會發展規律，善於運用這些規律來指導工作。要運用這些規律，就必須學會最基本的調查、研究和分析、綜合的方法。即對於客觀的情况和問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原則，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找出它們的共同點和差別點，找出它們的矛盾的各個方面，做出合乎實際的正確判斷；並且在實踐中根據發展的新情况和新問題，繼續分析、研究，補充與修正原來的判斷。這就是對一切現象和一切問題，就它們的矛盾與統一的具體關係，進行具體的分析與綜合，然後提出正確的結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以唯物辯證法來對具體情况和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在各種工作崗位上的領導同志，都可以也應該在自己的工作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加以具

證化。

要能領導，必須預見。盲目做工作的人不會有預見；教條主義者、經驗主義者也不能有預見。只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爲武器，對各種情況和問題做了分析研究，才能够預見這些情況和問題變化發展的方向。

有了健全的思想工作和思想領導，才能有系統地展開思想鬥爭。思想鬥爭是最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反映，它必須依靠最細密的思想工作和强有力的思想領導。

我國現實的生活，正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鬥爭的任務。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動思想，雖然在基本上已被打倒，但是顯然還沒有肅清，還需要進行很激烈的鬥爭。

對於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某些錯誤思想，必要的批評也是應該進行的。批評的目的是爲了進步，爲了團結，而不是爲了別的。團結又必須以進步爲前提，才是有原則性的團結。

唯有緊緊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鋒利武器，我們才能够正確地進行思想鬥爭。在運用這個思想武器進入戰鬥的時候，一定要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

什麼是現時流行的『左』的傾向呢？這就是對於中國民族的一切傳統，好壞不分，一概打擊，全部否定；或者不根據中國現實的社會條件，對一切事物提出苛刻的不合理的責難。這種傾向，已在萌芽，應予防止。至於現時的右傾錯誤，則是相當普遍的危險傾向。放棄思想鬥爭這事情本身就是這種傾向的表現。這種傾向中最惡劣的，就是歌頌中國各色各樣落後的東西，以至於把落後的東西，吹噓成爲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差不多，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還有一些人，在全國解放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當作時髦的裝飾品，而加以庸俗化，並與其他不知所謂的思想揉合起來，大量地進行理論上的走私。對於這一類走私販子的行爲，一般人是不容易覺察的。因此，每一個嚴肅負責的思想工作者，就有責任幫助羣衆區別眞假，提高嗅覺，發現有氣味不正的，就要起來抗拒它，反對它，揭穿魚目混珠的假冒行爲，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維護眞理。

在對各種思想鬥爭中，要善於領導，不使它發生錯誤。首要的事情是掌握大量充分的材料，進行細密的研究，分別各種思想的性質，予以不同的對待。

可以斷定，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我國思想界的發展和成就，將是不可限量的。爲着現實的需要和遠大的前途着想，加强思想工作和展開思想鬥爭，顯然已經成爲我們不可或緩的任務了。

（『學習』四卷九期）

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

蘇·阿·列昂節夫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是資本主義制度滅亡和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勝利的一整個時代。在列寧與斯大林的著作中有對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斯大林同志在創造性地發展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概括新的歷史經驗時，創立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揭示了它的實質和缺點。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極端加劇起來。世界之分裂爲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兩個對立體系，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特徵。

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發展的特點就在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更進一步的深刻化和尖銳化。

× × × ×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因素，是隨着資本主義鬘斷階段各種矛盾的增長而一道積累起來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戰爭就是這些矛盾的毁滅性的爆發。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爭表明了，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順利而平衡地進行的，而是通過多次危機和戰禍進行的，這些危機和戰禍是因帝國主義爲重新分割已被瓜分完畢的世界的鬥爭而引起的。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表明了全世界人類史中由資本主義舊世界進行到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根本轉變。這個革命衝破了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綫，使無產階級在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掌握了政權，因而開闢了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同時，十月革命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震撼了它在各殖民地與附屬國內的統治。因而它開闢了世界被壓迫國家內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 × × ×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特點就在於資本主義體系的腐朽性之日益加深。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生產的公共性質與私人資本主義佔有形式之間，勞資之間——使資本主義不可能得到穩定。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資本主義腐朽的加强突出地表現在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速度的顯著緩慢上，並且在危機和蕭條的長久時期內，發生了出產量的絕對縮減。二十五年來（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八年），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工業都是繼續留在一九一三年水平左右，共總不過超過這個水平百分之二〇到百分之三〇而已。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腐朽情形，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的經濟上的勝利比較一下，就表現得特別顯著了。一九四〇年，蘇聯大工業產量比一九一三年水平幾乎增加到二十倍。

下面一個二十年來工業產量變動表，對於兩個體系經濟發展的根本區別，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觀念：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九年
蘇聯	一〇〇	二〇一・六	四二八・九	四六六・四	八六二・〇
美國	一〇〇	六四・九	一〇二・七	一五四・五	一五九・五
英國	一〇〇	八六・一	一二三・七	一一一・二	一四二・〇
法國	一〇〇	七七・四	八一・七	六九・〇	九〇・三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業經加强的資本主義腐朽性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剝削階級和資產階級國家的寄生性之空前未有的增長，即資產階級及其寄生虫非生產費用的增長，軍國主義和軍備競賽的增長、以及緊縮小生產勞動範圍來擴大非生產勞動範圍等。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千百萬勞動力，不僅在經濟危機時期內成了多餘的，而且在危機的間歇期內也成了多餘的。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內，與經濟的腐朽同時發生的，是政治方面反動的加强。法西斯主義就是反動猖獗的最橫暴的形式。

資本主義體系各種矛盾的最具災難性的表現，就是拿人民的生存作孤注一擲的最具破壞性的帝國主義戰爭。

斯大林同志指明了，第二次世界戰爭，也如同第一次世界戰爭一樣，乃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世界經濟與政治力量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第一次危機的結果產生了第一次世界戰爭，而第二次危機的結果便產生了第二次世界戰爭。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危機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均勢狀態的猛烈破壞。

× × × ×

第二次世界戰爭，如同第一次世界戰爭一樣，其後果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削弱。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與民主的反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根本變化。蘇聯的威力增長了，它在國際舞台上的威信大大增高了。

中歐與東南歐許多國家裏人民民主的勝利，偉大的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勢力及封建反動勢力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以及愛好和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成立，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上打開了新的巨大裂口。

第二次世界戰爭乃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發生作用之後果，它又引起了這一不平衡性的進一步尖銳化，結果全部帝國主義體系的不穩定性更其加强了。

由於第二次世界戰爭的結果，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體系的危機空前加劇起來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勝利，乃是國際舞台上帝國主義陣營和反帝國主義陣營之間力量對比關係變化的明顯證明，它揭開了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亞洲各族人民歷史上的新的一頁。

資本主義的內部的及外部的經濟政治的矛盾達到了極端的尖銳化。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正以向勞動者生活權利的進攻、國家制度的法西斯化和發動新的世界戰爭來找尋出路。

美、英帝國主義者所擬定的新的世界戰爭的龐大計劃，遭到全世界千百萬人的日益加强的反抗。在世界各國千百萬善良人們中間，正在增長着一個信念：如果各族人民把保持和平的事業掌握在自己手中，並將和平捍衛到底，那末，和平就會保持和鞏固。

（『學習譯叢』第四輯）

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周揚

兩種歷史觀

電影『武訓傳』是一部關涉中國近代歷史的傳記影片。對待歷史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爲：歷史不是由階級和階級鬥爭造成的，而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造成的；社會的黑暗不是由於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而是由於人民自己沒有教育，沒有文化，因此要改造社會，可以無需經過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祇需給人民以教育和文化，就可以達到新的光明的世界。因此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主要地不是勞動人民，而是有文化教養的人們以及熱心於在人民中傳播『教育』『文化』的人們。這是一種反人民、反科學的歷史觀點。孫瑜在電影『武訓傳』中就是用藝術的手段巧妙地宣傳了這種思想。

另一種與上述觀點完全對立的觀點，認爲：人類社會的基礎既然是由生產組成的，那末人類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首先就是生產物質財富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在他們每天創造物質財富的當年，不斷地創造歷史。特別在歷史的轉變關頭，當新的社會力量起來和舊的社會力量進行鬥爭的時候，決定鬥爭的結局的總是廣大的人民羣衆。人民羣衆是歷史的主要推動者。歷史上的每一個重大的進步或變革，都必須經過人民羣衆的嚴重鬥爭，而不是單靠少數先知先覺者所能完成的。只有根據這種觀點來衡量和估價歷史人物，這才是正確的。許多同志批評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錯誤文章，主要地就都是從這個根本點出發的。這是人民的、科學的歷史觀點。

許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徘徊在兩者之間，他們雖承認人民羣衆的革命鬥爭在歷史上的作用，但對這種作用的認識往往是抽象的，估計往往是不足的。又由於他們個人的出身和教養，他們在解釋具體歷史現象或社會現象的時候，往往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文化看得高於一切，把個人的力量看得高於羣衆的力量，而特別有興趣於個人的奮鬥和成就，甚至個別的所謂『奇人奇事』。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形成了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盲目讚揚者的社會基礎。

武訓和電影『武訓傳』迷惑人的地方在哪裏？

武訓出身貧農，從乞丐變爲高利貸者兼地主，他一生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一個寄生者、剝削者的歷史。武訓不是一個普通乞丐，而是一個打着『興學』旗幟的政治乞丐。他有了這個旗幟，不但行乞方便得多，而更重要的是找着了和封建統治階級通氣的門路。他果然得到了豪紳地主官吏的贊助和支持，使他辦起了所謂『義學』，他自己也成爲了地主兼高利貸者。但他和普通地主是不一樣的。他雖然已經是一個三百多畝土地的所有者，而且以超過當時最高標準的利率放債，但他的土地名義上是學田，而他的收租放債又都假『興學』之名以行，因而就在世人眼中掩蓋了他地主兼高利貸者的剝削者的身份。

事實很清楚，武訓所辦的『義學』是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的。興辦『義學』並不是武訓的甚麼創舉。武訓的『興學』，就正是迎合了當時封建統治者籠絡人心的反動政策，因而『義學』就成了他投降封建統治階級並使自己也爬上了地主階級行列中去的政治資本。

人們同情着和讚歎着武訓的苦行。但是祇要稍稍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他的苦行祇不過是變戲法的詐騙手段（如喫五毒、喫瓦片、喝髒水等）和磕頭下跪的奴隸行爲的混合罷了，至於吃粗糧、宿破廟、不娶妻等等，姑無論武訓的實際行爲是否如此，這些事實本身又算得了甚麼苦行呢？如果這些都叫苦行，那麼，全國千千萬萬勞動人民不是更大的苦行者嗎？

電影『武訓傳』特別强調武訓具有魯迅所說的『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但是在事實上，武訓並沒有向勞動人民俯首，更沒有成爲勞動人民的『牛』，相反，他只是要求『孺子甘爲俯首牛』，向地主階級俯首，也向武訓本人俯首。

爲歷來武訓宣傳者們所頌揚的武訓一生的主要事蹟，就是『行乞』『興學』和『苦行』，電影『武訓傳』就把這些本來是落後的、反動的，但尚能迷惑人的事蹟，再加上一層更迷惑人的、前進的革命外衣，於是『行乞』變成勞動，『興學』變成對封建統治者的反抗鬥爭，『苦行』變成『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榜樣。

電影『武訓傳』主題的反動性

反動統治者，從滿清王朝到蔣介石，他們如出一轍地先後表揚武訓，是不足爲怪的，因爲武訓正是適合維護他們的反動統治的一個有用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褒揚武訓，都是在他們感到自己的統治搖搖欲墜的時候。

在中國人民取得了全國性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參加了人民民主政權，但他們中間却仍有一部分人對於已經或正在死亡的舊制度、舊事物時常感到惋惜和留戀，而對於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懷疑，對於人民革命更深入的發展則流露出彷徨恐懼的情緒。

電影『武訓傳』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改良主義思想在藝術上的表現之一。

電影借武訓的所謂『行乞興學』的事蹟用藝術的力量宣傳了這樣的改良主義的思想：不觸動舊的社會經濟基礎，不破壞舊的政治制度，祇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根本改變人民的被壓迫的地位。既然人民祇要有了文化就能解放，那自然就用不着羣衆的革命武裝鬥爭了。

電影『武訓傳』寫了以武訓爲代表的『義學』運動，同時，也寫了以周大爲代表的農民革命，用作者的話，叫做『一武一文』，互相配合。但是這不但沒有能够挽救，而且更加深了電影『武訓傳』主題思想的錯誤。

電影『武訓傳』對農民革命給與了極大的汚蠛。它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隊伍歪曲地描寫爲只是燒殺。

電影中的主題歌『武訓歌』，一方面歌頌武訓個人：『大哉武訓，至勇至仁』；另一方面詛咒時代：『世風何薄，大陸日沉』。即使作者詛咒的是過去的時代，這種詛咒也是錯誤的。這樣一方面對武訓的歌頌就達到了另一方面對農民革命的抹殺、歪曲和汚蠛的目的。

『武訓』形象的虛僞和醜惡

武訓本來是封建社會中最醜惡、最虛僞、最反動的奴才之一，電影却要將他描寫成爲『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勤勞、勇敢和智慧的崇高品質』的人物，這就需要藝術上的粉飾和欺騙。

電影首先把武訓寫成勞動人民中的一個被損害與被侮辱的人物，這種人物是最容易博得一般觀衆、特別是知識分子觀衆的同情的。

作者却把這樣一個奴才當作勞動人民的典型，當作民族英雄來加以歌頌，這是每一個愛國的觀衆所不能容忍的。

那末，究竟又有什麼東西使得武訓這個本來應當引起觀衆的憎惡和鄙視的形象竟引起了許多觀衆的同情和崇拜呢？

關鍵還不祇是在於作者把武訓描寫爲被損害、被侮辱到處下跪求人，値得同情和憐憫的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把武訓的到處磕頭下跪的卑賤行爲和他的所謂『爲窮孩子興學』的高尙理想與所謂『三十年如一日』的毅力結合起來，於是一個封建奴才的滑稽小丑變成了憑自己一人的力量終生反抗封建壓迫的悲劇式的英雄人物，因而就很容易地贏得了許多觀衆、特別是知識分子觀衆的贊賞和尊敬。

電影『武訓傳』極力地渲染了他的個人反抗的悲劇性，正在這個悲劇性中，對個人奮鬥和個人英雄主義作了最大的歌頌。

電影『武訓傳』汚蠛了中國人民歷史的道路，宣傳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用改良主義來代替革命，用個人奮鬥來代替羣衆鬥爭，用卑躬屈節的投降主義來代替革命的英雄主義。電影中武訓的形象是醜惡的、虛僞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的黑暗和卑鄙，歌頌他就是歌頌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愛國主義的。

（人民日報，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

『新建設』第四卷分類總目錄

論著·譯文

·學習實踐論·

從西方哲學認識論的批判來學習『實踐論』　北大哲學系　(一·一五)
『實踐論』——政治經濟學的道路　郭大力　(一·三三)
『實踐論』解說(二)　李　達　(一·三五)
『實踐論』解說(三)　李　達　(二·三三)
『實踐論』解說(四)　李　達　(三·二九)
偉大歷史工程底偉大哲理　何思敬　(二·三三)
學習『實踐論』，克服經驗主義！　王思華　(三·三一)
『實踐論』的意義及其基本觀點　沈志遠　(三·一四)
怎樣學習『實踐論』　李　達　(四·一七)
『實踐論』與民政工作　謝覺哉　(四·三三)
『實踐論』的基本精神　華　崗　(四·三六)
學習『實踐論』與改進革命工作的方法　潘梓年　(五·五)
了解『實踐論』的條件　金岳霖　(五·八)
『實踐論』與關於哲學史的研究　艾思奇　(六·六)

·哲學·

新編『哲學史』(三)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　(一·五四)
新編『哲學史』(四)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　(二·五七)
新編『哲學史』(五)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　(三·五二)
新編『哲學史』(六)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院　王子野譯　(四·六二)
論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定義　Д·И·戚斯諸科夫　沈志遠譯　(二·二三)
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　王亞南　(五·一)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上)　楊興順著　李何譯　(五·四八)
辯證唯物論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武器(下)　楊興順著　李何譯　(六·五四)
形式邏輯的對象和辯證法　蘇·П·C·波波夫著　張秋華譯　(六·四九)

·史學·

『五四』——中國人民歷史的轉捩點　陶孟和　(二·二)
五四運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葉蠖生　(二·四)
關於『中國通史簡編』　范文瀾　(二·二〇)
愛國主義與歷史科學　榮孟源　(三·二)
關於周代社會的商討　郭沫若　(四·三)
武訓生平的介紹和批判　謝興堯　(四·三八)
周代不是奴隸社會　王毓銓　(五·一七)
關於奴隸與農奴的糾葛　郭沫若　(五·二一)
怎樣學習黨史　李　達　(六·二)
墨家節葬不非殉　郭沫若　(六·一六)
周代殉葬問題　榮孟源　(六·一九)

·經濟·

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式　王學文　(一·七)
人民經濟的借貸關係與利息　許滌新　(三·一三)
從現金管理到貨幣管理　周伯棣　(三·一六)
中國共產黨領導着國家建設　陳　雲　(四·二)
中國共產黨與民族工商業政策　千家駒　(四·一三)
資產階級租稅轉稅理論批判　趙　靖　(五·三三)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上)　潘光旦·全慰天　(五·二七)
從『義田』看蘇南農村的封建勢力(下)　潘光旦·全慰天　(六·三三)
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諸問題　沈志遠　(六·二六)

·政治法律·

在北京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特載)　劉少奇　(一·七二)
人民代表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　宦　鄉　(一·三)
斥美帝單獨對日締和　林天際　(一·一〇)
從巴黎公社說到鎮壓反革命　高　放　(三·二三)
從方法論上看列寧對盧森堡民族理論的批判　李　琪　(三·三八)
中國人民怎樣戰勝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聶榮臻　(四·四)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　李維漢　(四·九)
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紀念　徐特立　(四·一三)
共產主義原理(上)　恩格斯著　吳恩裕譯　(四·五九)
共產主義原理(下)　恩格斯著　吳恩裕譯　(五·三二)
美、日帝國主義是中蘇人民的死敵　羅榮渠　(五·一三)
加强人民司法工作者的思想建設　陶偉·王式九　(六·二三)

·文化教育·

學術工作者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偉大任務　社論　(一·二)
大學課程『中國語文概論』的一個教學總結　黎錦熙　(三·三八)

·文藝·

五四時代新文學所受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李何林　(二·一一)
五四運動和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　孫伏園　(二·一七)
從認識古典美術發揚愛國主義　常任俠　(三·七)
發展爲少數民族服務的文藝工作　費孝通　(三·四三)
阿Q是一個農民的典型嗎？　蔡　儀　(五·三八)
眞摯和高貴的藝術　鍾敬文　(五·四〇)
現實主義的美學基礎　鄭　爲　(六·四三)

·語文·

國語語法綱要(上)　趙元任　(一·四一)
國語語法綱要(中)　趙元任　(二·四二)
國語語法綱要(下)　趙元任　(三·三四)
關於漢字的字音跟字形　林漢達　(一·四四)
論漢字改革問題的提法　趙宋光　(六·三九)

·科學·

資產階級優生學批判　學術講座　方宗熙　(一·三六)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上)　蘇·H·Г·蘇達里可夫　(一·四七)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中） 蘇·H·Г·蘇達里可夫（二·四四）
對資產階級法學反動本質的批判（下） 蘇·H·Г·蘇達里可夫（四·五三）

座談紀錄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上）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一·四七）
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下） 中國新哲學研究會（二·六七）
『實踐論』與新法學（上） 中國新法學研究會（二·六三）
『實踐論』與新法學（下） 中國新法學研究會（三·五九）

學術討論

中國古代社會的早熟性 嵇文甫（一·五〇）
半亞血族羣婚制——滕 丁山（一·五三）
研究古代史料的一個新途徑 王夔（一·五三）
孔墨底唯心論？唯物論？ 楊柳橋 馮友蘭（二·四九）
關於公共收入和租稅的發生 任林圃 周伯棣（二·五〇）
研究古代中朝關係的一個新證據 常元敬（二·五一）
種族奴隸制的殷周社會 楊榮國（三·四八）
關於中國奴隸社會 周谷城（三·五〇）
關於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材料問題 張舜徽（三·五一）
『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 老舍 王瑤 蔡儀 李何林（四·四六）
關於『國語語法綱要』 繆一之 李棠（四·五〇）
再論古代中朝關係 常元敬（四·七三）
舊意識的沉滅和死亡 謝逸華（五·四三）
關於後天獲得性和人的階級性 陳安湖（五·四四）
關於『意識狀態試論』的檢討 黃藥眠（五·四五）
論希臘時代藝術與資本主義時代藝術 王英白（五·四六）
關於『希臘時代藝術爲什麼比資本主義時代進步』 常任俠（五·四七）
關於認識的發展過程 楊贊時 沈志遠（六·四五）
關於黨性與階級性 李澤厚 莊本先（六·四六）
關於『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第二編 兪元桂 李何林（六·四七）

書評

關於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下） 彭澤益（一·六三）
關於呂著『中國民族簡史』中的幾個問題 馬學良（二·七三）
福斯特著『美洲政治史綱』 梁純夫（二·七五）
評『歷史唯物論』 蘇·歐庫洛夫作 田森譯（三·六五）
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 蔣學模（三·六七）
評『政治經濟學教程』 趙靖（四·六八）
論統計學的對象及其科學基礎——評勾適生著『統計學原理』 鐵華·劉新（五·六〇）
歷史的歪曲——評吳方平著『豪門梁冀』 金燦然（五·六四）
評翦編『義和團』——附金家瑞、林樹惠答覆 丁名楠（六·六三）

學術問答

恩格斯批判費爾巴哈的唯物論說它是『下半個唯物論者，上半個唯心論者』，爲什麼恩格斯不說是：『上半個唯物論者，下半個唯心論者』？ （陳珪如答）（一·六一）
有人說，老子是古代中國具有唯物論概念的哲學家之一，也有人說，道家哲學在認識論方面是屬於唯心論的，這兩說是否矛盾？ （馮友蘭答）（四·六六）
墨子生長在怎樣的時代？墨子的學說包括了那些主要的內容？對於墨學我們應該抱怎樣的態度？ （梁祖厚答）（五·四九）
普遍眞理、絕對眞理與相對眞理之間有些什麼關係？有人說：馬列主義是普遍眞理也就是絕對眞理，對不對？ （馬特答）（六·六〇）
關於經學古文派與今文派的鬥爭，好像是一個學術鬥爭性質，爲什麼能與政治發生聯繫？古文派的反動性何在？今文派的進步性又何在？如康有爲又如何利用今文派進行改良主義的政治鬥爭？ （宋雲彬答）（一·六〇）
中國私有制起源於何時？當時的生產關係怎樣？ （尙鉞答）（二·七一）
秦始皇的統一和漢武帝的對外鬥爭對中國社會有什麼影響，它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是否有什麼作用？ （宋雲彬答）（六·六三）
爲什麼我們說武訓是爲封建階級的文化服務的？對於歷史上的人物和事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評論它們？ （李達答）（五·五七）
怎樣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歷史上的人物？歷史和現實的關係是怎樣的？ （王南答）（六·六一）
什麼叫做『土地購買年』？它是如何計算的？爲什麼說中國土地購買年很短？購買年短，何以證明封建剝削之嚴重？ （朱劍農答）（一·六二）
批判的馬列主義貨幣理論與資本主義（名目主義與金屬主義）貨幣理論有何不同？與貨幣數量學說又有何不同？ （王烈望答）（四·六七）
爲什麼在自覺意志支配與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會存在着客觀的經濟法則？ （蔣學模答）（五·五九）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有什麼不同？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能實行全國性的經濟計劃？ （孫曉邨答）（六·六二）
日本的『肇廟命』究竟包含些什麼內容？它實際執行的情形怎樣？ （孟憲章答）（三·六三）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雅可賓專政時的情形是怎樣的？當時對反革命分子是如何鎭壓的？後來雅可賓是怎樣覆滅的？ （高放答）（四·六五）
『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有什麼不同？『治外法權』是不是包括『領事裁判權』？ （陳體強答）（二·七〇）
生物爲什麼要有雌雄之別？（不要用染色體的差別來說明雌雄之別，請用進化觀點來處理這問題） （方宗熙答）（二·七二）
自然科學有沒有階級性？如果有，它的階級性表現在那裏？ （左增答）（三·四六）

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周刊

世界知識

本刊為國內唯一歷史悠久的國際時事周刊，以普及國際知識為目的。它幫助讀者了解當前的國際形勢，加强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宣傳教育。

本刊文字力求通俗，盡量發揮題材的多樣性，每期除論文外，還有生動的通訊和札記，並多揷圖表和漫畫，內容生動活潑。

一每冊售價1.600元一

預訂三月12期：19.200元
預訂半年25期：40.000元
預訂全年50期：80.000元

世界知識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售

中蘇友好 半月刊

本刊為介紹馬列主義理論及蘇聯建國經驗和科學藝術的綜合性期刊。自三卷二期改為半月刊並加以革新，在內容方面除有關中蘇友好關係，馬列主義理論及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經驗等論著外，並有蘇聯學術動態，中蘇友協參考資料和工作經驗介紹，文藝書報評介，讀者園地，問題解答，畫刊等欄。

每冊售價—二•〇〇〇元　預訂三月—一二•〇〇〇元
預訂半年—二四•〇〇〇元　預訂全年—四八•〇〇〇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新華月報 月刊

綜合性的資料性的大型期刊

每冊售價15.000元　預訂三月45.000元
預訂半年90.000元　預訂全年180.000元

新觀察

國內唯一的新型綜合性期刊

每冊售價3.000元　預訂三月18.000元
預訂半年36.000元　預訂全年72.000元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新建設 月刊

第四卷 第六期

負責人 費青

編輯委員（以姓名筆劃為序）

千家駒　向達　*沈志遠
*吳晗　狄超白　李廣田
金岳霖　范文瀾　胡繩
袁翰青　孫曉邨　*陶大鏞
*費青　費孝通　*張志讓
*傅彬然　聞家駟　雷潔瓊
樊弘　*鄭昕　潘靜遠
錢偉長　錢端升　儲安平
鍾潛九　*謝覺哉　嚴景耀

（有*者，為常務編輯委員）

出版者 新建設雜誌社
地址：北京東華門南夾道六十二號
電話：（五）五九六六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定價每冊四千元

訂閱：
三個月三期　一萬二千元
半年六期　二萬四千元
全年十二期　四萬八千元
平寄郵費免收　掛號郵費另加

北京市軍管會登記證新字第一一九號

本刊每月一日出版

CHINESE-LANGUAGE PERIODICALS

TRANSLITERATION: Hsin chien she

TRANSLATION: New construction

YEAR: 1951

NUMBER: 1 - 3 of Volume 5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 Ann Arbor, Michigan.